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反国家阴谋, 叛国和暴乱	6
起诉书摘录	7
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案件的判决——司法部的公告	9
第二章 阴谋用暴力夺取政权	19
纳吉·伊姆雷在其所写的文件中制订了叛国计划并 组织了秘密集团	19
在合法的掩护下进行的反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谋活动	23
纳吉·伊姆雷集团领导下的斐多菲俱乐部——煽动敌意的 公开讲坛	24
企图煽动工人阶级	31
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33
阴谋集团的叛国活动向郊区扩展	35
秘密集会和秘密会谈	37
组织 10 月 23 日的示威游行	42
第三章 瓦解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	46
把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势力驱逐出领导机构	47
解散武装部队并武装反革命分子	51
纳吉·伊姆雷集团成员在布达佩斯警察局的活动	51
纳吉·伊姆雷任命霍尔蒂参谋总部的军官作特务的领导	55
释放并武装刑事罪犯	59
法西斯恐怖分子、箭十字党人、战犯、盗匪和杀人犯 横行全国	62
纳吉·伊姆雷内閣的馬勒特违背誓言	69
破坏合法的国家政权地方机关和成立反革命团体	75

工人委员会的反革命计划	78
納吉·伊姆雷組織“下层压力”	82
吉羅什·米克洛什、洛契伊·帕尔、阿澤尔·塔馬什扮演 安格亚尔福尔德工人	85
納吉·伊姆雷不允許打乱他的计划,阻撓采取肅清反 革命的措施	91
納吉·伊姆雷命令停火。白色恐怖爆发	93
納吉·伊姆雷、洛松齐和多納特与杜达什·約瑟夫的 血腥的握手	99
第四章 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和法西斯党派的出現和 它們的目的	104
納吉·伊姆雷非法为明會帶“恢复名誉”	107
第五章 帝国主义——反革命叛乱的主要組織者	111
在反革命叛乱前西方国家的宣传活动	111
間諜特务在策划反革命叛乱中所扮演的角色	115
帝国主义所領導的反革命叛乱	118
“自由欧洲”电台是这次反革命叛乱軍事和政治上的外国 总指揮部	118
帝国主义对反革命叛乱的“道义”上的支持	123
西方国家供給反革命分子武器	124
历史垃圾的蠢动	129
納吉·伊姆雷的手稿是怎样送到西方去的?	130
英美公使館人員在“吉利安”軍營	131
胡伯特·馮·勒文斯坦亲王与洛松齐·格佐的会談	132
华盛顿要納吉·伊姆雷含羞一点	134
第六章 納吉·伊姆雷及其集团投靠帝国主义陣营 的准备工作	136
华沙条約是匈牙利独立和欧洲和平的保障	136
組織“公众輿論”和制造“既成事实”	138

納吉·伊姆雷給聯合國的“函件”	143
第七章 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是反革命掩护	
战的領導者	148
在西方國家中的納吉同謀者	148
在南斯拉夫大使館中的納吉集團	152
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是怎樣到南斯拉夫大使	
館去的	154
在“政治避難權”的保護下	155
第八章 1919—1956年	163
1919年恐怖分子衣鉢的繼承者	163
第九章 匈牙利人民捍衛社會主義	170

序 言

在审理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过程中，揭发了帝国主义分子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合法制度的反革命攻击的内部动力，揭发了匈牙利国内一小撮人在国内准备、組織并领导反革命叛乱的叛国行为。

本書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會議新聞局所出版“白皮書”的第五册，主要包括在审理过程中新发现的，可以証实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叛国活动的文件。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書仅包括所有証件和文件資料的一部分。

根据这里所发表的材料，显然可以証明，在反革命叛乱暴发以前很久，納吉·伊姆雷就领导了建立旨在推翻現存制度的秘密組織。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組成了一个秘密的叛国集团。納吉·伊姆雷在他所写的許多秘密散发的文件中，詳細地拟定了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綱領。这些綱領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臭名远揚的宣传家們(华尔特·李普曼，苏茲柏格等)提出的关于顛复人民民主制度的策略的主要原則是同出一轍的。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在这一政治綱領的基础上，建立了他們的組織，并在这个基础上和他們的外国主子建立了联系。他們在从事地下組織活动期間内，已充分准备好了和犯罪分子及复活的法西斯势力的联盟，共同使用武力破坏匈牙利的合法制度，企图顛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从許多資料中可以看出，所有反对人民民主的各种活

动——当时公众还以为某些知识分子自然形成的观点的反映——实际上是由納吉·伊姆雷这一伙叛国者所策动的，他們决定了这些活动的进程。

这本书所揭示的文件材料说明了納吉·伊姆雷的叛国集团同国内反动势力、国外的匈牙利流亡者、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志同道合、合作和勾结。这些资料证实了納吉·伊姆雷及其集团，得到他們的帝国主义盟友的撑腰。

不少人曾经认为納吉·伊姆雷只不过是拥护与合法政府领导人的意见分歧的观点而已；他的活动依然立足于人民民主制度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且他所追求的依然是社会主义。可是在1956年10月24日以后，在他把真正的意图和计划掩盖起来，用欺诈和背叛的手段骗取了总理的职位以后，事实上他所追求的是什么，以及他所主张的“匈牙利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是包含些什么，就昭然若揭了。在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期间，納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为了实现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就开始实施他们早已制定的秘密计划，即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国民议会，和保证经常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实际上，都是由于他所采取的措施而被抛弃在一边。同时，他踢开了国家最高管理机关——部长会议，而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上独断专行。他排斥了各州人民所选出的国家政权地方机关地方会议，而代之以主要由流氓、暴徒与法西斯分子所控制的、没有通过正式选举而非法产生的“革命委员会”。

納吉·伊姆雷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等于废除了经全国普遍、民主、秘密投票选举的国民议会和在1949年8月所通过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把权力交给反革命势

力。納吉·伊姆雷充当了反共的恐怖匪帮的主要庇护人，并支持一切反动政党的建立。他宣布匈牙利脱离它的社会主义盟友，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企图瓦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国际反动势力为納吉·伊姆雷吹嘘，称赞他为攻击匈牙利国家权力的反革命首領，这并不是偶然的。

无疑地，这些都是叛国行为。

从这里所介绍的材料可以证明，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即使到了11月4日以后，还企图繼續攻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他們利用西方的敌对势力，国内反动集团与“自由欧洲”电台的帮助来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1956年11月3日，在卡达尔·亚諾什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工农革命政权，保护并巩固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制度，保证了对于宪法和一切法紀的遵行。1953年选出的国民議會，完全贊同并批准了政府旨在粉碎反革命叛乱，以及巩固人民民主国家中的法律和秩序的措施。这个反革命叛乱，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所奉行的、反对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侵略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如所周知，西方强国企图利用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来轉移人們对他們在埃及武装侵略的注意力。反革命叛乱的基本目的与西方帝国主义者为了保证垄断資本家的經濟和政治的霸权，而对阿拉伯和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发动一系列攻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相同的。他們进行了欺騙宣传，說什么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是为了“匈牙利人民的独立”，但无论他們怎样說，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这个說法和帝国主义者的辯解，即所謂他們在中近东进行武装干涉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受到了“阿拉伯帝国主义”威胁，是同样荒謬而可笑的。

1956年匈牙利第二次发生了血腥的反革命暴乱。匈牙

利国内的最反动和最凶恶的势力，在 1919 年，也曾在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武装支持下，进攻过当时匈牙利的合法制度、自由的人民的国家。1919 年，霍尔蒂摧残了匈牙利人民的真正革命力量，借助外国军队把革命淹没在血泊里。

1956 年的反革命暴乱，也是在走 1919 年白色恐怖的可怕老路，这是一条对帝国主义分子效忠，企图使资本家重新骑在人民头上的道路。他们的伪装的策略，和 1919 年所用的也是相同的，那时拜德勒的“工会政府”，在民主外衣的掩护下，承担了把国家权力移交给法西斯主义的任务；1956 年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党则充当了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的角色。1919 年，拜德勒政府企图以“没有独裁制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来迷惑人民，但同时却对法西斯分子打开了大门，造成白色恐怖的独裁统治。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实际上一字不差地效法了他们的可耻的前辈，而且是把对人民民主制度的疯狂的反动攻击，用象“没有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伪装了起来。于是促使了法西斯势力的公开的集聚和迅速地发展。

文件材料也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使纳吉·伊姆雷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的一切阴谋，以及所挑选出来的人物都是为了露骨地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

纳吉·伊姆雷没有能够走拜德勒的老路，以建立公开的反革命势力，没有完成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的任务，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今天，力量的对比和 1919 年大不相同了。它已经有利于热爱自由的人民，而不是有利于压迫者。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国际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帮助下，恢复了我們为反革命叛乱所动摇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并实行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根据宪

法行使权力。由于反革命的失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了。我国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和一切进步的势力一道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1956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动势力对我们国家的攻击，给予我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说，在我们的时代里，自由、独立、和平以及社会主义的力量，已比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要大得多；帝国主义者企图奴役其他国家的阴谋活动，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

第一章

反国家阴谋, 叛国和暴乱

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和恢复国内秩序之后, 刑法和司法的主管机关开始侦查反革命叛乱发生的原因, 以及参加这次叛乱的那些人的活动。

在审理过程中所发表的一些记录、文件和有关的事实, 要求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查纳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的任务和活动方面。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司法机关进行了详细的与周密的调查之后, 人民检察院在1958年1月28日依法对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几个同谋者提起公诉。

公诉并不是根据反革命叛乱后所颁布的新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对他们的判处也并不是根据新法律; 而是根据1946年由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关于维护国内治安的刑事惩处条例的第七法案。如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 在了解已被揭发的罪行之后, 没有对罪犯加以惩处, 那就是违犯了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匈牙利的法律规定, 犯有反革命罪行的人必须受到审判。如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行使赦免权而决定撤消审判, 匈牙利司法机关也可以终止进行刑事审理; 但是,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并未行使这个权力。

起訴書摘要

总检察长控告：

納吉·伊姆雷 主犯，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一款規定的組織并領導旨在推翻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陰謀罪和犯有刑事法規第三十五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叛國罪。

多納特·費倫茨 第二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一款規定的組織并領導旨在推翻人民共和國制度的陰謀活動罪行。

吉梅什·米克洛什 第三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一款規定的組織并領導旨在推翻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陰謀活動罪行。

蒂尔迪·佐尔坦 第四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二款規定的鼓動旨在推翻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陰謀活動罪行。

馬勒特·帕尔 第五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一款規定的領導旨在推翻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的陰謀活動罪行，犯有軍事懲處法規第二十九條和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的組織軍事暴亂的罪行，犯有刑事法規第三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陰謀叛國罪行。

科帕契·山多尔 第六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一款規定的領導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陰謀罪行，犯有軍事懲處法規第二十九條和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的組織軍事暴亂罪行。

西拉吉·約瑟夫 第七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条第一款規定的組織并領導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陰謀

罪行。

亞諾希·費倫茨 第八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積極參加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陰謀罪行。

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 第九被告，犯有刑事法規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積極參加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陰謀罪行。

理 由

主犯，第二，第三和第七被告在 1956 年 10 月 23 日以前組成敵對集團，而通過對各種社會組織的破壞活動，展開了對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攻擊；而在反革命叛亂發生之後，又親自擔任領導直接致力於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盟，和推翻人民民主國家制度。

第四被告在 1956 年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4 日任納吉·伊姆雷政府國務部長期間，有意地幫助政府向右轉，並制定了一個有利於資產階級復辟的反民族的外交政策，以求達到推翻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目的。

第五和第六被告，作為納吉·伊姆雷所委任的軍事領導人員，解散了忠於人民政權的武裝力量，組織並武裝了反革命勢力，以防止對反革命叛亂的武裝鎮壓，和達到推翻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目的。

第八與第九被告在 1956 年 10 月 23 日以前，進行了有利於產生一個敵對集團的組織活動；以後他們積極地參加對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攻擊，以實現領導反革命叛變的集團的反對國家的目標。

附 記

主犯為了防止反革命叛亂被鎮壓，敦促和匈牙利人民

共和国敌对的外国力量进行干涉；以后他又在 11 月 4 日的广播呼吁中煽动反对匈牙利国家的敌对行为。

第三被告在 1956 年 11 月 4 日以后，参与领导名为匈牙利民主独立运动的非法组织，在他主持编辑下，出版并发行了名为“10 月 23 日”的秘密报纸，它制定了旨在推翻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的行动纲领。

第五被告，作为一个职业的陆军上校军官，在 10 月 25 日至 28 日期间，违反国防部的指示，连同他所指挥的部队，投向反革命方面，供给英国武官考莱以军事秘密，并允许他审查研究军械和坦克。

第六被告，任布达佩斯警察局长，于 1956 年十月事件期间，投向反革命方面。

根据检察长的起诉书在 1958 年 2 月 6 日，对这一刑事案件进行第一次审理。由于新证据的发现，最高法院在 1958 年 6 月 9 日和 15 日举行了终结审判。6 月 15 日宣布了判决书，同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表了有关这一案件的公告。

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案件的判决

司法部的公告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门已经结束了对 1956 年 10 月 23 日在帝国主义者极力帮助下发动了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合法制度的武装反革命暴乱的领导集团案件的审理。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检察长在起诉书中控告纳吉·伊

姆雷和他的同謀者多納特·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蒂尔迪·佐尔坦、馬勒特·帕尔、科帕契·山多尔、西拉吉·約瑟夫、亞諾希·費倫茨、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犯了組織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此外还控告納吉·伊姆雷犯了叛国罪，科帕契·山多尔和馬勒特·帕尔犯了組織軍事暴乱罪。被告洛松齐·格佐的案件停止审理，因为他已經病死。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人民法庭审判委员会根据被告的供詞和二十九个証人的証詞，在听取了起訴人和辯护人的意見并研究了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案件的大量物証后确定：

納吉·伊姆雷和他的亲信同謀者：洛松齐·格佐、多納特·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西拉吉·約瑟夫在 1955 年 12 月組織了秘密的叛国陰謀，目的是要用暴力夺取政权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审讯中查明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在策划和发动 1956 年 10 月的反革命暴乱中起了领导的作用。蒂尔迪·佐尔坦和馬勒特·帕尔在 1956 年 10 月了解到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敌对目的以后，表示贊同这些目的并且积极参加了反革命叛乱。陰謀集团的成員领导了国内的反动势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結成同盟，进行了以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叛乱陰謀。

法院查明，納吉·伊姆雷早在 1955 年底就为了用暴力夺取政权而把他的亲信組成秘密小集团。这个秘密小集团利用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和可能，进行了敌对活动。为了实现推翻人民政权的目的，他們动员和吸收了形形色色的与人民民主国家制度为敌的人。同时，他們用籠絡人心的欺騙手段掩飾自己的真正目的，宣布“社会主义”的口号，使

一些輕信的人受到他們的欺騙，并被他們利用來達到反國家的目的。

陰謀分子集團，首先是，這個集團的領導人納吉·伊姆雷，詳盡地制定了政治綱領、當前任務以及反對人民民主的活動方法和進一步的目的。公訴人向法院提出了秘密文件，其中大部分是納吉·伊姆雷親手寫的。

納吉·伊姆雷在1955年所寫的文件（“道德和倫理”）中把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稱為“蛻化的拿破侖政權”，並且號召用暴力來推翻它。在1956年1月所寫的另一個文件（“一些迫切的問題”）中，他提出了要同反對人民民主的勢力結成聯盟的任務，放棄了工人階級政權並且把恢復多黨制作為自己的目標。納吉·伊姆雷在1956年1月寫的作品（“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中，借口“消除集團政策”，提出以廢除防禦聯盟——華沙條約和把國家出賣給帝國主義者作為冒險集團的目標之一。法院根據證據和供詞查明，按照納吉·伊姆雷的指示，這些文件被復印成許多份，並且秘密地散發給他的親信同謀者和忠於他的分子。

在審判過程中查明，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所建立的秘密組織進行了有計劃的顛復活動來削弱工農政權、瓦解合法的人民民主制度，然後用暴力奪取政權。他們吸收了坦措什·加博爾和後來逃到西方的納吉·巴拉什參加他們的秘密活動並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裴多菲俱樂部變成了敵對分子的集合地點，變成了向黨和國家進攻的機關。他們以組織辯論為幌子親自策劃了以反對人民民主制度為目的的裴多菲俱樂部的各種措施。許多敵對言論都是由他們事先準備好了的。例如，德里·提博爾在所謂報紙問題討論會上所作的煽動青年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發言，是他同洛松

齐·格佐和哈拉斯提·山多尔共同准备的。在德里·提博尔、海伊·貝洛、阿澤尔·塔馬什和类似他們的反对共和国分子的帮助下，这个集团在报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面他們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所犯的个别錯誤，并疯狂地誹謗了現存的制度。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要顛复政权、破坏政府的威信，动員敌視人民民主制度的分子并通过这种手段用暴力来夺取政权。1956年9月洛松齐·格佐公开向在布达佩斯的以色列記者阿莫斯·埃隆說：“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將对政府采用暴力”。1956年10月20日西拉吉·約瑟夫在他所組織的一次秘密會議上說：“納吉·伊姆雷和他的战友們准备要夺取政权”。

大家都知道的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就是由納吉·伊姆雷及其集团所发动起来的，他們利用同斐多菲俱乐部和高等学校的联系来实现这个目的。例如，西拉吉·約瑟夫10月22日夜間在工业大学的集会上，根据納吉·伊姆雷的指示直接号召举行示威游行。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是納吉·伊姆雷集团通过坦措什·加博尔及其同謀者来領導的。

在这段期間，陰謀分子集团几乎每天举行秘密會議，有时甚至一天举行几次。1956年10月19日、20日和22日，根据納吉·伊姆雷的倡議，洛松齐·格佐、多納特·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在陰謀集团其他成員參預下着手起草他們所要組成的政府綱領。在1956年10月23日上午，洛松齐·格佐的住宅中举行的秘密會議，除納吉·伊姆雷外，吉梅什·米克洛什、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亞諾希·費倫茨和哈拉斯提·山多尔都参加了，会上拟定了陰謀者們打算在用暴力推翻合法的匈牙利政府后夺得政权的政府的人員的名单。

在政府人員的秘密名單中，納吉·伊姆雷自己擔任總理。陰謀分子集團的成員瓜分了各部部長職位。

為了直接領導在示威游行的同時和示威游行的掩飾下發動的武裝叛亂，陰謀參與者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秘密中心。其中的一個在布達佩斯警察局組成，它的成員有科帕契·山多爾、西拉吉·約瑟夫、吉梅什·米克洛什、法澤卡什·季耶爾迪和阿澤爾·塔馬什。科帕契·山多爾背棄誓言，濫用布達佩斯警察局局長的職權，欺騙自己的屬員，執行秘密中心所擬定的任務。為了武裝敵視人民民主的勢力，同時為了瓦解忠於社會主義的武裝力量，他命令各區警察局不要抵抗叛亂者，反而把自己的武器和警察局辦公的地方移交給他們。當時，科帕契·山多爾從警察局的武器儲備中分給叛亂者兩萬多件射擊武器。同這個集團緊密合作的有一個在1956年10月24日建立的輔助中心，這個中心的成員是洛松齊·格佐、多納特·費倫茨和亞諾希·費倫茨。這個中心特別領導了軍隊中的顛復活動，同時把保衛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的軍事計劃定期地告訴叛亂分子。

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早在10月叛亂以前就同資產階級復辟分子建立了秘密聯繫並進行了談判，並且同他們結成了同盟以圖用暴力奪取政權。例如，在這些談判的過程中，1956年7月洛松齊·格佐和哈拉斯提·山多爾就曾經同克特利·安娜直接談判，以後又通過艾爾德加·伊斯特萬同她談妥，讓她參加納吉·伊姆雷所組織的政府。1956年12月，納吉·伊姆雷決定恢復舊的所謂“聯合”政黨，並且同這些黨一起組織政府。但是，在他依靠反革命勢力用暴力和欺騙的方法搶到了總理的位置以後，他就走得遠得多了。在反革命叛亂的那些日子裡，他就破壞憲法毫無止境地

允許七十個形形色色的黨派和團體成立，並且為它們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這些黨派和團體中有許多臭名昭彰的、為和約所禁止的資產階級法西斯政黨，如：匈牙利生活黨、基督教民主黨、基督教匈牙利黨、匈牙利人民黨、民族陣營、基督教陣綫、天主教人民黨、基督教人民黨和吉厄爾城的箭十字黨。

為了保障自己的政權，納吉·伊姆雷陰謀集團也同其他極端反動的集團結成了聯盟。這集團甚至給被依法判刑的前紅衣主教明曾蒂·約瑟夫“恢復名譽”，使他有可能反對人民共和國。經過蒂爾迪·佐爾坦從中拉攏，納吉·伊姆雷集團同明曾蒂取得了協議，接着明曾蒂就在11月3日通過電台廣播了資本主義復辟的計劃。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共謀者還同流亡國外、為帝國主義者效勞的匈牙利資產階級法西斯分子取得了協議。所謂“全國委員會”主席瓦爾加·貝洛在1956年10月28日發表的聲明就証明了這一點。他說：“委員會委員同匈牙利叛亂的領導人保持着經常的聯繫”。這以後，蒂爾迪·佐爾坦同到維也納來支持反革命的納吉·費倫茨通電話，取得了流亡者擁護納吉·伊姆雷政府的協議。

納吉·伊姆雷當了總理之後，破壞自己的誓言，一脚踢開了憲法規定的國家領導機構——國民議會、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主席團和政府，用非法手段建立了所謂“內閣”，作為自己的統治機構。這個內閣當時就是反動勢力占上風，雖然為了欺騙群眾，納吉·伊姆雷把一些忠於社會主義的人士拉在裡面。但是，他在11月2日又改組了這個內閣，新吸收了一批最激烈的資產階級復辟分子和反革命叛亂領導人入閣。這時，內閣閣員除了納吉·伊姆雷、洛松齊·格佐、

蒂尔迪·佐尔坦之外，已经有克特利·安娜、薩波·伊斯特万、比博·伊斯特万，并且由反革命叛乱武装部队总司令馬勒特·帕尔担任国防部长。

納吉·伊姆雷和他的阴谋集团在瓦解和取消了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权机关以后，便着手取消地方政权机构。他们取消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机构——地方会议和经济管理机构，代之以主要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建立起来的所谓“革命委员会”和用来欺騙工人阶级的所谓工人委员会。

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取得了关于停火的指令后，他们的叛变活动和破坏活动终于瘫痪了保卫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同时他们组织了叛乱者的反革命力量，供给他们武器，最后，使反革命力量合法化。在所谓“国家保安队”中，他们纠集了战犯和反人民的罪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以及一切可能收罗到的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接着在布达佩斯和在全国各地开始了白色恐怖。根据迄今为止所调查到的材料，在納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的短短的统治期间，恐怖部队野蛮地杀死了二百三十四手无寸铁的公民。在那些日子里，监禁了三千个忠于人民民主制度的进步公民，原计划在不久后处死。此外，在11月4日以前开了名单，准备大规模屠杀一万多人。

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在纠集国内反动的反革命势力的同时，还同帝国主义的各种集团、机构和人物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合作。阴谋集团的成员之一卡尔多什·拉斯洛曾经同前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工作人员庫普有联系，在庫普的帮助下把納吉·伊姆雷所写的叛国政治材料私运到西方。通过馬勒特·帕尔，他们同英国武官考萊保持了联系，

考萊直接参加了叛乱的軍事領導。在洛松齊·格佐的幫助下，同派到匈牙利的西德帝國主義者的代表勒文斯坦公爵建立了联系和合作。根据同洛松齊·格佐的談判，勒文斯坦公爵在科苏特电台演說，向反革命叛亂分子保證西德資本家方面給予支持。

同时，以美帝國主義者为首的某些帝國主義集团很多年以來早就使他們的全部宣傳機器和諜報機關的活動支持他們称之为“民族共產主義”的納吉·伊姆雷集团这个匈牙利反革命派的代表。美国諜報機關“斯特拉斯堡大學”在1956年9月擬訂了反革命叛亂的綱領，并且非法地在匈牙利散發。在反革命叛亂時，他們把大量武器同紅十字會的包裹一起送到匈牙利。与此同时，帝國主義的報刊和电台还为吹捧納吉·伊姆雷个人大肆宣傳。他們強調指出，如果匈牙利脫離社会主义陣營的事情由“一群帶着共產黨員称号的人”來搞的話，会更有利于西方国家。臭名昭著的“自由歐洲”电台用它的匈牙利語廣播和它所放出的气球，为反革命叛亂准备了土壤，而当反革命暴亂发动起来以后，“自由歐洲”电台又領導了叛亂分子，并对他們发出軍事指示。阴谋集团执行了这些指示。

为了實現他們的目的，并且为帝國主義干涉充分开辟道路，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叛國集团企图非法地宣告废除華沙条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加入的防禦同盟。納吉·伊姆雷1956年11月4日的廣播演說是这个企图的頂峰，他要求帝國主義者公开武装进攻工农革命政府和这个政府請來援助的苏联軍隊。

反革命武装暴亂失敗以后，某些象納吉·伊姆雷这样的阴谋者的集团开始到他們过去曾經得到过支持的地方去

寻找避难所。国家政变的参加者基腊伊·貝洛、克特利·安娜、凱瓦戈·約瑟夫等人都跑到西方去以逃避責任。明曾蒂·約瑟夫，据匈牙利当局得悉，躲藏在美国公使館中。薩波·伊斯特万企图躲藏到布达佩斯英国公使館去。以前打着“民族共产主义”的海盜旗帜的納吉·伊姆雷集团跑到南斯拉夫駐布达佩斯大使館去逃避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当匈牙利人民在工农革命政府领导下着手恢复法律秩序、保障人民和平生活、消除反革命分子所造成的严重損失的时候，背信弃义的阴谋分子还怙恶不悛地繼續进行反革命活动。克特利·安娜、基腊伊·貝洛、凱瓦戈·約瑟夫和他們的同謀者从西方，而納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和其他人則从南斯拉夫大使館发布指示，命令繼續进行武装反抗，組織使生活陷于瘫痪的罢工，重新組織秘密顛复活动。譬如，納吉·伊姆雷和洛松齐·格佐躲在南斯拉夫大使館里，就曾經通过吉梅什·米克洛什和其他同謀者同“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自由欧洲”电台建立联系，甚至开始出版新的秘密报纸“10月23日”。在后来的偵查和审讯过程中，这一切都得到了确凿的事实証明。

偵查和审讯过程的材料說明并且証实，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根据他們从前的修正主义、资产階級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自然而然地墮落到了同最反动的资产階級帝国主义势力結成联盟，墮落到了背叛人民民主制度、背叛匈牙利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

在审讯时，被告多納特·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蒂尔迪·佐尔坦、科帕契·山多尔、亞諾希·費倫茨、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表示忏悔，完全供認了自己的罪行。納吉·伊姆雷、西拉吉·約瑟夫和馬勒特·帕尔則否認自己

的罪行。但是，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被同谋者的供词和证人的证词，以及各种证物所揭穿，他们在自己的供词中部分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人民法庭审判委员会根据审讯材料确证被告犯有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并斟酌罪行的轻重以及加刑和减刑的条件判处纳吉·伊姆雷死刑，多纳特·费伦茨十二年徒刑，吉梅什·米克洛什死刑，蒂尔迪·佐尔坦六年徒刑，马勒特·帕尔死刑，科帕契·山多尔无期徒刑，西拉吉·约瑟夫死刑，亚诺希·费伦茨八年徒刑，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五年徒刑。

本判决不得上诉。死刑已经执行。

第二章

陰謀用暴力夺取政权

納吉·伊姆雷在其所写文件中制訂了 叛国計劃并組織了秘密集团

在1955年和1956年年初，納吉·伊姆雷写了以下几个文件：

“道德与倫理”

“国际关系的五項基本原则”

“一些迫切的問題”

匈牙利偵查机关，在审理过程中，查获了納吉·伊姆雷亲手写的这些文件的手稿。

在这些文件里，他提出了他的叛国計劃，作为他所领导的反人民民主的秘密組織工作的政治綱領。

他在1955年12月所写的名为“道德与倫理”的文件中，把推翻人民民主国家制度作为他的目标——照他的說法是要“粉碎”这个制度。在1956年1月所写的“一些迫切的問題”的文件里，他把和反人民民主的势力結成联盟列入他的綱領中，并倡議放弃工人階級政权，恢复多党制和联合政府制。在他的“国际关系的五項基本原则”的文件里，他主张匈牙利应退出华沙条約。

他对国家的領導机关和全体人民，这些文件是隱蔽着的，可是却在他秘密組織的集团成員中传閱。他們按照他的指示，把这些文件交給外国人看，希望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

早在1956年10月的反革命暴乱以前，納吉·伊姆雷就着手組織他的政治集團，以實現他的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計劃。

他慎重地選擇了和他抱有相同或類似的政治觀點的人，或者選擇了這樣一些人，這些人以往曾遭受過某些私人委屈，因而他認為這些人會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制度，他能夠把他們拉來實施他文件里提出的秘密計劃，甚至把他們吸收到他的秘密的陰謀叛亂集團里來。

亞諾希·費倫茨供認了下列事實：

“這個集團是以納吉·伊姆雷為中心的。他掌握這個集團的政治大權，領導人是納吉·伊姆雷和洛松齊·格佐。納吉·伊姆雷是這個集團的創始人和領導者。”

在1958年2月6日的審訊中，審判長對亞諾希·費倫茨作了如下的問話：

“審判長：在1955年的下半年，主要在1956年十月事件發生以前，和你保持聯系的有哪些作家、記者和社會人士，其中有哪些人你認為是納吉·伊姆雷政治路線的支持者？”

“亞諾希·費倫茨：其中有哈拉斯提·山多爾，洛松齊·格佐，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吉梅什·米克洛什和法澤卡什·季耶爾迪。

“審判長：還有哪些作家？”

“亞諾希·費倫茨：阿澤爾·塔馬什，澤爾克·佐爾坦，海伊·貝洛。”

多納特·費倫茨證明：

“納吉·伊姆雷親自領導這個集團及其成員的個人活動。聚集在納吉·伊姆雷周圍的人們的主要特點是，他們一致反對共產黨的政策。在他和他們談話時，

他贊同他們的觀點，因此他們認為納吉·伊姆雷能夠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和觀念。”

叛國陰謀的成員，記者哈拉斯提·山多爾，在出庭作證時，證明：納吉·伊姆雷集團，在1955年秋已經發展成形。這時集團的成員可能有：洛松齊·格佐，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多納特·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烏赫伊·西拉德與哈拉斯提·山多爾。

問題是，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根據烏赫伊·西拉德的証實，很显然他曾企圖組織秘密中心：

“哈拉斯提·山多爾告訴我，吉梅什·米克洛什，向納吉·伊姆雷建議成立一個半秘密的或秘密的組織，以團結並指導全國公開反對政府和共產黨領導的人們。”

納吉·伊姆雷在2月的審訊中，對審判長的問話作了如下的回答：

“吉梅什在1956年6、7月間，建議最好把政治觀點和我接近的人組成一個小型委員會。這個問題提出過兩次。另一次是吉梅什，法澤卡什和拉克西直接向我提出的。”

在2月6日的審訊中，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對審判長有關散發納吉·伊姆雷的叛國文件的問話，作了如下的回答：

“審判長：納吉·伊姆雷是否曾給過你他寫的政治文件，即他在1955或1956年所寫的文件？”

“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是的，我曾接到他的文件，我接到過一個名為‘五項原則’的文件，還有別的。我接到過名為‘道德與倫理’的文件，還有一個談經濟問題的，以後又接到一個名為‘一些迫切問題’的文件，換句話說，我接到了幾個文件。”

科帕契·山多尔在同一天审讯中作了下述的証明：

“法澤卡什·季耶尔迪曾在1956年9月給过我納吉·伊姆雷所写名为‘道德与倫理’的文件。”

当哈拉斯提·山多尔被問到納吉·伊姆雷把他的反动文件給他和另外一些人，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时，他回答說：

“是为了使我們能够了解他的观点，以便以后在我們所接触的学术界中散播。我主要是在和記者們的談話中传播了他的論点。……”

坦措什·加博尔，裴多菲俱乐部的秘書和叛国阴谋的成員，作了如下的証明：

“1956年夏末，納吉·巴拉什把一个用打字机打的，有五十到六十面的文件給我看。他告訴我，这个文件是納吉·伊姆雷写的。”

交通管理人米科·亞諾什作了下列的証詞：

“我和納吉·巴拉什去拜訪納吉·伊姆雷。在談話中，納吉·伊姆雷多半是替他自己訴苦。接着就把他的文件給我們看。他告訴我們不仅自己讀，还要交給同情他的那些人传閱。他暗示，这件事最好不要叫党知道。”

納吉·伊姆雷在众口一詞的面前，仍說他沒有散发所說的文件，也沒有利用这些文件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企图。而且，据他回忆，他只把这些文件給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和吉梅什·米克洛什看过。他企图将秘密散发文件的責任推在瓦沙尔赫利与吉梅什身上。在6月10日的审讯中，納吉·伊姆雷和哈拉斯提·山多尔对質。

哈拉斯提·山多尔說：

“集团的成員都知道納吉·伊姆雷的文件。我还曾

向納吉·伊姆雷表示过我不贊成他这样传播他的观点。”

納吉·伊姆雷一再否認这一事实。

“我否認我曾經公开地散发我的文件。看到过我写的文件的仅仅是少数人。我否認哈拉斯提曾經向我說过他不贊成把我的文件給別人看。”

从本書的第五和第七章所印的文件和証据，可以看出，这些文件曾在納吉·伊姆雷的指示下送到国外。

在合法的掩护下进行的反人民 民主制度的阴謀活动

在納吉·伊姆雷集团的成員竭力进行秘密組織的同时，他們还企图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来攻击人民民主制度。他們的目的是成立形形色色的集团，把它們公开合法化，使它們与国家领导对抗，从而把国内的反动势力动员起来。这就是他們为什么首先拉攏了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的緣故。作为这計劃中的一部分，他們企图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团体里，建立起一个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据点，以实现他們的敌对計劃。

这个秘密組織在这方面的活动首先是，編写所謂“作家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1955年10月拟定，由几个作家、記者和艺术家签名的。备忘录中談到有关文艺上的一些問題，为这个集团的反对政府的政治立場，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公众和許多在备忘录上签名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备忘录是由納吉·伊姆雷集团决定、起草和发起签名运动的。

根据証人的証明，可以推断，写备忘录的政治意义是企图利用当时未能解决的文艺生活上的一些問題来对党和

国家领导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在納吉·伊姆雷的住所，有好几次談过备忘录的事。

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作了如下的証明：

“签名大部分是由我們征集的——具体地說就是由哈拉斯提·山多尔、洛松齐·格佐、德里·提博尔、澤尔克·佐尔坦和我自己，以及一两个不屬於这个集团的人征集的。据我所知，納吉·伊姆雷知道这件事并且同意我們这样做。我們征集这些签名后，他催我們把备忘录交上去。結果好多人，特别是知識界，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不相信，群众認为这是匈牙利知識分子的行动，其实，納吉·伊姆雷集团是整个运动的策划人和执行者。”

以后，党的措施，使大部分签名的人認識到这个备忘录具有宗派主义的反党性質，并且是和党敌对的，因此他們声明他們的签名无效。納吉·伊姆雷集团的成員与他們相反，決議不撤回签名。关于这件事，瓦沙尔赫利作了如下的供述：

“1955年12月6日作家集会以后，我們几个人——哈拉斯提·山多尔、洛松齐·格佐、德里·提博尔、烏赫伊·西拉德、阿澤尔·塔馬什和其他一些人，在洛松齐·格佐家里聚会。在那里决定，不管党的決議怎样，我們不撤回备忘录上的签名。我們把決議告訴了納吉，他表示同意。”

納吉·伊姆雷集团领导下的裴多菲
俱乐部——煽动敌意的公开讲坛

納吉·伊姆雷集团利用裴多菲俱乐部作为合法的公开

組織；在背后，他們組織并領導了在那裏舉行的一些討論會，特別是那臭名遠揚的報紙問題討論會。他們討論了幾個記者的演說，并計劃使討論會變質，成為敵對性質的示威。

在6月11日的審訊中，坦措什·加博爾作了如下的證明：

“我們在斐多菲俱樂部替納吉·伊姆雷和他的政策宣傳。納吉·伊姆雷—洛松齊集團，多次主持斐多菲俱樂部的集會。多納特指導過經濟討論會；烏赫伊·西拉德當過另外一次討論會的主席；洛松齊·格佐領導過報紙問題討論會；多納特指導過關於‘匈牙利生產水果’問題的討論。”

參加反革命組織的作家馬庫什·伊斯特萬作了如下的證明：

“……大約在5月中旬或下旬，坦措什（還有同他在一起領導斐多菲俱樂部的一些伙伴）有意識地把斐多菲俱樂部發展成納吉·伊姆雷觀點的宣傳中心，他力圖為這個傾向奠定基礎，並使它擴大和發展。

“5月末、6月初，又有了一些新的計劃。當時認為應該把斐多菲俱樂部擴展成一個比較堅固的組織；會員應交納會費，定期開會，舉行成員會議，選舉出負責人，並設立各專門機構等等。他們計劃出版一個定期刊物，如果可能的話，出版周刊，但是在沒籌備好以前，先出版石印的‘會報’。按照計劃，這個刊物將刊載較重要的辯論文章，以鞏固這個俱樂部的基礎，擴大它的活動範圍和加強它的政治力量。有人建議在郊區，主要是在較大的省會，和大學中心區，成立一些‘小斐多菲集團’。建議大學生應該依照斐多菲俱樂部的形式分

別——或者按照他們的科別——組織他們自己的辯論會。實際上，他們認為青年工人也應該成立他們自己的斐多菲集團。”

哈拉斯提·山多爾提出了如下的証詞：

“納吉·伊姆雷集團認為，斐多菲俱樂部是傳播他們政治綱領的良好場合。所以他們就利用它來達到這樣的目的。洛松齊·格佐和多納特·費倫茨在斐多菲俱樂部的集會中，主持各種問題的討論，他們也發表自己的見解。在中央委員會決議譴責斐多菲俱樂部的討論以後不久，納吉·伊姆雷集團的活動就停止了。我必須說明的是，納吉·伊姆雷不同意這個集團從政治鬥爭中暫時撤退。他認為我們應該用全力不斷進行政治鬥爭。”

多納特·費倫茨供認他們預先就組織好了對黨和國家的攻擊：

“從1956年春天起，每天晚間的討論會，成了這個集團的主要政治活動，斐多菲俱樂部的某些晚間討論會，包括報紙問題討論會，是斐多菲集團的領導人們，在事前和洛松齊·格佐商談後擬訂的。這樣他們實質上進行了以反對黨和反對國家領導為目的的有組織的集團活動。”

屬於反革命集團的作家德里·提博爾供認：

“在舉行報紙問題辯論會的前一兩天，我在記者俱樂部里向納吉·伊姆雷集團的洛松齊·格佐、哈拉斯提·山多爾、澤爾克·佐爾坦讀過我的演講稿的一部分，他們很喜歡這一部分，這就使我確信我所說的是對的。多納特·費倫茨在我進行演說以前就知道了它的

內容。我想多納特是由納吉·伊姆雷集團的一個成員那里知道的，也許是納吉·伊姆雷告訴他的。”

裴多菲俱樂部的集會，對於人民民主制度 攻擊越來越惡毒。這都是事先準備和安排好的。有幾個在報紙問題辯論會上發言的人，特別是德里·提博爾和塔爾多什·提博爾，採取了敵對的立場，並號召採取“行動”，也就是說，對當時的制度進行攻擊。

德里·提博爾在他的發言中，警告批評家不要光攻擊“表面現象”，從而造成錯覺，因為攻擊的矛頭應指向“本質的疾病根源”，也就是說，應指向當時的制度。他說，攻擊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個人，而應該是“他們所代表的理想”。

德里·提博爾說：

“如果我們批評的目標只限於個人，而不去檢查代表我們理想的制度有沒有錯誤，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個以暴易暴的悲慘後果。

“我們面對着國家機構的錯誤”他接着說，然後就號召應該行動起來。

“參加歷次的辯論會的有一千五百人到二千人，差不多老是這些人……我們高呼口號，高興得象玩着喇叭的孩子。沒有想到我們的口號始終是口號，我們的希望落了空，事情根本沒有改變，即使有了改變，也是微不足道的。這樣能做出什麼來呢？我們只是為了演說而放棄了行動。”

塔爾多什·提博爾在他的發言中所作的歷史上的荒謬的比喻，是納吉·伊姆雷集團的演說和文件中所包含的煽動性的典型。他公然主張：如果要獲得“言論自由”，就應該把人民的財產——印刷廠拿過來。塔爾多什對什麼人講這

些話和鼓動什麼人做這種事情呢？他在替誰要求言論自由？1956年7月9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斐多菲俱樂部的決議案中說：

“當時曾組織過費佛爾黨和舒約克黨的前大學生，前反動青年組織和‘天主教行動’組織的領導者和發言人，出席了在斐多菲俱樂部的報紙問題辯論會。”

塔爾多什·提博爾對他自己的演講，做了如下的證明：

“在斐多菲俱樂部的報紙問題辯論會上，我說過，我們的‘日益增長的部隊’就是黨，其實，這句話現在不用多說，我是指斐多菲俱樂部的會員、作家和所有支持納吉·伊姆雷的政治領導的人們。”

納吉·伊姆雷集團的活動，特別是斐多菲俱樂部的公開煽動的言論，鼓動了另外一些與人民民主制度為敵的人進行陰謀活動。

薩波·伊斯特萬^①的證詞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供認前右翼反動領袖們曾作過多次會談：

“國內發生的事變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我們詳細閱讀着斐多菲俱樂部的辯論稿和報紙上刊載的論文。我們對它加以評論，並作出我們自己的結論。我們認為，納吉·伊姆雷不久就會當權，這是對我們有利的。我們相信，如果納吉·伊姆雷能控制這個國家，小農獨立黨就有可能東山再起。我們表示贊同他在1953年的行動，我們認為他將在一個聯合的基礎上擴大這些行動。”

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特

^① 薩波·伊斯特萬是一個富農，右翼小農獨立黨的右傾黨員，以後任納吉·伊姆雷政府的國務部長和閣員。——編者

別重視拉攏作家和記者，以便通過他們在報章上對黨和國家進行集中的攻擊。洛松齊和他的同謀者使斐多菲集團把報紙問題討論會，列入斐多菲俱樂部的議程，並盡全力來籌備它的上演，說明納吉·伊姆雷集團想盡一切可能利用在形成公眾輿論上起作用的報紙，並吸收它們為自己的叛國陰謀服務。納吉·伊姆雷集團的成員，通過他們在各編輯部的地位，宣傳了他們的各種活動和觀點，肆意破壞人民對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信仰。

在他們影響下的報紙以特大的篇幅登載斐多菲俱樂部的辯論稿。坦措什·加博爾在他的証詞中曾談到這一點。

“洛松齊在‘愛國人民陣綫報’任副主筆，他起了很大作用。這家報紙用很大篇幅登載斐多菲俱樂部的活動，並刊載推崇斐多菲俱樂部辯論會的文章。在我們和洛松齊談話時，我們對於這一點表示非常滿意。”

哈拉斯提·山多爾對於他們拉攏作家和記者們的活動，作了如下的証詞：

“我主要是對記者和作家們進行宣傳活動。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洛松齊·格佐、吉梅什·米克洛什和法澤卡什·季耶爾迪也向這些人進行同樣的政治活動。”

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在他的供詞中說：

“集團中個別成員以及和他們接近的作家和記者們在報界積極展開活動，時常提出一些微妙的問題，並極端夸大和渲染。這時候，哈拉斯提·山多爾和洛松齊·格佐經常同作家們保持聯繫，他們和德里·提博爾、澤爾克·佐爾坦、貝尼亞·拉斯洛，都積極為作家的會議做政治準備工作……”

納吉·伊姆雷集團雖然在1956年初在作家協會和記者聯合會中吸收了不少的黨羽，但他們仍認為本身的政治影響很不夠。他們感到，在最重要的一部分人民中，首先是在工人階級中，他們並沒有壓倒的優勢。

哈拉斯提·山多爾關於這一點，在他的証詞中供認：

“根據我的記憶，有一次我和吉梅什辭別了納吉·伊姆雷出來以後，我們在談論着。吉梅什談起，我們的鬥爭並沒有越出知識分子的范围。他認為這是由於我們的鬥爭缺少組織性的緣故。當我問到他時，他說他認為，如果我們能把我們的鬥爭擴展到非知識分子的羣眾身上去，我們的鬥爭就會更有力量。他建議成立一個組織，來實現這個目的。”

納吉·伊姆雷有時也對集團成員表示不滿，認為他們不夠積極。哈拉斯提·山多爾，對這一點，作了如下的證明：

“有時候，納吉·伊姆雷自己來發動和督促某些活動，也有的時候，他對集團成員的政治工作感到不滿意。納吉·伊姆雷提議為了使他的撤職和被黨開除歸於無效，應該採取一些政治行動。納吉·伊姆雷曾不止一次地責備集團成員，他認為，雖然在記者中已有不少追隨者，但報紙上並沒有反對黨和政府的反映。這件事他是最先和洛松齊·格佐及吉梅什·米克洛什談過的。”

從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的証詞，也可明顯地看出，納吉·伊姆雷要求他的集團成員採取更公開的敵對立場。瓦沙爾赫利供認：

“納吉·伊姆雷對我們每一個行動都表示同意。我們的某些行動是在他督促下做的。有時他也對某些活

动的軟弱无能感到不滿。

“納吉·伊姆雷不同意，在党的七月決議之后，我們接受了复职的命令，虽然他的問題还没有获得解决。他对于我們在他还没有恢复党籍以前担任各种职务一事深为不快。”

在这些証詞中，反复出現的問題是：納吉·伊姆雷的恢复党籍和他的以削弱党的力量为目的的一貫破坏活动。他們很明白，他們对党的統一破坏得越大，成功的希望也越大，也就使他們更容易爭取主动，阻止中央委员会貫徹七月會議的決定——糾正以往所犯的錯誤——并使这些決議毫無效果。因为，根据以上所述和以后一系列的文件所証实的，他們的目的并不是糾正錯誤，而是要夺取政权，推翻人民民主制度。

企图煽动工人階級

納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越是企图推翻人民民主制度，他們越是想把他們的势力伸张到工人階級、至少到一部分工人階級里边去。他們認為那些他們势力最大的、看来完全是純文化性質的讲坛必須着重討論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在这方面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作家协会”和它的刊物：“文学周报”、“和平与自由”、“文化国家”和其他一些同样的組織和期刊。6月10日哈拉斯提·山多尔在法庭上供認：

“納吉·伊姆雷認為，在文化界，在作家协会里和在記者联合会里，我們不仅要反对党的文化政策，而且还要談到全国的政治問題。納吉·伊姆雷反对集团成員不提出全国的經濟問題。納吉·伊姆雷向集团成員指出，他們也应和工厂的党組織取到联系。”⁵⁹

納吉·伊姆雷集團的這一策略，是在1956年9月召開的作家協會的全體大會上實現的；這次集會，可從瓦沙爾赫利的供詞看到，是由納吉·伊姆雷集團組織的。這次大會根據盧卡契·山多爾^①的提議通過了以下的決議：

“大會以後，作家們應個別或分組去訪問十個或十五個大工廠，使工人們了解我們大會的工作並大體地了解現代文學的使命。”

這次會議討論了一般的政治問題，納吉·伊姆雷的“復職”問題和納吉·伊姆雷集團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問題。上述的決議說明他們要把這些問題在工人當中披露。

同時他們又進一步採取行動來擴張勢力。這個集團舉行了納吉·伊姆雷六十壽辰的慶祝會，這也是具有敵意的政治上的示威。對這件事，亞諾希·費倫茨供認：

“……慶祝生日問題是1956年5月末在納吉·伊姆雷住所提起的。納吉·伊姆雷認為，在公共場所舉行屬於這類性質的慶祝不合適，他的意思是最好在他家裏舉行，由他們做主人招待來賓。以後，我和哈拉斯提認為可以借這個機會來表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最後，洛松齊、哈拉斯提、舒列茨、烏赫伊和我，曾經在納吉·伊姆雷家裏談過這個問題，當時一致贊成這個意見。”

多納特·費倫茨在他的供詞中說：

“1956年夏季，納吉·伊姆雷的壽辰是納吉·伊姆雷集團活動的一個重要發展，它提供了為納吉示威的機會。他邀請了以各種不同理由反對黨和國家領導的人參加。”

^① 作家，在反革命叛亂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里很活躍，他是這個委員會反革命要求的請願書的起草人之一。——編者

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1956年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十月反革命叛乱的前几个星期里，为纳吉集团所操纵的报纸——“文学周报”和一些其他的报纸，日益公开地煽动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斗争——“革命”。在这个集团的影响下，报纸越来越成为宣传反革命的工具。

例如，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就在“星期一报”上写文章，诽谤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在文章里他说，“民主或自由从来就未曾有过，因为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被践踏无遗。”

诺弗巴茨基·山多尔在“文学周报”上污蔑共产党干部：“他们以为他们生来就该作统治者，他们摆出罗马总督的架子。忍辱负重而可尊敬的希腊人遇到他们，向他们鞠躬致敬，可是当他们走过时，却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他们。”

海伊·贝洛写道：“大扫除将要开始，”塔马契·拉若什也煽动叛乱，“行动起来，我们的热血已经沸腾，最后要行动起来，要革命……”

阿泽尔·塔马什，投靠了西方国家，在他的短诗里写道：

“欧洲……我们将踏上行程，为的是要打开大门……把你的手伸给我们，让我们和平相处，并由那里继续前进，让我们一起做我们所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事……”

费克特·居拉在下面的字句里表现了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努力：

“如果我们夺占最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复古的坚强堡垒，我们将能解放出惊人的力量。”

他們的意思是：納吉·伊姆雷的信徒應該占據所有的重要職位。

納吉·伊姆雷集團的這種行為和帝國主義者的宣傳是一致的。當費克特·居拉宣布要奪占“堅強的堡壘”的時候，當作家協會九月全體大會要求納吉·伊姆雷完全復職的時候，當洛松齊、海伊·貝洛、諾弗巴茨基和其他的人要求成批地清洗國家和共產黨的干部的時候，“自由歐洲”電台在1956年8月7日的匈牙利語廣播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人事的更動是有必要的。人民需要那種從往事中得到教訓，並願意徹底改革的人們。”

在1956年9月12日的廣播中，“自由歐洲”電台對作家們講了以下的一些話：

“我們必須覺察到，我們看到了一些很可以稱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我們也必須覺察到，有人很想把這個革命關入監獄。因此，我們作家們必須在堡壘後面整理好我們的隊伍，保衛這個革命。”

羅馬電台在1956年8月28日，好像是朗讀上邊所引的阿澤爾·塔馬什的那首短詩的西方翻版一樣，作了如下的廣播：

“就象過去西方曾一度伸出援助的手，把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那樣，今天，在西方的支持下，解放的時機又到來了。”

在1956年9月19日廣播中，“自由歐洲”電台表露了帝國主義者對作家協會會員中的納吉·伊姆雷集團成員的贊揚。

“作家協會已勇敢地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並且已經朝向解決問題邁了第一步。我們知道，作家協會所取

得的还不是自由。不过作家协会的全体大会是一个重要步骤，是一个重要行动，和一个善良的愿望。通过它我们的作家和人民将获得这个自由，一个完全的自由。”

洛松齐·格佐的观点和“自由欧洲”电台相同。1956年夏季，在他接见以色列记者阿莫斯·埃隆时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对政府采用暴力。”

阴谋集团的叛国活动向郊区扩展

纳吉·伊姆雷集团把他们的组织活动扩展到了郊区，并企图用这种行动煽动起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情绪，为实现他们的叛国计划获得适宜的土壤。洛松齐、多纳特和西拉吉·约瑟夫特别是以这种精神在郊区进行活动。

195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海都贝塞尔门，筹备举行“知识分子大会”，演讲者是洛松齐·格佐。从一些证人的证词中可以断定，这次会上都有些什么活动。海都贝塞尔门的居民，个体农民盖兰·伊姆雷对这个会议作了如下的描述：

“参加这个大会的是些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富农、从前的宪兵和人民民主制度加罪过的其他的人们。”

“洛松齐·格佐作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和拉科西主义的危险性的简短演说。接着，有很多人发言，其中有富农，有对于过去愤愤不平的人。有一个演讲人宣读了——一个包括几点内容的纲领。他要求国家的独立，实行多党制和举行自由选举。此外，还有一些批评意见，他们要求改革政府。他们以粗暴的语调要求把地方会议主席撤职。他们越说越激烈，几乎真要造起反来。”

盖兰·伊姆雷也说到，集会后在一个名为巴格西·伊

姆雷的富农家里举行了会议，洛松齐·格佐也参加了这个会。几个富农和前警察局长基什一帕尔·厄尔诺，出席了这个会。他进一步证明：

“洛松齐谈到：拉科西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造成了错误，政府的改革完全是必要的。”

海都貝塞尔门的居民，领年金的契科什·伊姆雷的证词，表明了洛松齐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改革：

“讨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富农法泽卡什·贝洛他对政府进行了毁谤。从前当过宪兵的苏伊莫希说：领导者不学无术，不懂他们的工作。他要求有能力的旧人员回到领导的岗位上来”。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位前宪兵所要求的是哪一类的，“有能力的旧人员”的领导。

基什一帕尔·厄尔诺先生在他的证词中，关于洛松齐·格佐在这次集会上所起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说明：

“所说的知识分子大会是在10月23日前四天或五天，在海都貝塞尔门文化中心举行的。他们预先宣布洛松齐·格佐主持这次集会，但是知识分子只占到会人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农民，富农。会议的空气越来越倾向于反革命。他们不允许，党市委副书记勒瓦伊·山多尔发言。他们攻击地方会议主席，甚至有人提议要把他绞死。洛松齐·格佐根本没想遏止这种反革命的气焰。他讲到斯大林主义，讲到纳吉·伊姆雷说他适于做领导工作。……”

同时，西拉吉·约瑟夫在凯奇凯麦特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关于这一点，谢勒普切尼·伊姆雷，塞格德市会议主席，作了如下的证明：

“我在10月20日5点以前，到达了州会议大厅。我听到达洛什·费伦茨屋里有人说话。清楚的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革命者不是去想，而是要去干’。这人的语音，很陌生。当我走进屋子时，他们为我介绍，才知道他叫西拉吉·约瑟夫。西拉吉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只有学生和工人要求改革是不够的，农民也必须行动起来。”

国营农场场长，以后在州会议工作的莫哈契·卡罗伊在作证时，说：

“西拉吉·约瑟夫说，即使复兴运动有消极作用，我们也不要被它吓倒，因为革命变化也可能带来熔渣。以后达洛什·费伦茨问他，他所了解的革命变化是什么。西拉吉回答说，新的积极的力量将取得政权。接着达洛什同志劝他考虑一下，他所说的取得政权究竟是哪一类的政权，因为，据他看来，政权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在工人阶级的手里，这里所谈的只不过是把一些人民不信任的人撤换掉而已。西拉吉回答说：要是害怕革命的行动，那还算什么革命呢？”

秘密集会和秘密会谈

纳吉·伊姆雷集团举行了好几次秘密会议和会谈。他们认为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纳吉·伊姆雷的计划里包括建立多党制和联合政府。这就等于要破坏工人阶级和它的党的团结。哈拉斯提·山多尔和洛松齐·格佐，按照纳吉·伊姆雷的指示，和克特利·安娜进行了关于改组社会民主党的商谈。

哈拉斯提·山多尔在他的证词中说，和克特利·安娜

的會談是為了了解她對於再度參加政治的意見，並看看她是不是願意加入未來的納吉·伊姆雷的政府。

同樣的商談也和別人進行過。前社會民主黨議員，一度任農業部部長，以後退居于他的富農莊園的艾爾德加·伊斯特萬，在他的証詞中說，納吉·伊姆雷曾在1956年9月和他會談過。關於這件事，艾爾德加作了如下的證明：

“關於農業的意見，他問我，這些意見是否代表社會民主黨。我回答：克特利·安娜曾看過它，並表示贊同，塔卡奇·約瑟夫也沒有表示反對。我說，社會民主黨應該正式成立起來。

“……我警告納吉·伊姆雷不要採取折衷政策。他很了解我的意思，立時告訴我：他決不採取折衷政策。

“最後納吉·伊姆雷問我願意擔任什麼職務，我回答說，如果黨委任我，我很願意擔任農業部部長……”

艾爾德加·伊斯特萬的態度清楚地表明，納吉·伊姆雷集團和克特利·安娜集團是在什麼條件之下合作的。納吉·伊姆雷願意接受這些條件，就是：取消黨的領導，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成立其他政黨並給它們以權力。這些條件和他自己的計劃是同出一轍的，這就是為什麼他那樣了解艾爾德加·伊斯特萬的意見，並立時聲明“他決不採取折衷政策”的原因，納吉·伊姆雷和伊斯特萬的“徹底解決”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不是糾正錯誤和改革，而是政權的更換，是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制度和工农政權。

他們也商談過，怎樣把勞動青年聯盟拉到集團里边來的問題。馬庫什·伊斯特萬對此作了如下的證明：

“1956年10月22日的早晨，我在家里接到卡爾多什·拉斯洛的電話，約我在晚7點鐘去參加一個會議。

我是最后到会的。卡尔多什·拉斯洛、坦措什·加博尔、納吉·巴拉什都在場。以后洛松齐·格佐到了。坦措什說，第二天将举行劳动青年联盟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他們希望多数到会的人在中央委员会上用互选的方法取得席位。經過一番爭論之后，我們一致認為我們虽然不能預先知道次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将怎样修改綱領和改选领导人，但我們必須在会上象現在这样團結一致，以爭取最多的人当选。

“我們也談到，怎样在劳动青年联盟的执行委员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的问题。卡尔多什提議我們應該选举一个我們能掌握的人担任第一書記。也有人提議由洛松齐任主席，我們認為虽然到現在还没有主席这个职务，但我們可以提議由洛松齐任劳动青年联盟的主席，来帮助第一書記。洛松齐并没有表示反对。大家确定的目标是在整个劳动青年联盟的工作中贯彻納吉·伊姆雷的政治路線。”

当人民民主的敌人由于这个集团的破坏性活动的鼓舞而开始行动时，他們認為立即准备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經成熟，因而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制訂納吉·伊姆雷型的政治綱領。

在洛松齐·格佐被捕时所搜获的日記里，他記載着，集团中有几个成員，曾于10月22日晚間在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大厦开会。洛松齐·格佐的日記中記有下边一件事：

“會議的主題：准备納吉·伊姆雷的施政綱領演說。我們决定星期五晚間在我家里开会。多納特和哈拉斯提也将参加。事前各自起草个人的稿子，到时共同討論。”

吉梅什·米克洛什在他供詞中証實了這件事：

“大家同意由我起草關於匈牙利外交政策的問題，洛松齊·格佐準備關於愛國人民陣綫問題的材料。”

多納特·費倫茨，也參加了上面提到的在農業合作社聯合會召開的會議，關於這件事，他供認：

“1956年10月22日晚上6點鐘左右，我到了農業合作社聯合會。他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準備新政府施政綱領的經濟部分，因為納吉·伊姆雷很可能出任總理。他們還問到我對於農業部門的意見。”

第二天，10月23日，納吉·伊姆雷集團舉行了非法集會，並商定新任領導人的人選。

在上述的日記中，洛松齊·格佐寫道：

“10月23日晨，我打電話給哈拉斯提·山多爾、多納特·費倫茨、烏赫伊·西拉德、納吉·伊姆雷和亞諾希·費倫茨，請他們到我家里來談談當前的情況。

“10點30分左右，他們都來了。

“我們一致認為，在國內，按照我們的計劃實行變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政府應當實行根本改革。

“我着重地指出，我們不但必須清除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員，而且也要清除那些靠近斯大林主義的‘非黨人士’。根據我們的會談，我們必須把納吉·伊姆雷、哈拉斯提·山多爾、多納特·費倫茨、桑托·佐爾坦、洛松齊·格佐安置到政治局里。我們計劃中央委員會，除已提到的那些人外，應該包括西拉吉·約瑟夫、舒列茨·約瑟夫、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卡爾多什·拉斯洛、坦措什·加博爾、采爾·叶諾、盧卡契·季耶爾迪、弗諾巴茨基·山多爾、費克特·山多爾、吉梅什·米克

洛什、康亚·拉約什、海伊·貝洛、艾尔德加·山多尔、
亞諾希·費倫茨和拉克·拉斯洛夫人。

“我們也決定立即撤換最傾向于妥協的區委書記、
州委書記和地方會議主席。

“對於納吉·伊姆雷應出任總理還是黨委第一書記的問題，曾小有爭論。納吉的意見是，他應該作總理，而不是第一書記，因為人民懷念着他，並且願意他再作總理。別人也都贊同這個意見。

“以後，我們決定我們全體都應該受這個決議的約束。我們都應該遵照這個決議辦事。由於情勢迫切，我們每天都要開會碰頭。”

在2月6日的審訊中，亞諾希·費倫茨在回答審判長的一個問話時，對於10月23日早晨舉行的秘密會議，作了如下的供述：

“納吉·伊姆雷說，洛松齊曾請他和我到洛松齊家里去……。會談中所提的一些事，我都同意了，包括舉行青年示威遊行在內。另外，我建議將哈拉斯提·山多尔和烏赫伊·西拉德互選入中央委員會。洛松齊·格佐叫我記下當時的一些建議，我照辦了。”

雖然在審訊中，眾口一詞都證明納吉·伊姆雷想當總理，並且把這個作為他的活動目標，而且指使他的集團成員，為這個目的從事活動，並組織示威遊行——他却企圖在法庭上否認這個事實。1958年2月納吉·伊姆雷在法庭上說：

“洛松齊，也許是別人，說我最好是出任黨的第一書記。我說我從來沒有以第一書記領導過黨委會，從1953年到1955年群眾都知道我是總理。可是說我想作

总理是与事实不符的。”

与納吉·伊姆雷相反，瓦沙尔赫利·米克洛什在法庭上供認：

“大家談到怎样更动人选的問題，有人提議誰应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討論；我也发了言，提出人名和建議，我也被提名为中央委员会的未来委員之一……”

“我們也談到納吉·伊姆雷應該担任的职务。納吉·伊姆雷說；他很愿意出任总理，因为人民只知道他做过总理。”

納吉·伊姆雷集团，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合法的政府还存在时，就拟定了政府綱領和政府人員的名单。他們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合法政府，并取而代之。

从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会谈的目的并不是为对劳动青年联盟和党的領導机构作一些人事变动，而是为了夺取重要位置，企图在可能情况下，在領導上起指导作用，从而使这些組織变质。然后他們就打算利用这些組織作为实现他們的阴谋的工具。

組織 10 月 23 日的示威游行

通过在 10 月 23 日前所建立的关系，納吉·伊姆雷集团在許多大学里，进行了阴谋不軌的集会。10 月 23 日的示威游行就是在这些集会中酝酿起来的，这是反革命暴乱的前奏曲。

納吉·伊姆雷的党羽从一个大学去到另一个大学；他們編写并喊出煽动性的民族主义的口号。10 月 22 日，他們在工业大学举行的集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在这个会

上，在西拉吉·約瑟夫的鼓動下，他們作出了舉行示威游行的決定。

法庭辯護人問西拉吉·約瑟夫：

“10月22日你在工業大學所作的演說中有沒有強調你是納吉·伊姆雷的親信？”

“西拉吉：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我曾兩次發言。第一次發言時說，納吉·伊姆雷應當出任總理；我們的計劃就是讓納吉·伊姆雷掌握政權。

“在那里也對於應不應該舉行示威游行問題進行了討論。校長佐爾諾基表示反對。這使我不得不再度發言。我大概說了一兩分鐘，主張應該舉行游行示威。大家又說了不少關於學生去向納吉·伊姆雷請願的話。在我第二次發言時，我說這沒有意義，因為納吉·伊姆雷並不當政，因此，他們不應當去向納吉·伊姆雷請願，而應在次日去游行示威。湊巧，我和納吉·伊姆雷是很熟識的——我大概當時說過這樣一句話。”

工業大學的副教授，謝爾賓·帕爾，在證明西拉吉的發言時說：

“西拉吉·約瑟夫的演說是這次集會中的轉折點。他讚揚學生的主動精神。他說，近幾天他曾聽倫敦、巴黎、貝爾格萊德的廣播；這些電台經常供給可靠的真實的消息，它們的廣播，要比人民民主國家的電台更符合事實。他又用煽動性語調，講了一些其他的事，他大聲叫喊，幾乎控制不住自己；他的講演激烈地反對蘇聯。”

洛松齊·格佐日記的摘錄：

“革命青年和納吉·伊姆雷集團在星期二早晨開

会。納吉集团的意見是：应举行示威游行。”

証人，約薩·佩特尔太太，前斐多菲俱乐部經理，作了如下的証詞：

“1956年10月23日早晨，9点鐘左右，我去上班，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游行示威的消息。在这以前，在22日晚上，斐多菲俱乐部的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會議，我們用电报召回領導成員，我并不知道會議要討論什么事，但是后来，在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上，我听說，俱乐部已通过了第二天要参加示威游行的決議……

“再談10月23日的事，当我进去时，斐多菲俱乐部的领导人又在开会，当时还有各大学的代表出席。在作家中我看見了庫茨卡·佩特尔和澤尔克·佐尔坦。會議开了很久以后，大約在11点鐘，斐多菲俱乐部开始积极組織和指导这次示威游行。接着开始大批复印斐多菲俱乐部的口号，并依坦措什的指示，誰要就給誰。在这时，斐多菲的领导和大学的代表們彼此經常有联系，甚至有人在電話旁边守候着。这时，很明显，斐多菲俱乐部已把示威游行的組織和指导拿到自己手里。这个地方成了參謀本部，代表团不断地来来往往……”

烏赫伊·西拉德在他关于10月23日納吉·伊姆雷集团举行會議的証詞中說：

“在會議期間，关于示威游行的事，坦措什·加博尔會給洛松齐打了好几次電話。他們同意，坦措什應該用斐多菲俱乐部的口号来掌握示威游行。”

曾想在1956年10月23日对于准备示威游行作广播报告的托比亞什·阿仑作証如下：

“各大学的代表們，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斐多菲俱乐

部来取为示威游行而发的传单。我听见他们谈到：各大学或专科学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集合。我从一些人口里听到，游行时将有一辆播音卡车。我从另一些人口里听到，在游行期中，将有人守候在各大学校长的办公室里（看守电话）。”

工业大学通过了一份包括十四点或十六点要求的反革命请愿书。这些要求里含有象“公民被绑架到苏联”等一类恶毒虚伪的诽谤。请愿的目的是要改变制度，和苏联断绝关系，以及破坏匈牙利的法律秩序。在反革命暴乱期间，反革命分子释放了法西斯分子、战犯和一般刑事犯，进行血腥的白色恐怖，组织反动党团和出版反革命报刊，从这些行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要求的真实意图。

被挑起和引入歧途的大学生们，被煽动起来，他们要求把这些反革命主张在电台上广播。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很清楚人民民主政府是不会允许这样作的。整个行动的目的是在电台前把群众动员起来，并用这个作掩护，使武装反革命集团按预定的阴谋占领电台。

洛松齐在日记里有一段关于这件事的典型记载：

“伊姆雷的意见是：班克^①不应该阻止这十四点的广播。”

这就是纳吉·伊姆雷集团怎样准备、组织并指挥终于演变成为公开反革命叛乱的10月23日的反革命示威游行的经过。随着暴乱的开始，纳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长时期秘密策划的阴谋进入了实现的阶段。

① 当时的电台台长。

第三章

瓦解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

在納吉·伊姆雷任总理的时候，有关的国家领导机关对政府在当时的局势下的首要任务，曾經做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工人，粉碎反革命势力，依照华沙条约請求駐在国内的苏軍給予援助，并宣布戒严令。

納吉·伊姆雷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些决定，并在这些基础上，出任总理。他迷惑并蒙蔽了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团和他自己的政府，他欺騙和愚弄了整个的匈牙利人民，因为他伪装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民主制度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可是象每个人現在所知道的，他曾拟定一个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計劃，并领导一个为实现这个計劃而組織的秘密阴谋集团。納吉·伊姆雷在任总理时，并没有执行約束他的这些决定。他所以不这样作，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企图顛复人民民主制度——和这些决定有着尖銳的矛盾。但是，一直到10月23日的夜晚，他还沒有認為已經到了必須向领导和輿論公开自己的目标 and 計劃的时候。他还要等待到創造好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以后通过納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的有計劃、有企图的活動，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是：

1. 把共产党人和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驅逐出中央领导机构，并进而驅逐出全国的其他重要地位；

2. 解散武装力量——警察和军队；

3. 瓦解国家机构。

把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势力驅逐出领导机构

共产党人在部长會議中占大多数席位这一事实，在当时是納吉·伊姆雷集团实现他們阴谋的一个巨大障碍。

在他以总理身分从事活动的时期，他背弃了他的誓言，将国家合法的最高领导机构，国民議會、共和国主席团和政府擱在一边；而非法成立所謂“內閣”作为他自己的机关。以后，他們甚至还把这个內閣中的共产党員也清除出去，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政客。

馬庫什·伊斯特万和薩波·伊斯特万的証詞，揭示了納吉·伊姆雷集团的这种活动和他們的策略。馬庫什·伊斯特万在审讯时说：

“10月24日——記得是在中午——洛松齐打来了电话。我想澤尔克是和他在一起的。洛松齐叫我們（作家們）帮助他开列一个我們認為适合于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員和正在改組中的政府人員的名单。我也和他談話。当我問他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时候，他說，他所想的是一个由納吉·伊姆雷領導的、真正全国統一的政府。

“关于他們对新政府所抱的理想，我們覺得，他們認為提出和批准广泛的政治上的要求的时机已經成熟，也就是說，已經到了实现他們的政治理想的时候了。”

这些証詞，不但証明納吉·伊姆雷集团号召作家們提出这个集团将进入党领导机构和政府中去的人选，而且还揭

发了，納吉·伊姆雷集团已經在那时——在10月24日中午——开始改組政府，以便实现他們要成立联合政府的計劃。不过他們要实现这些計劃，就必须先創造好条件。

以下摘自薩波·伊斯特万的供詞：

“1956年11月1日，蒂尔迪·佐尔坦叫我們还有几个小农独立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到国会里去。他告訴我們，納吉·伊姆雷的政府将在联合的基础上实行改組，它将包括小农独立党、农民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了适应新形势，他認為小农独立党有必要在已提名的两个部长，即蒂尔迪·佐尔坦与科瓦什·貝洛之外再指定另一个人。他着重提出，他已把提名的优先权給了小农独立党。蒂尔迪接着說，在这这方面，他愿意我（薩波·伊斯特万）被提名。我問蒂尔迪，为什么要我。他的回答是：‘我愿意政府中有个农民’。执行委员会委員——包括我在內，同意了蒂尔迪·佐尔坦的意見。这就是我怎样做了納吉·伊姆雷政府的一个成員的过程。

“我和其他党派同时任命的新部长們，都沒有在共和国主席团宣誓就职。我要附带說明，我們的部长的任命，并未經主席团在口头上，或在背面上的批准。

“在11月2日早晨，我做为小农独立党委任的新部长和蒂尔迪·佐尔坦一起去納吉·伊姆雷的办公室。农民党的洛松齐·格佐和法尔卡什·費倫茨已經在那里；接着，艾尔德加·費倫茨和克勒門·貝洛也来了。納吉·伊姆雷談到在联合政府中，大家互相支持的必要。我們下午又在一起开会。法尔卡什·費倫茨，代表农民党，提議組成一个最‘高国务會議’，以代替共和國

主席团。

“我不記得，在这次會議上，或是在11月3日举行的會議上，曾提出过关于部长的職責权限問題。納吉·伊姆雷闡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說，不受政治情况变动影响的各部政务副部长将代替部长领导各部。各国务部长将监督这些机构。”

法庭掌握有11月2日内閣會議記錄的原文。以下是記錄的一部分：

“由于政府的改組問題日益迫切，內閣決定不再任命新部长。內閣将一方面用新的力量，主要是由起义的人們来补充；另一方面，內閣在現阶段将不委任领导各部的部长，各部将由有能力的副部长在內閣总理的命令下負领导責任。这主要是政务副部长性質的任命。此外，当入选問題沒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时，得另委一名政务副部长。”

納吉·伊姆雷集团，在11月3日实现了他們計劃中的一个主要項目：他們以扩大和加强全国政府为借口，任命克特利·安娜、克勒門·貝洛、菲賽尔·約瑟夫、薩波·伊斯特万、比博·伊斯特万和法尔卡什·費倫茨为国务部长，馬勒特·帕尔为国防部长。同时他們罢免了外交部部长霍瓦特·伊姆雷，內务部部长明尼赫·費倫茨博士，国防部部长楊查·卡罗伊，財政部部长科沙·伊斯特万，矿业电力部部长佐特納尔·山多尔，司法部部长莫勒納尔·埃利克，冶金和机械工业部部长切尔戈·亞諾什，化学工业部部长薩波·季尔季里，輕工业部部长納吉·約瑟夫，城市服务部部长納瓦尔·費倫茨，国营农場部部长里班什基·米克洛什，对外貿易部部长波格納尔·約瑟夫，國內貿易部部长托什·亞

諾什, 食品工业部部长尼爾什·雷佐, 採購部部长季納什·安托, 建筑部部长阿普罗·安托, 卫生部部长巴比什·安托, 文化部部长卢卡契·季耶尔迪, 副总理阿普罗·安托, 波格納尔·約瑟夫和艾尔德加·費倫茨。負責的部长位置, 除外交部和国防部外, 均未补充。

內閣是由下列人員組成: 納吉·伊姆雷, 总理和外交部长; 蒂尔迪·佐尔坦, 国务部长; 科瓦契·貝洛, 国务部长; 薩波·伊斯特万, 国务部长; 克特利·安娜, 国务部长; 克勒門·貝洛, 国务部长; 菲賽尔·約瑟夫, 国务部长; 比博·伊斯特万, 国务部长; 法尔卡什·費倫茨, 国务部长; 洛松齐·格佐, 国务部长; 馬勒特·帕尔国防部长。

納吉·伊姆雷和洛松齐把卡达尔·亞諾什的名字也作为国务部长列入內閣名单, 并把这个名单在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公布, 可是在那时候, 亞諾什和他的一些同志已和伊姆雷和他的政府完全断絕了关系, 并且当时納吉·伊姆雷等正在搜捕他們。这个事是納吉·伊姆雷和洛松齐所执行的迷惑和欺騙人民群众的有計劃活动的又一个証明。

在反革命暴乱时期, 任納吉·伊姆雷的秘書的巴洛格·約瑟夫夫人, 作了以下的証詞:

“11月2日, 西拉吉·約瑟夫, 大概依照納吉·伊姆雷的指示, 进行了对卡达尔·亞諾什和明尼赫·費倫茨失蹤事件的調查。他們詢問了司机和其他的人, 西拉吉的調查記錄的結尾說: ‘他們大概去苏联了。’ 这是在西拉吉、洛松齐、多納特和一些別的人面前向納吉·伊姆雷報告的。”

解散武装部队并武装反革命分子

納吉·伊姆雷集团成員在布达佩斯警察局的活动

納吉·伊姆雷集团的成員，于1956年10月23日，在科帕契·山多尔的合作下，在布达佩斯警察局設立了一个反革命中心。这个集团是一切破坏活动的精神领导，在它的指导下解散了大部分警察部队，在納吉·伊姆雷的指示和科帕契·山多尔与叛軍代表的協議之下，把反革命分子武装起来。

在洛松齐·格佐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关于1956年10月23日的詳細記載。其中的一段是：

“西拉吉約在10点到了警察局。科帕契命令不論在任何地方，不許向群众开枪。”

目击当时情况的警官，巴洛格·約瑟夫作了如下的見証：

“1956年10月23日早晨我們好几个人在科帕契办公室里，并且談到預定在下午举行的示威游行。这时，科帕契正在打电话。可以听出跟他談話的是西拉吉·約瑟夫，他在問游行从哪里出发。談話后，科帕契說，沒問題，因为他已和游行示威的人們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大約4点鐘——一群作家来布达佩斯警察局見科帕契。其中有阿澤尔·塔馬什、吉梅什·米克洛什、法澤卡什·季耶尔迪，和另外一些我叫不上名字来的人。科帕契把这些人領入秘書长的办公室，以后他就常常进去和这些人談判。

“在23日后，又有另一些人，例如西拉吉·約瑟夫、

梅拉伊·提博尔等，也参加了这一群作家。他们，由布达佩斯警察局，和纳吉·伊姆雷、作家协会以及其他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的团体，保持着联系。他们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例如，在纳吉·伊姆雷政府成立以后，他们又开列了一个新政府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里已经勾掉了仍在纳吉·伊姆雷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我亲眼看到了这份名单。

“这帮人把所有的备忘录和草案都交给科帕契看，他都表示同意。”

奥拉·维尔莫什，一个反动分子，曾参加围攻电台和其他武装行动的人，在受审时，曾这样供认说：

“群众在警察局前面的学生广场行进。他们要求释放犯人。到了下午，那里聚集了更多的人，并派出代表，要求释放犯人和除去红星。我听到说，科帕契·山多尔依照在场的作家——法泽卡什·季耶尔迪，阿泽尔·塔马什——的建议下令释放拘押在局内的人，并从房子上摘掉红星。安吉亚尔、萨波·亚诺什和我领导的示威群众开始为科帕契欢呼，并要求由科帕契担任内务部长。”

下面是摘自科帕契·山多尔在法庭的供词：

“审判长：10月23日以后，是否有非警察身分的人，象作家和记者一类的人到中央警察局去？”

“科帕契：有，其中有法泽卡什·季耶尔迪、西拉吉·约瑟夫、阿泽尔·塔马什。我记得吉梅什·米克洛什曾去过一次。另外梅拉伊·提博尔、洛契伊·帕尔、埃尔季什·佩特尔等人，我想，也都去过。”

科帕契·山多尔在纳吉·伊姆雷集团成员的影响之下

并依照他們之間达成的諒解，下令解散布达佩斯警察局。这就給反革命暴乱鋪平了道路。在审讯中，他說：

“在那里，經常和納吉·伊姆雷保持联系的作家和記者們，在討論所发生的事情。他們說，那是革命，是个民主运动……我为这評論所动摇，才下令区警察局应避免冲突，最好是和进攻的人取得諒解。”

“审判长：区警察局有沒有向你报告，叛徒在威胁着警察？”

“科帕契：是的，我接到了这样的报告。”

“人民法庭陪審員問：你对多少个区警察局下令，不准他們向示威者开火，應該和他們取得諒解，并把武器交給他們？”

“科帕契：我記得我命令第十二、十四、十一区放下武器，同时我命令第五、六、七区，帶着武器来中央警察局。我只記得这些。”

“我承認自己有罪，因为我曾接到上級领导的命令，我也作过就职宣誓，但是由于在警察局的作家和記者的政治影响，我违抗了我所接到的命令。”

“問：在中央警察局秘書处的記事簿中記載，1956年10月26日，你根据所接到的报告，曾对納吉·伊姆雷作了报告，并建議同叛党取得協議。安德拉什·赫格居斯前总理（当时的副总理——編者），反对这样作，并命令进行武装抵抗。記事簿中也記着：比罗什·拉斯洛，当时的內务部长，要你談談你为什么不对叛徒采取行动，你为什么不执行上級的命令？”

“科帕契：当我接到这些命令时，我已經知道了納吉·伊姆雷集团和法澤卡什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他們

曾声明，这些事件是个‘純粹的民主革命’。我最后認為，我应依照納吉·伊姆雷的政策办事，这就是我没有执行上級命令的原因。”

納吉·伊姆雷当时詢問他的同犯科帕契·山多尔：

“你怎么知道，那时在你那里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們和我有联系？”

科帕契·山多尔回答：

“我亲自听見法澤卡什·季耶尔迪和你通了两次电话。10月27日，吉梅什·米克洛什也曾和你或是你的秘書——我不准知道是誰——在电话中說过話。作家和記者，阿澤尔·塔馬什等人曾来我那里几次，告訴我，他們曾在国会里和你談过話。他們經常和你有联系。”

法庭在6月13日，听取了警官維格·提瓦达尔中校的証詞。他在自己的証詞中說：

“1956年10月我任第八区警察局长。我在23日报告，发现有人散发传单，請示怎样处理这件事。我接到的命令是这事警察管不得。

“大概是10月25日，反革命分子冲到警察局前面。我看到情况很危險，向中央警察局請示。科帕契告訴我，我們不应向群众射击，而應該和他們談判。暴徒向我們要枪。談判以后，我們接到繳械的命令，并撤退到中央警察局。”

納吉·伊姆雷集团的成員——包括科帕契·山多尔在內——在警察局里进行活动，和反革命分子直接談判，并和他們达成協議。

关于这一点，科帕契·山多尔供認：

“我們在布达佩斯警察局和叛徒首領在1956年10

月26日或26日进行停火談判并达成了協議。少將科瓦奇·伊斯特万、記者法澤卡什·季耶尔迪和叛党首領——我記得是杜达什·約瑟夫，蓬格拉茨和安塔洛契——出席談判。我們在三十分鐘內达成協議。从这时起，叛党領袖經常来布达佩斯警察局。約在10月末，他們被选入特警委员会。他們虽然在数目上比軍隊和警察的代表們少，可是在領導特警委员会的工作上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下是警察少將，貝雷茨·貝洛的証詞：

“我被領到布达佩斯警察局。科帕契正在和杜达什，基腊伊·貝洛等人協商。他們在談論把‘自由人民報’印刷厂給誰的問題。那时匪徒杜达什說：‘印刷厂是屬於我的！’他們向他冲去：‘我要打掉你的門牙！’‘印刷厂屬誰，由我来决定！’我被逮捕了并被領到另一个房間里去。科帕契看到了我以后，就和那些人挪到另一个屋里去了，一定是由于我在那里使他感到难堪。”

納吉·伊姆雷任命霍尔蒂參謀總部的軍官作特警的領導

納吉·伊姆雷任總理后，確認了部長會議所达成的決議，包括关于武装工人这一点。

可是，他不但沒有把工人武装起来，却命令把匪徒武装起来，并且把反革命匪帮的領袖編入特警革命委员会，并委任一个以前在霍尔蒂軍隊里的法西斯軍官領導这个委员会。他还成立了一个主要包括匪徒、犯人和反革命分子的国民警卫队，来代替警察部队。

以下是科帕契的供詞。

“10月29日納吉·伊姆雷从国会打电话给我，指示我組織新的特別警察，把叛徒也編进去，并且成立特警革命委员会作为国民警卫队的上层机构。他命令我去找一个受过良好訓練和有丰富經驗的人，可能是刚复职的人来領導特警委员会。我担当起这件事。在这基础上，我們通知叛党領袖来参加特警委员会的筹备会。”这个“有丰富經驗”干練的軍人，并“可能是个最近复职的人”就是基腊伊·貝洛。

基腊伊·貝洛是霍尔蒂前參謀將校，在1944年与箭十字党国防部长貝雷格菲共同从事机密工作，在1951年曾因間諜案被判死刑。以后被減为无期徒刑。基腊伊·貝洛从未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机构复职。他是在1956年10月31日，由納吉·伊姆雷非法复职的。

我們在这册子中，刊出了一封影印的开头写着“我亲爱的朋友費利！”字样的信。这信是基腊伊·貝洛在10月26日写的并同日寄給他的“亲爱的費利！”，也就是納吉·伊姆雷的女婿亞諾希·費倫茨的。以下是从基腊伊·貝洛的信中摘录下来的：

“我在期望着你来，可是重大的历史事件阻碍了你。我們迫切需要在這次聚会中——它并没有实现——談談我們在葬礼后只談了一两句的那个問題。

“当我听到納吉·伊姆雷的政綱（指那天納吉·伊姆雷在电台上所作的广播演說——編者），以及政府和党的決議，我真高兴极了。我的亲爱的朋友費利，这就是甚至当我們在一起工作时就確信的，为了这个事业，我願意献出我的一切力量、热誠和我微薄的力量。

“我一想到現在我还不能投入这个我所朝夕盼望

的工作时，我就感到十分悲哀。

“費利，我的朋友，我請你想想，考虑一下我的以往，我对工作的热心——这你是熟悉的——我的五年監禁生活……难道說我不适于参加这个建設事业嗎？通过你，我向納吉·伊姆雷和他的政府表示同情，并献出我的工作和我的热誠。

“……我想我的位置应在国防部的參謀总部里。

“在这时，我确是还没有正式复职……革命时期需要革命的措施，所以，一个简单的命令不是就可以恢复我以前的职銜和委派职务嗎？”

“委派基腊伊·貝洛的职务”和利用他的“工作，热誠和同情”，是不能耽擱的。他也并没有被擯于他所“朝夕盼望的工作”之外。

納吉·伊姆雷想把要任命基腊伊·貝洛的責任，交給同犯蒂尔迪·佐尔坦。

“我并不認識基腊伊·貝洛，从来没有直接或間接地听說过他。我也并不知道他的活动……蒂尔迪热心地推荐他。蒂尔迪說，我們不能找到比他更适合于这个崗位的人了；他是一个优秀的組織者。”

关于基腊伊·貝洛的委任問題，科帕契·山多尔作了如下的供述：

“納吉·伊姆雷同意有关基腊伊·貝洛的意見，并叫我們在下午去訪問他，并把基腊伊·貝洛和我們的关于組織国民警卫队的計劃带去。我們照办了，接着，納吉·伊姆雷以总理名义，委任基腊伊·貝洛为特別警察革命委员会的領導人，委派我为他的副手。納吉·伊姆雷給了我們委任状。另外，他給我們一个有他亲笔

签名的公告。”

有納吉·伊姆雷签名的公告，現存法院。这时，納吉·伊姆雷已承認“特警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成立和曾經采取各种措施使这个委员会首先由参加反革命叛变的队伍組成这个新的特警队。

科帕契·山多尔繼續供認：

“由于組成特警队的革命委员会需要几天時間，就不能武装工人，因为特警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部分武器都将分給起义者，因为要把他們編入国民警卫队。”

科帕契·山多尔回答他的辯护人的問題时說，他們在刚开始的头几天里，武装了两个工人小队。

“辯护人：你为什么停止这个工作的？”

“科帕契：因为我得到的納吉·伊姆雷的命令。”

联合国五国委员会認為有必要听取一下基腊伊·貝洛有关他在匈牙利活动的报告。1957年2月18日的美国杂志“生活”发表了这个报告。从这报告可以明显地看出，基腊伊·貝洛和他的反动同事們自然力求把工人阶级和农民出身的軍官們由武装部队里清除出去，并打算把匈牙利武装力量完全置于反动领导之下。以下是基腊伊报告的有关部分：

“我們以一昼夜的時間拟出我們的計劃。领导軍队的国防部和领导警察和边防部队的內务部，都混有拉科西的党徒，这就是說，有不可靠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领导这两个机关……一个能保証这两个組織的紀律性的委员会，这样国民警卫队就可以抵御苏联的攻击……”

基腊伊立时把这些提案呈交納吉·伊姆雷：

“我們在休息室里把写出的提案交給他看。接着納吉·伊姆雷在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旁边的一个靠椅上坐下来。他把提案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在上面写了些字，建議有些字應該更改，然后表示同意，并在上面签了字。当我们离开了休息室时，我們感到很驕傲，因为我們已得到了官方的委任有权控制两个部，或立国民警卫队足以維持公共秩序了……”

基腊伊·貝洛往訪当时的国防部长，告訴他，必須在四十个霍尔蒂的將軍和其他高級軍官复职后，他才答应出任布达佩斯的总司令。

在以基腊伊·貝洛为領導人的“特警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基腊伊·貝洛利用他的显要地位，毫无顧忌地进行他的反动活动，使反革命分子也“合法地”得到了军队的和內务部軍械庫的武器。納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可以依靠他們所成立的这个反革命武装力量，来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斗争了。

释放并武装刑事罪犯

反革命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释放政治犯和刑事犯，以便把他們編入反革命集团。文件証明，納吉·伊姆雷也知道这一点，并且知道有关释放犯人的“理由”。

10月31日早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所謂“革命委员会”，包括有演員达尔瓦什·伊万在內，来到集中監獄，开始一个一个地把犯人释放了。以下是1957年監獄长所写的报告：

“10月31日，释放了一百零八名政治犯。約十五或十六个罪行档案被放在一边，理由是：这些人的罪行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因而，这样的犯人不能释放。其中有判为战犯的宪兵中校阿尔博奇·亚诺什和箭十字党人、记者达文尼—纳吉·拉约什。次日，11月1日；一个名叫埃梅雷契的，和委员会几个委员一道前来。他审核了未被释放的人的档案后，声明说：“这些是我们的人；应立即释放他们。”他抗议，释放犯人的工作进行得太慢，接着派来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这样，在同一天内，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了。因此，有八百十二名政治犯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被释放。11月2日，一部分在11月3日，又有一百十三名刑事犯被释放。在被释放的政治犯中，有主要犯抢劫或谋杀罪的犯人。”

报告中所提的埃梅雷契是谁呢？以下引用1956年10月30日“自由科苏特电台”的广播：

“最近我们在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的接待室里作了一些调查。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人，现在他们正坐在播音室里。首先我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埃梅雷契”卡尔曼博士。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我因长时期看到对无辜的政治犯不予以妥善安排而感到不安。今天我接到通知，知道前政府所判处的政治犯已被由集中监狱转移到瓦茨。

“也许你和他们有关系吧？”

“是，其中有我的姊夫和几个朋友。他们在监狱里有好几年了。不幸的是，由那时起，我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现在我的姊姊告诉我，她的爱人，茨加尼·伊姆雷，和另外我的一些朋友乔卡·叶诺，赫德维季·居拉以及几个现在我不想一一提出名字的朋友，已被由集

中監獄轉移到瓦茨去了。我為這件事去拜訪過蒂爾迪·佐爾坦並請他採取緊急措施，以使這些誠實的匈牙利愛國者盡快得到釋放。蒂爾迪·佐爾坦答應了我，明天早晨將發出適用於所有政治犯的釋放命令……”

即使簡單地，我們也該提一提，埃梅雷契所說的“誠實的愛國者們”都是誰。他們是在19534被破獲的反革命保皇黨組織，所謂“博東師”的領袖們。即使為了好奇，也值得附帶說一下，這個陰謀集團包括在他們計劃中的行動有：占據電台和公共建築物，襲擊軍火工廠和汽車廠等——恰恰和1956年10月23日晚間開始干出來的事情一樣。

無論怎樣，他們已在廣播中，安定另外一些和他們同類的“愛國者”。並為了避免任何“錯誤”，“自由科蘇特電台”在1956年10月31日上午10時40分開始的節目中報告說：索爾諾克來的代表團——據說以“索爾諾克工人”為名——要求“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

納吉·伊姆雷對這事的回答：

“在這件事上，政府已曾採取措施。如果某些地方沒有按照政府的命令實行，那不能說是政府的過錯。”

“匈牙利獨立報”報導了集中監獄的事件，在結尾中寫道：

“……由蔡列克·加什帕爾率領的五人代表團，昨天拜訪了紅衣主教明曾蒂並請他擔任前政治犯組織的贊助人。紅衣主教接受了這個請求。”

最後統計，約有一萬七千名左右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從監獄被釋放出來。他們大都組成了武裝匪幫，或是加入了已有的一些匪幫，給反革命打下了基礎。“特警隊革命委員會”的首領基賈伊·貝洛、馬勒特·帕爾和科帕契·山多爾發

出成百的指示和命令，使反革命分子获得了大量的武器供应。

法西斯恐怖分子、箭十字党人、
战犯、盗匪和杀人犯横行全国

以下是由冗长的被释放的犯人名单中随意选出来的一些名字，他们多数都参加了反革命暴乱。

阿尔福尔迪·贝洛，前批发商人，1944年受賄隱藏十二个罪犯，以后把他们移交給斯瓦布的霍尔蒂警察。

阿特卡利·阿里斯蒂，德国“法本公司”軍事康采恩駐匈牙利代表的兒子，由于間諜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被释放后，在布达佩斯指揮一个武装集团。

巴科什·約瑟夫，是1919年后組成的赫亚什恐怖支队的队员，是在欧尔戈文大屠杀中的凶犯。

巴洛格·米哈伊，前宪兵，是个罪恶昭彰的西哈奇調查队的队员，在霍尔蒂时期，追踪并逮捕属于左翼运动的人员，其中有道比·伊斯特万和維雷什·佩特尔等人。

巴里茨·卡罗伊，霍尔蒂宪兵队軍官，1935年作警察司令时，在阿特卡尔命令警察开枪，有八人被击毙。

貝尔·約瑟夫和博科尔·居拉，前偵探，参与刑訊工人运动的几个首領，包括罗薩·費倫茨和斯康厄尔兹·佐尔坦。

貝格雷·阿尔博特，由于行劫監禁十三年。

巴尔托蒂·德佐，把索尔諾克州集中营成百的俘虏送往德国死亡集中营。

恰斯科奇·埃米尔，霍尔蒂的上校軍官的兒子，1955年由于叛国組織活动被判刑。

吉克瓦里·阿科什博士，霍尔蒂警察上尉，是个罪証确凿的謀杀犯。

达尔瓦什·阿蒂拉，由于間諜案被判刑。

达文尼—納吉·拉約什，箭十字党的“匈牙利信使报”的編輯。

德洪伊·拉約什，为謀杀納吉·尤里亚被判二十年徒刑。

艾尼迪·貝洛，霍尔蒂时期罪恶昭彰的反共审判中的檢察官。

埃斯特哈奇·帕尔伯爵，匈牙利最富有的地主之一，几个工厂和磨坊的主人，他参加过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薩克瓦里·埃米尔，曾任箭十字党政府閣員。

山托勒里·里查德(吉尼)，前宪兵中校。

瓦尔加·雷佐，贪污犯。释放后，曾参与謀杀法官莎尔卡迪·伊斯特万和福多尔·帕尔。他們是被盘据在“自由人民报”大楼里的杜达什匪帮所杀害的。

加尔迪·德尼什，美国諜报机关的間諜。

基腊伊·加博尔，赫亚什支队隊員，因为凶杀了十一人被判刑。

拉凱吉·捷尔吉和里馬澤西·巴尔納巴什，为組織名为“白色党”的秘密反革命組織被判刑。

里托麦里茨基·佐尔坦，霍尔蒂特別法庭的法官。

麦什科·佐尔坦，罪大恶极的箭十字党首領。

麦薩罗什·拉約什，他曾命令将八十多个有游击隊員嫌疑的人，在博欽处死；他亲手杀死了其中的十个。

納吉·亞諾什，1942年“諾維公園”大屠杀中的元凶之

欧德斯哈尔奇·佩特尔公爵，美国谍报机关“美国反间谍队”的间谍，1956年被捕。

下面是一些关于国民警卫队的记录：

特尔纳尔·居拉，曾经四次被判过徒刑，一次是犯窃盗案被判处五年徒刑。

维尔特西·拉斯洛，会计员，前霍尔蒂军官。1942年驻哈特万糖厂的警卫队长，箭十字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卡尔马尔·叶诺，前霍尔蒂军队反谍总部的告密者。

扬克·米哈伊，曾由于犯过各种罪行，几次被判刑。

托尔纳州“国民警卫队”博尼哈德小队的十三个队员，其中包括有：富农一名，前霍尔蒂军队的军官一名、上校一名、少校一名、大尉一名、上尉两名、中尉一名、宪兵队副官一名、宪兵一名。此外还有萨博·拉斯洛（国防十字章、勇士勋章的获得者），以及托克利·伊斯特万（前党卫军分子，战犯）。塔马吉支队的成员包括：霍尔蒂大尉两名（其中一人在1948年被判处徒刑）；上尉一名；前宪兵上士一名，此外还有一个过去曾犯过罪的。

布达佩斯第八区“国民警卫队”的队长是个罪恶累累的犯罪分子乌瓦里·约瑟夫。他把总部设在准格街的中央警察局。他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国家保安局的官员和其他进步人士。他的秘书，阿尔德卢什·约瑟夫夫人证明：

“乌瓦里在当司令期间，曾参加了几次抢劫和盗窃事件。我确实知道，乌瓦里曾领导匪帮闯进貝尔科西什街、约瑟夫街转角的酒店和拉科齐大街的食品店，特勒基广场的酒店，以及拉科齐广场的市场，进行抢劫。”

乌瓦里副手马耶尔·拉约什，是负责“逮捕保安人员的

行动組織”的領導人。从1952年起，他曾屢次因犯偽造罪和其他罪行被判处徒刑。

里普塔克·亞諾什，1948年曾因窩賊被判两个月徒刑，1951年又因盜竊國家資財被判两年徒刑，1952年因越獄和越境被判五年徒刑。

第八区的“国民警卫队”有一百六十人。其中八十人是以往的罪犯，象查尼·伊斯特万，从1932年起曾因犯盜竊案被捕十一次；还有危害人民的无賴，卡罗什·山多尔曾因犯各种罪行，象偽造罪、伤害人身、贪污公款和盜竊等被判过九次刑。

馬耶尔·安托尔，电工，对自己的历史作了如下的供述：

“1944年5月我看到德国党卫軍招募志願軍的布告。我报了名；一部分由于自己的志願，一部分也是为了錢。1956年10月28日，我自願投效国民警卫队，当了第三分队指揮。”

布达佩斯的工作人員，罗薩·拉斯洛，对馬耶尔在1956年10月的活动供称：

“在那里值班的国民警卫队隊員带来一个被捕的人。一个警卫隊員年紀較大，戴眼鏡，名叫馬耶尔，另一个年紀較輕。馬耶尔命令‘把他推出去，交給人民处理！把他推出去他們想营救他！’馬耶尔召集周围一些和他有同样观点警卫隊員，指示他們：‘不要叫中尉帮助保安人員逃跑掉。’接着，馬耶尔开始把保安局的大尉推过来推过去，并对守門人喊：‘把門打开，我們要把他交給人民’，于是馬耶尔就把这个保安部队的大尉警官踢到街上。另一个年紀較輕的国民警卫队隊員也这样作。

馬耶尔告訴我，他曾在党卫軍当过八个月的副官，和在霍尔蒂軍隊当过六年副官。”

証詞中所說的国家保安局的大尉，是托特·費倫茨，他被馬耶尔及其同謀者吊死在阿拉迪街和列宁大街拐角的树上。

捷昂季什·阿尔帕德，前霍尔蒂軍隊的大尉軍官，被委任組織密斯科尔茲的反革命营。瓦塔和森特馬尔东卡塔的安多尔·巴塔，是“匈牙利皇家中校”，在埃格尔組織了一个軍官支队。領導恩格瓦尔宪兵第一队第八分队政治班的阿吉·拉斯洛医生，也在居拉建立了同样的組織。他复写了許多份指示，給他的已經組織起来的部下——包括金澤什·約瑟夫——指导他們的工作。这些工作是：

- “1. 搜索并逮捕住在居拉的以前国家保安局人員。
- “2. 監視共产党領導人的住所，看他們是不是在从事組織活动，有沒有武器，是不是在准备反击。
- “3. 从所有商店和較大的工厂搜集干部的档案。
- “4. 犹太人按第二条規定处理。”

基腊伊·貝洛联合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目的是：叫“可靠的”霍尔蒂軍官們，最好是那些曾被判刑的来指揮“国民警卫队”。他的秘書巴拉·拉斯洛，对这一点，說：

“許多前政治犯都来拜訪基腊伊·貝洛。其中有不少人还穿着囚服，但是有几个已換上普通服装。他們沒有大衣，只穿一身粗布短上衣。基腊伊·貝洛叫他們赶快去取各种式样的衣服，并命令发給他們几个人警察制服。衣服是由‘少校’福尔瓦里分发的，他穿着警察的制服，并以基腊伊·貝洛的助手名义在文件上签字。前犯人得到了武器和衣服。基腊伊·貝洛不贊成前政治

犯成批地在布达佩斯警察局閑蕩。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由于他的提議，他們占据了本澤尔二十八号的房屋。并在那里設立了‘前政治犯战斗联盟’。我好几次亲眼看見过，基腊伊·貝洛在兴高采烈地招呼这些會員，他們互相擁抱和亲吻。例如有一次，一个前霍尔蒂軍队的軍官从捷昂季什来看基腊伊·貝洛，想对他訴苦，告訴他：在捷昂季什的国民警卫队組織已被共产党拿过去。这是不能容忍的。当时基腊伊·貝洛并不在，‘少校’福尔瓦里以他的名义发出了文件，証明在捷昂季什国民警卫队的組織工作全应由这个前霍尔蒂軍官来管理。这人还要到了武器。直到11月3日中午，武器完全被分发出去了。”

以下是由巴洛格·約瑟夫的証詞中摘录出来的：

“組織委员会也象基腊伊和科帕契那样，把武器、彈藥和其他装备毫无限制毫无选择地发给任何来人。例如，連伊薩貝拉街的杀人犯也借口是某一起义組織的首領而要去了武器。当时，在布达佩斯警察局，其实也可以說是在布达佩斯各处，流传着一句話：‘如果你想要武器，就去見科帕契’。我不确实知道科帕契和他的同謀者把布达佩斯警察局的武器和子弹分发了多少出去；总之我估計有好几万。”

科帕契·山多尔对人民法庭审判长关于分发武器的訊問的回答，說：

“取武器是需要命令的，但現在却无法核对，例如，几个人或是一批参加暴乱的人以一个工厂的名义来要五十支枪。有时我們認出他們中間有罪犯，包括伊薩貝拉街的杀人犯，但这并不是典型的事例。起訴書中的一

段指出主要是对流氓和犯人滥发武器是真实的。”

审判长把分配武器的证件给他看。

“科帕契：是，这些武器是由我签发的。

“审判长：那么，你知道这些证件上的组织确实存在吗？”

“科帕契：不错，他们是暴乱的队伍。我们供应他们武器和弹药。据我估计我们大约发出了一万五千支枪，也可能是二万支枪。证件是由我或是基腊伊·貝洛签字的，但是也有由别人签的。”

經签字承認的收据証明，由于依照基拉伊·貝洛的命令，在短時間內，仅仅由蒂莫特街倉庫发給反革命队伍的，就有以下这些武器：二千二百零六支卡宾和来福枪；三挺輕机关枪；二挺重机关枪；二十支手枪；一百顆手榴彈；一千三百三十九支手提机枪；还有其他无数的弹药。

反革命武装中心之一設在布达佩斯的科尔文街，也和設在魯納廣場的薩波匪帮一样，是由在反革命叛乱中被释放出来的罪犯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所組成的。梅斯·亞諾什是科尔文街的反革命分子的首領之一。他曾因盜竊，毆打司法人員，耍流氓，行搶等罪行先后判刑十六次。他以“洋科假脚”的綽号而聞名于黑社会。他們这一帮人，完全是由罪犯組成的。另一个在科尔文街的反革命“英雄”是迪林科·加鮑尔，他的綽号为“玩具”。他曾因盜竊，貪污，耍流氓等，被判刑七次。

反革命分子凱雷凱什·捷尔吉曾在科尔文街作战过，他供認：

“科尔文街的情况日益紧张。到11月2日，軍心几乎完全涣散。为首的一些指揮官們，先后被解除职务。他

們誰也不服從誰的命令。人們對最高司令也意見紛紛。11月1日—2日，這個隊伍幾乎整個散了。大部分人被從監獄里釋放出來的罪犯所代替，他們很熟悉科爾文街的队伍，到隊里之後，十分猖狂地要求由他們出來擔任指揮。

“例如，連科瓦奇·伊萬·拉斯洛的司令一職也於11月1日由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接替了。隊伍的力量增加了，我們估計有一千五百人。這裡集中的大多數是由全國各地來的屢教不改的罪犯。他們逮捕了許多人……”

納吉·伊姆雷內閣的馬勒特違背誓言

納吉·伊姆雷委任基賈伊·貝洛為國民警衛隊司令。他也為他的軍隊選擇了適當的人來擔任最高統帥——馬勒特·帕爾。馬勒特出身於貴族家庭，是盧道維卡軍官學校畢業生，曾在霍爾蒂軍隊里當過軍官，解放後加入民主軍隊。在反革命家亂的初期，他就投靠叛黨。

納吉·伊姆雷的賣國集團在11月3日夜晚，派遣馬勒特·帕爾去和根據華沙條約駐在匈牙利境內的蘇聯軍隊指揮官會談。蘇聯軍隊的將領及其軍隊，只有在合法的匈牙利政府的請求和在它負責的條件下才能在匈牙利領土上採取行動，因此，蘇聯指揮官並沒有和馬勒特會談。

同敵對的謠言相反，馬勒特·帕爾是被匈牙利當局逮捕而不是被蘇聯軍隊逮捕的。工農革命政府並不是由於他企圖和蘇聯軍隊指揮官進行商談而把他逮捕，而是由於他違背了他的就職宣誓，成了叛國罪犯，並且領導了與人民民主制度為敵的武裝力量。

艾尔德加·费伦茨虽然那时曾伴随馬勒特·帕尔去見苏軍指揮官，可是法庭并未向他提起公訴；这一事实，就足以証明。艾尔德加現在还担任着重要职务，任匈牙利科学院的秘書长。法庭也并没有对澤奇·米克洛什提起公訴，他也曾同馬勒特往見苏軍指揮官。

麦澤里·亚諾什，前上校，在他的証詞里，描述了馬勒特犯叛国罪的情况：

“……馬勒特率領在他指揮下的我的部队中的五輛坦克，依照部长的命令，在10月25日开往‘吉利安’軍营，企图夺回已在叛徒手中的軍营。以后我从几个軍官的談話里知道馬勒特已和‘吉利安’軍营的叛軍妥协，并充当了叛軍的司令。……”

下边是馬达拉斯·弗拉基米尔大尉的証詞摘录：

“据我了解，10月25日早晨，馬勒特依照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巴塔·伊斯特万的命令，去‘吉利安’整頓駐軍，也就是說，去設法恢复那里的秩序。馬勒特給国防部打了几次电话，报告說，他在和叛徒作战，因此不能亲自回去报告。可是后来发现，馬勒特不是在和叛徒作战，而是和他們并肩作战。”

塔里·亚諾什是个陆軍軍官。馬勒特·帕尔就是乘他的坦克一同到‘吉利安’軍营去的。塔里提供了如下的証詞：

“1956年10月25日早晨，我在布达佩斯亚薩伊·馬利广场遇到馬勒特·帕尔。他走向我們并命令团长帕洛什·费伦茨少校为他預备五輛坦克。他說，国务部长命令他派遣几輛坦克到科尔文街去鎮压那里的武装叛徒，占領科尔文街。帕洛什命令我开出五輛我所指揮的

坦克，和馬勒特同行。

“10月26日下午，我們對科爾文街的反革命分子開了幾炮。被馬勒特發現了，他立刻命令我們停火——制止我們射擊——命令我們爬出坦克，并把大炮掉轉方向。大約在同時，他下令在軍營前升起國旗，上面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徽已被剪掉。幾百個武裝人員涌進了軍營，把我們團團圍住，呼喊著法西斯口號。”

“問：馬勒特和反革命集團之間是什麼關係？”

“答：馬勒特和反革命分子們的關係十分密切。10月27日以後，他供應了‘吉利安’軍營幾貨車的食糧。我記得一次有一伙武裝人員來見馬勒特。他們帶來了十六點要求，馬勒特表示贊成，就是說，他同意這些要求，並且對其中的幾點做了補充。我記不清那些要求；我只記得其中有一些是關於立即撤出蘇聯軍隊，實行多黨制和有關軍隊的要求。”

10月29日，科爾文街的武裝反革命分子派了六名衛兵來保護馬勒特。10月30日，曾參加襲擊民主廣場市黨委大樓並接著進行野蠻屠殺的科爾文街的反革命分子們，對馬勒特作了報告，他表示贊許，還稱贊這些實行恐怖手段的殺人者說：“很好，謝謝你們。你們是勇敢的小伙子！”

馬勒特從此該升官了。“自由歐洲”電台幾天來竭力鼓吹的事，果然實現了。馬勒特·帕爾，於11月2日，被提升為少將，而在11月3日——如已經提到過那樣——他成了由少數人組成的內閣的閣員，國防部部長。下邊的議案是國防部部長馬勒特·帕爾簽名提出的，納吉·伊姆雷看過後，立即在左下角簽上了名字，表示贊同，日期是11月3日。

建 議

給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國部長會議

我建議通過下列決議，將邊防部队的管轄由內務部轉移到國防部。

決議草案

“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國部長會議第……項決議：

“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國部長會議自1956年11月3日起，將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國邊防部队置于國防部的統轄之下。

“國防部長將審核邊防部队的組織，並在他權限範圍內實行他認為有必要的改革。”

這樣的部長會議當時並不存在。就是在內閣的會議上也從來沒有討論和通過這個建議。納吉·伊姆雷曾看過它，並在上面簽了字，他授給領導叛亂的國防部長馬勒特·帕爾以全權來“貫徹他認為有必要的改革”。

總之，在國防部和在軍隊里，都有意識地和有目的地使前霍爾蒂軍隊的軍官能出頭露面，並占據重要位置。

11月1日基斯伊·貝洛命令成立“復職委員會”，其中包括基斯伊自己和前霍爾蒂軍官凱雷什和吉林斯基。幾天之內，申請人就超過了五百人；其中有三百人呈交了親筆寫的申請書。

這裡提一下這些申請人中的幾個就夠了：

退職大尉納吉·德佐，盧道維卡軍官學校畢業生，因故犯罪判處八年徒刑，1956年獲釋。

維達·拉斯洛以陰謀活動罪被判刑。

前少将巴里·山多尔，申請完全恢复他的小农独立党临时政治部代表的資格。他的申請得到了批准，并被派在国防部担任职务。

前奈麦斯薩丹伊和托罗贊特克洛什中将阿尔馬西·帕尔也出来呈請复职——他被派負責主持軍队的組織和动员。前中将科提·拉斯洛，以战犯罪被判徒刑十五年，因十月反革命叛乱而得到释放，也被派担任职务。

在基腊伊·貝洛，馬勒特·帕尔和其他几个同謀者积极参与下，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革命軍人委员会”。“革命軍人委员会”負責組織和指揮清洗陸軍參謀总部中的“不可靠”的軍官；瓦解軍队并废除了軍队的紀律，預防他們的反革命活动受到有組織的力量的反抗。为响应这委员会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幌子下所提出的要求，他們采取措施，保証在每一个軍事团体和机构中，在部队高級机关和团与独立营的參謀总部中，立即选举“革命軍人委员会”。

1956年10月31日武装部队的“革命士兵委员会”，警察和武装部队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选出了武装部队的最高統治机构——“匈牙利共和国革命国防委员会”。这个机关——甚至在它的名字上——公开地取消了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国，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委员会的成立和提出它的要求。这个声明发送到每一个軍事单位以及电台和报館。这个声明中的一項内容与废除华沙条約有关。

这样，前霍尔蒂軍官和法西斯分子，有的恢复了从前的地位，有的被提升和被任命新的职位；这些人和反革命的头子們，都被編到新成立的警察和軍队的“革命委员会”中去；这些“革命委员会”，通过电台和报纸，要求实现納吉·伊姆雷集团的另一个重要計劃——退出华沙条約。

馬勒特·帕尔的辯护人詢問吉梅什·米克洛什关于10月31日在‘吉利安’軍營所舉行的會議的細节問題。吉梅什答道：

“10月31日，在‘吉利安’軍營舉行會議時，我也在場，但是並沒有積極參加活動，我聽見了反對馬勒特·帕尔的話。馬勒特宣布開會，接着基腊伊·貝洛發言。以後又有別人發言；包括一個穿皮制短上衣的人，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的嗓音很粗。他攻擊馬勒特。因為馬勒特打了一個科爾文街集團的成員，並拿走了他的手提機關槍，象那個人所說的，他的六弦琴。馬勒特說，他在这人的口袋里查出婦女的耳環，於是才打了他。並且說，他僅僅是挨了打，已經够寬待了。接着，馬勒特問這個人對於這個解釋是否滿意，他們握了手。”

“檢察長：這是不是說，他們之間並沒有政治上的分歧？”

“吉梅什：是的，沒有。”

馬勒特·帕尔在回答他的辯护人的問話時說：

“我從來就不贊成由暴徒組織特警隊。”

可是和這話相矛盾的是，法庭掌握着馬勒特·帕尔所擬定的包含許多項條款的文件草案。馬勒特在草案中列舉出該執行的事，包括用“可敬的”軍官們（暴亂者）來補充軍隊。以下是馬勒特的草案的節錄：

“4. …… 在武裝部隊中，取消黨組織……”

“7. 參謀總部應為下列緊急事項提出計劃：

“如果蘇聯軍隊拒絕由匈牙利領土撤出……”

“10. 陸軍人事部應建議以忠誠的軍官們（暴亂者，復職人員等）來補充軍隊的實力。”

为了要将军队完全置于反革命势力之下，还另外采取了些措施。陆军政治教员学校取消，而代之以由纳吉·伊姆雷的女婿费伦茨领导的所谓教育处。

破坏合法的国家政权地方机关 和成立反革命团体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合法管理机构，以及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各地方会议，都是反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人民依法用民主方式选出的各地方会议，是由成百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代表人民，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因而，纳吉·伊姆雷和他的阴谋集团与反动的、半法西斯和法西斯势力都一致行动，首先着手破坏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他们解散了合法的管理机构，地方会议，经济管理机构，而代之以大部分由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所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和企图迷惑工人的“工人委员会”。这一行动，对破坏和废弃中央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革命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都操纵在法西斯匪徒，裙带分子、前宪兵、资本家、大地主和罪犯们的手里。他们猖狂向人民政权进攻——得到纳吉·伊姆雷积极支持。

纳吉·伊姆雷及其阴谋集团用“民主团体”、“人民自发成立的团体”以及“人民意志的代言人”种种名目来称呼这些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委员会，企图以此蒙蔽和欺骗群众。

实际上，这些委员会从来就不是依照民主方式选举的。有些委员会不过是自己委派的；另外也有的是由反革命暴徒和流氓所成立的。

组成这些委员会，并夺取了地方政权的这些分子的类型是最足以表现他们的特色的。

托尔納州：派克什的“民族委员会”的委员們，在自我介绍时說，“我曾当过二十年宪兵……”“我判过八年徒刑”。在达尔馬德，前霍尔蒂军队的軍官諾瓦克·埃登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派尔法，前农场主巴尔科契·約瑟夫成了委员会的委员。在德奇，前霍尔蒂軍官赫罗德克·亚諾什，前州长巴洛格·拉斯洛，以及过去的大地主薩仑太伊·叶諾都是委员会的委员。

貝凱什州：在巴东，前州长勒赫吉·安多尔和佐尔坦·約瑟夫，前霍尔蒂军队的上尉文迪奇·拉約什和曾因組織武装顛复活动罪行被判刑的苏佐尔·米克洛什，都是“革命委员会”委员。

在埃勒克村，霍尔蒂軍官苏奇·伊斯特万，霍尔蒂軍官巴拉巴什·阿达姆，富农基希·伊斯特万，霍尔蒂軍官沙托什·叶諾，箭十字党領袖哈斯·莫尔东都是反革命叛乱期間的头子。在凱列斯拉丹的委员会包括：前匈牙利党卫軍“洪亚迪”的軍官薩馬里·拉約什，前宪兵上士托特·卡尔曼。前霍尔蒂軍官，大地主少校莫尔納尔·米哈伊成了居拉瓦里委员会的主席。

哈德一比哈尔州：在“革命委员会”中积极活动的委员有：一百十二名富农，六十七名前宪兵，四十四名前霍尔蒂軍官，三十九名牧师，二十七名被判过徒刑的人，十三名前霍尔蒂军队中的士官，十三名前市鎮长，三名前地主，一名“勇士”勋章获得者，和一名前卫士。

下边是尼雷吉哈薩民族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前霍尔蒂军队的上尉軍官恩伯雷費尼·拉斯洛；西克拉伊·伊斯特万医生，前律师；霍尔蒂军队的大尉卢普科維奇·捷尔吉，前地主，国会議員，小农独立党党员，霍尔蒂政府的司法部

参事。

佩什特州：贊特·拉斯洛，前費耶尔州州长，成了莫諾尔区“民族委员会”的主席。贊特曾因参与納吉·費倫茨叛国阴谋活动被判刑。前霍尔蒂时代莫諾尔鎮書記巴拉尼·費倫茨成了副主席兼秘書。委员会的其他委員是：兰格耶尔·山多尔，前农場主，一个霍尔蒂將軍的兄弟；里里克·費倫茨，箭十字党的积极組織者；富农富西·伊姆雷；卡尔巴赫·安托尔，箭十字党律师。前霍尔蒂驃騎兵大尉馬罗蒂·亞諾什，被委任为“国民警卫队”的司令；前宪兵副队长馬特亞什·費倫茨成了“国民警卫队”的軍法处处长。馬特亞什的僚屬有四个是前宪兵軍官。

“州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資本家，工厂主德涅什·伊斯特万博士。

包尔紹德州：在博尔多格科瓦拉尔亚村，“勇士”阿尔瓦伊·埃勒麦尔成了“区工人委员会”的副主席。在“选举”时，他作了如下的自我介绍：“我是霍尔蒂軍隊中的一个軍官，卢道維卡軍官学校的毕业生。我由于煽动反对人民民主制度被判过几次罪。十二年前，我隱藏了武器，几支来福枪和一支手提机关枪。現在，我都把它們交出来。”麦佐科維什德的区委会主席是律师米瑟伊·拉約什，他是拥有一百五十霍尔德土地的大地主的兒子。麦佐薩特的委员会的主席是，拥有七十霍尔德土地的地主德特卡·居拉；在澤姆普勒納加尔德的是拥有一百霍尔德土地的地主巴拉蒂·貝洛博士；在吉什罗茲瓦吉的是前宪兵維格·山多尔。在麦佐克雷斯特什是拥有一百二十七霍尔德土地的地主賈巴·卡尔曼。

我們可以举出无数的各州、各区和各村的委员会人选

来。各“革命委员会”里都充满了以前的剥削者、反人民分子和法西斯恐怖分子。即使这些委员会不是完全由他们组成的，但也是由他们把持着。

纳吉·伊姆雷和这些反动的法西斯分子有什么关系呢？

纳吉·伊姆雷在他的10月28日的演说中说：

“政府支持人民主动创立的新的自治的民主机构，并且将设法使它们成为国家管理机关的一部分。”

两天后，纳吉·伊姆雷说得更露骨了：

“……人民政府承认由革命产生的自治的地方民主机构，依靠它们并要求它们给予政府以支持。”

如所周知，纳吉·伊姆雷企图以匈牙利农民的代表和朋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的集团也以此在农村里为他吹嘘。在反革命叛乱期间，在纳吉·伊姆雷就任总理的头一个星期，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农民的朋友，而是渴望着恢复旧势力的地主、富农和农民的剥削者的朋友。

工人委员会的反革命计划

1956年10月，工人委员会在几个工厂中成立。反革命分子立刻出头露面，并且立即从工人委员会中排斥诚实的工人，使在工厂里进行秘密活动的反动的，反工人阶级的分子把委员会的领导权夺取过来。反革命匪帮为的是借助这些工人委员会来制造一种印象，使人认为工人阶级，或是它的一部分，也拥护反革命。然后，它建立了工人委员会的制度，即所谓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企图把整个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大权，转交给由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工人委员会。

由于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列举加入这些“工人委员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工人”。

在磨粉机器工厂，前财政部参事长格莫里·卡罗伊是“工人委员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以后的主席。前霍尔蒂军队上校军官的儿子弗加拉西·阿提拉和霍尔蒂时期的州长德卡·费伦茨，成为体育用品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的领导。领导“欧里昂”无线电厂的工人委员会的是前矿业大王和霍尔蒂时期的军官马季耶尔·勒文特的妻子。其他“工人委员会”领导人物是：在第十四汽车运输公司的是过去的地主德吉·卡吉·居拉，在文具工厂的是过去的资本家，工厂的经理渥罗什·拉斯洛；在电机和电缆工厂的是欧尔本·博多格。除了这些男爵、地主和资本家之外，还有一伙无赖暴徒和法西斯分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工人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有許多人占据了领导地位。例如，霍尔蒂—薩拉希^①时期国家毛纺织厂的副警备队长巴贝伊·伊斯特万就成了“中央工人委员会”的秘书。曾因盗窃被判刑的武装反革命分子涅麦斯克里·约瑟夫竟成了中央工人委员会另一个恶名昭著的委员。

1956年10月31日联合白熾电灯公司举行的工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暴露了成立工人委员会的一些情况和“原则”：

“格兰伊，第四区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说：白熾电灯公司的工人委员会的组织不健全……他提议选举一个临时的由六个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

“他自己进行过三年的秘密活动，他们所在的组织

① 匈牙利的希特勒法西斯箭十字党的党魁。——譯者

进行过一百四十四起破坏工厂的活动和十四次縱火。”

在包括这个为自己冒险行为而洋洋得意的格兰伊的新佩斯的“革命委员会”里，其他委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下面是一些委员的简历：

加博尔·拉斯洛，使用假证件的流氓。里赫登斯坦·山多尔，1950年因盗用公款被判刑。塞伊·卡罗里，前箭十字党分子，1946年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被释放。委员会在新佩斯组织了在前霍尔蒂军队的军官们指挥下的、拥有一千五百多人的武装集团。纳吉·山多尔，前霍尔蒂军队的中校，被委任为该集团的司令。由于委员会主席的命令，从科本亚监狱释放出一千八百多反革命和一般刑事犯罪分子。被释放的罪犯，有很多被吸收到武装集团里去。

这就说明了“新佩斯”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组织一个这种性质的“工人委员会”了。现在让我们引用这个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来进一步加以说明：

“根据全国革命委员会的决议，我号召所有临时革命工人委员会的会员，在选举永久工人委员会时，注意下列各点：

“……在拉科西统治时期任职的，象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工会委员会主席，人事处处长，保安人员或游击队人员，以及积极支持那个政权或对它表示拥护的，将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果属于上述的某一种人已被选入现在的临时革命工人委员会，应立即予以撤职。”

这个决议只能有一个解释：任何忠于人民民主制度的人都不能当“工人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决议并不是什么例

外的事情。例如，根据“只有可靠的人才可以当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指示，在馬罗克福尔德（薩拉州）的“革命委员会”就不許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庄員参加；而前村長箭十字党分子托特·格佐，现在却成了委员会的委员！

因此，納吉·伊姆雷支持这些“由革命产生的自治的地方民主机构，”并打算把它们列入国家管理机关的編制以內，事实上他这样作了。虽然，从上边所提的那些決議和其他許多具有同样意义的決議中，可以看出，根据反革命分子的計劃，任何进步的劳动人民都不允許参加这些委员会，而对箭十字党分子、反动派、資本家和地主們，却敞开了大門。

“知識分子革命委员会”在瓦解国家机构，成立一大堆“革命委员会”和“委员会”以及在提出荒謬的反动要求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納吉·伊姆雷阴谋集团的成員包括：哈拉斯提·山多尔，米克洛什，瓦沙尔赫利，坦措什·加博尔，納吉·巴拉什，卡尔多什·拉斯洛和阿达姆·季耶尔迪，这些人成了委员会的领导力量。这个委员会和洛松齐·格佐保持着經常的直接的联系。

“知識分子革命委员会”，在10月28日举行的會議上，通过了带着露骨的反革命要求的宣言。这个宣言通过传单、报纸和电台被传播出去。

許多“革命委员会”都拥护这个宣言，并支持那些反动的要求。从上述它們的成員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

馬庫什·伊斯特万在他的証詞中說，成立“知識分子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在于聚集斐多菲俱乐部派的知識分子，并使这个組織成为納吉·伊姆雷政府的基础。

坦措什·加博尔，斐多菲俱乐部的秘書，在他的証詞里說：

“我們成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帮助納吉·伊姆雷政府，并使它在知識分子中間拥有群众基础。我們的观点具体表现在委员会于10月28日的会上通过的宣言中。我現在清楚地認識到，这个宣言無論在措詞上或者在内容上都助长和鼓励了反革命势力。”

納吉·伊姆雷組織“下层压力”

多数人認為，納吉·伊姆雷是为事态的发展所“驅使”的，他是由于被迫而不得不屈服于下层压力之下的；特别是納吉·伊姆雷集团分子都在帮助散布这种观点。

現在有大批証据証明納吉·伊姆雷自己組織了这个“下层压力”，以便一旦实行他預先酝酿成熟的有意識的密謀时，可以欺騙人民說：他只是屈服于“公众輿論”和批准“人民的要求”。

听过广播和看过报纸的人們都可以記得納吉·伊姆雷贊成任何一个代表团所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的这一条新聞。当这些談判在广播电台发表后，将有更多的代表团出現，并且提出了比以前更多的要求，这是不难預料的。

“自由欧洲”电台，以“匈牙利广播中所反映的匈牙利革命和解放斗争”为题，用匈牙利文出版了匈牙利电台在1956年10月23日—11月9日期間所广播的节目内容（第八卷，第十至十一期。自由欧洲出版社，“自由欧洲委员会”科，紐約第十六区，公园大道二号）。这本书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頁上写道：10月26日，星期五，下午〇时58分，科苏特电台广播了一项新聞，标题是：“包尔紹德工人的重要宣言——納吉·伊姆雷同志接受包尔紹德工人的要求”，新聞中叙述，以福尔德瓦里·卢道尔夫为首的包尔紹德州的工

人代表团，曾訪晤納吉·伊姆雷总理。代表团呈交了一个包括二十一点的請願書，其中有：調查匈牙利的外貿易协定并予以公布（这个要求，早在11月13日“自由欧洲”电台就提出来过）；糾正經濟計劃所造成的严重錯誤，把負責人撤职；另外还有其他許多要求。他們还要求苏联軍隊在1月1日以前撤出匈牙利国境。广播接着說：

“納吉·伊姆雷同志在回答包尔紹德州和密斯科尔茲的工人时說：他贊成他們的每一項要求，并且准备实现这些要求。一个新的政府——一个爱国人民陣綫的政府——将在今晚或明天早晨成立。他說，他在选择政府的成員方面，將認真地考虑根据群众意見所反映出来的願望、要求和建議。这些要求具体現在他的新政府施政綱領中……納吉·伊姆雷同志解釋說，在短时期內，綱領中的某些要点將提前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情况都是10月26日中午发生的事！仔細体会广播的原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在告訴“公众輿論”——不是隱晦曲折地，而是十分公开地——提出有关組織政府的願望、要求和建議，因为納吉·伊姆雷將認真地考虑这些要求。这是在策动提出要求，因为納吉·伊姆雷在制定他的新政府的施政綱領时要参考这些要求。納吉·伊姆雷还說，綱領中的某些要点有提前实现的可能！

11月2日，另外一个包尔紹德州的代表团来到了国会。这里是引自“自由欧洲”电台出版的那本書的第二百九十五頁上有关这个代表团的^一要求的一段新聞，是“自由科苏特电台”于11月2日上午10时广播的：

“政府必須采取适当步驟，以保証在各州和布达佩斯的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国革命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应该由各工人委员会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代表团组成。由于这一步骤前国民议会将被认为已经解散……”

包尔绍德州的出头露面的反革命头子们，完全了解关于初次会晤所得到的消息的意义；施政纲领有提前完成的可能！

“自由科苏特电台”在10月31日下午11时40分所广播的声明中，对煽动公众舆论和征求更多的要求的企图提供了证据。它说：

“听众将要听到‘大学生革命委员会’所发出的一份请愿书的原文。我们认为现在的政治领导只是暂时的。我们将在政府答应我们要求的范围内给纳吉·伊姆雷以支援……”

大学生委员会接着要求电台开除那些曾经诽谤过“光荣的解放战争”的职员；并且由电台的革命委员会和大学生革命委员会，这个曾经点起解放战争火花的青年组织，共同宣布开除等等。

电台对大学生革命委员会的请愿书，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完全支持这种观点，那就是必须对现在还在政府里存在的倒退倾向和势力继续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人事更动对于斗争也有很大的意义。已经取得的一个胜利是：自由战士的指挥者‘吉利安’军营的英雄保卫者，马勒特上校已被任命为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总参谋长已被撤职。我们将和全体爱国人民一道，在这个战斗里，竭力争取辉煌的战果。”

就是臭名远扬的联合国五国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反革命的口号和要求并不是人民群众提出，而是由纳

吉·伊姆雷及其陰謀集團提出的。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散布這些言論，是為了借口說那是“人民的意志。”聯合國五國委員會的報告書的第三百三十九款關於這一點有如下的記載：

“中立的聲明，對於和納吉先生在十月事件以前就曾有过接觸的某些匈牙利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值得驚奇的事。本委員會曾接到報告說，在納吉先生於1955年退出積極的政治生活以後，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匈牙利可以按照奧地利的榜樣採取中立立場，他也曾向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和蘇聯的領袖們，談過他對這方面的看法（我們知道，這句話的後半並不真實。納吉、伊姆雷的計劃都是隱蔽的，不讓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特別是不讓蘇聯領袖們知道——編者）。從10月27日起，他似乎曾經和他的部下以及訪晤他的客人談過這個問題。有關這方面的消息，一經在布達佩斯和全國傳播開來，各工人委員會和其他革命機關，以及政治、軍事和宗教界的領袖們，就在10月29、30和31日，紛紛聲明竭誠擁護。”

這是納吉·伊姆雷的主要支持者對於他用來欺騙人民的、偽善的、不老實和狡猾的策略所開列出來的罪狀。

吉梅什·米克洛什、洛契伊·帕爾、阿澤爾·塔馬什
扮演安格亞爾福爾德工人

1956年10月27日，納吉·伊姆雷接見了“安格亞爾福爾德工人代表團”，這個和總理會談了三個小時的代表團，是一個奇怪的集團。代表團團員中大多是納吉·伊姆雷的反革命集團中的知名人物，他們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

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阿澤尔·塔馬什，吉梅什·米克洛什，洛契伊·帕尔，西拉吉·約瑟夫和其他几个同伙。这个由九到十人组成的代表团，确是包括了两个安格亚尔福尔德市的青年工人。这个“安格亚尔福尔德工人代表团”，在组织和作用上，和許多的“反革命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却很相似。

当时那两个年轻人，恰好偶然在城里；没有人推选他们作代表，他们也并没打算参加代表团。其中的一个正给他住在第六区的姐姐送饭，另一个是跟他同行的。約薩·佩特尔和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他碰到了他们就马上打电话往布达佩斯警察局，找科帕契。科帕契就为这两个青年派来一部汽车——这就是他们怎样来见納吉·伊姆雷的经过。

这位国家的总理，納吉·伊姆雷，用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随着他的集团分子一同来的青年会谈。为了納吉·伊姆雷可以在这个“工人”代表团面前做最秘密的煽动，就有必要预先布置好这一次会谈。

这一次会谈的真实情况如何呢？

以下是摘自西拉吉·約瑟夫的供词：

“……納吉·伊姆雷接见了我们。除我之外，团员中还有阿澤尔·塔馬什，吉梅什·米克洛什、洛契伊·帕尔，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总共大概是十个人。我问納吉·伊姆雷他是不是知道城里发生着什么事情，他是不是知道他的名字已签署在当场裁决的法令上，和已经用他的名义把苏联人请了进来。我提醒他，我们同意过的是一个和这个不同的政策。納吉·伊姆雷回答说，他并没有请求苏联人来——而是事后企图使他签字承认。至于当场决定的

法令，他並沒有簽字——事實上，是別人把他的名字簽上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把代表團帶來了，讓他們告訴他，城內的情況。接着，在場的人都發了言，我也記不起誰說了什麼。代表團並沒有提出書面請願——只是口頭提出的。最後，納吉·伊姆雷叫他們暫且忍耐一下。他說，有些重要的決議已在醞釀中，第二天（10月28日——編者）將發表一個使你們滿意的公告。并說，在這個公告中，我們將要明確，這個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並不是反革命；我們將宣布蘇聯軍隊撤出布達佩斯和將作其他一些重要聲明。大約過了三小時以後，我離開納吉·伊姆雷的辦公室，心里才安定下來。我們回到布達佩斯警察局，科帕契用汽車把代表團的團員送回家。”

納吉·伊姆雷，在10月23日—11月4日期間，干了許許多多虛偽、誣蔑和欺騙的勾當，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不但使工人代表團相信，而且也使全國的公眾輿論相信，他並不知道部長會議請蘇聯軍隊援助，也不知道公布戒嚴令的決議。電台在10月30日下午6點30分的節目中，作了如下的廣播：

“匈牙利人民！你們現在將要聽到一個重要的消息。我們的一切痛苦和恥辱是由兩個法令造成的，它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并且使成千上百的人死亡。一個是把蘇聯軍隊請到布達佩斯來的決議；另一個是對自由戰士們施行了不光榮的戒嚴令。我們對歷史負責，也對自己負責，現在聲明，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事先並不知道那兩個決議！部長會議請求蘇聯軍隊援助的決議和施行戒嚴令的決議，並未經納吉·伊姆雷簽字。製造這兩個法令的是赫格居斯·安德拉什和格

罗·埃尔诺，他們該受良心的譴責！这两个人，由于这两个決議，將受到国家和历史的裁判。”

納吉·伊姆雷真不知道宣布戒严令嗎？

以下是引自納吉·伊姆雷在1956年10月24日中午12点10分的广播演說中的一段。

“这是納吉·伊姆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會議主席，向布达佩斯人民講話，告訴你們，一切为了避免大量流血而在今天下午两点以前，停止战斗和放下武器的人，將免受戒严令的制裁……我們采取的是綏靖政策，而不是报复政策。所以，政府決定对立即自动停战并放下武器的人們，不实施戒严令……”

同一天，电台在12时19分宣布：

“巴罗什广场武装‘起义’者所派的五名停战代表見了納吉·伊姆雷同志，告訴他，如果能得到普遍赦免，他們願意立即放下武器。他們的条件已經被接受！”（引自“自由欧洲电台”广播手册，第二十二頁）

1956年10月25日下午3时18分，电台广播了納吉·伊姆雷的演說：

“……为了我們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利益而干預战斗的苏联軍隊；一旦和平和秩序恢复，立即撤退。

“任何不以推翻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为目的而拿起武器的人，如果从此停止战斗、放下武器，政府將对他們采取寬大温和的态度，不对他們实施戒严令。同时，为了渴望和平和安宁的工人同志們的利益，为了保卫我們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我們將对那些繼續进行武装攻击、煽动和搶掠的人們，施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如果我們把这个声明和以上所引的10月30日广播的公告比較一下，納吉·伊姆雷的两面派态度就很明显了。10月25日他談到“社会主义”，談到“人民民主”，并且說，他認為苏联对这个战斗的武力帮助是十分必要的，他所以这样作，原是为了迷惑忠于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們，阻止他們的行动。但是当他認為公开露面的时机业已成熟的时候，他就使用狡猾手段来取得反革命分子的同情，并且亲自領導他們，努力实现他的不可告人的計劃。

在国会大厦納吉·伊姆雷的文件中找到了經過首都法院院长签字的1956年10月24日宣布戒严的命令。在这张紙的背面，有納吉·伊姆雷亲笔写的一些注。这张命令以及納吉·伊姆雷在背面所記下的小注，都照了象，影印在这本書的附录里面。

另一个影印照片是写有10月24日日期的文件，在納吉·伊姆雷的签字上方，有以下的文字：

“給布达佩斯的公民，

“通知你們，对一切为防止更多的流血而在一点鐘以前停止战斗和放下武器的人們，将不实施戒严令。”

在这里，时间是定在一点鐘，而10月24日的广播演說——上边已引用了有关的一段——中說是两点鐘。原因是：电台講演是在12点以后广播的。无论如何，令人憤恨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一再宣布延长繳械的最后期限。

檢察官在审讯时，訊問納吉·伊姆雷几个有关宣布戒严令的問題：

“檢察官：你說你並沒有宣布戒严令？”

“納吉·伊姆雷：我並沒有那样說。在无线电台的广播声明里，我提到了戒严令和它的实施。”

“**檢察官**：你是否真正執行了戒嚴令？

“**納吉·伊姆雷**：這並不在我的職權之內。我做了我責任內應做的事。我認為戒嚴令只能適用於一般刑事犯。

“**檢察官**：你並沒有打算把戒嚴令適用於以非法手段取得武器，並使用這些武器來攻擊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那些人嗎？

“**納吉·伊姆雷**：是，我沒有打算對這些人施行戒嚴令。”

最後，在証詞、其他被告的供詞以及在審訊中對他揭露出來的文件材料的確鑿證明之下，納吉·伊姆雷，在關於宣布戒嚴令的決定這一點，作了如下的供述：

“10月24日，赫格居斯和格羅建議，有必要宣布戒嚴令。我被說服后就簽了字。我諮詢了司法部長和檢察長有關宣布戒嚴令的辦法和手續：我囑咐司法部長要慎重實施，以免過分，但也吩咐他，在必要時，就要嚴厲執行。我在10月24日白天和司法部長、檢察長討論了實施戒嚴令問題，並大約在中午在法令上簽了字。”

因此：

納吉·伊姆雷談到戒嚴令，他說，放下武器的人們可免受戒嚴令的制裁；

納吉·伊姆雷說，他並不知道戒嚴令這回事；

納吉·伊姆雷說，他並沒有在宣布戒嚴令的法令上簽字；

納吉·伊姆雷說，他認為戒嚴令只能適用於一般刑事犯；

納吉·伊姆雷供認他曾在宣布戒嚴的法令上簽字，並

下令严厉执行。

納吉·伊姆雷，在一定的情况下，依照他个人认为最有利的观点，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或是否認，或是詭辯，或是承認他的罪行。

納吉·伊姆雷不允許打亂他的計劃， 阻撓采取肅清反革命的措施

納吉·伊姆雷濫用他的部長會議主席的職權，在各種情況下和各方面破壞了為粉碎反革命叛亂而通過的決議。他武斷地解除了宵禁，因而使已經瓦解了的武裝反革命分子重新聚集起來；不使已組織起來的隊伍鎮壓這些反革命集團。他阻止對武裝叛亂者實行他曾親自簽過字的戒嚴令。他阻止忠於黨的軍隊去殲滅盤踞在科爾文大街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強迫他們投降。他雖然完全了解在街道上造成的恐怖罪行，他却在10月28日發出停火命令，因而麻痺了為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而作戰的忠誠的武裝部隊。

沙格瓦里·阿格涅什，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工作人員，在這一問題上，作了如下的證明：

“……宵禁命令原是為了納吉·伊姆雷所簽發的，那時他稱許它是对付反革命叛亂的有效措施。10月25日早晨，亞諾什當着我的面，催促納吉·伊姆雷立即解除宵禁。納吉·伊姆雷就立即把宵禁令解除了。在10月25日的下午和晚上和26日，幾個同志尖銳地批評了納吉·伊姆雷解除宵禁的專斷行為。”

前陸軍總參謀長托特·拉約什，在他的証詞中，說：

“由於軍事委員會的建議，納吉·伊姆雷發出戒嚴和宵禁的命令。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為了使街道上的行

人躲开，以便对付剩下的那些想用武力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人们。可是，不久以后，电台就宣布解除宵禁和禁止集会的命令。纳吉·伊姆雷发出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在实行戒严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纳吉·伊姆雷依军委会的建议发布了戒严令而接着又改变了这个命令。就在那个时候，军委会接到很多关于逮捕了不少持有武器的人的报告，并请示对这些被捕的人怎样处理；但是结果，军委会根据纳吉·伊姆雷的命令，都把这些人的释放了。”

以下是扬查·卡罗伊的证词：

“军委会讨论了一个建议案，准备扫荡在科尔文街内外继续反抗的武装反革命分子。因为这些反革命分子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物质损失；它是首都最顽强的抵抗中心，如果把它消灭了，其他抵抗据点就容易被击破。军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委任参谋总部的作战参谋科瓦奇·伊斯特万少将和居什·米克洛什与佐洛麦上校拟定作战计划……

“纳吉·伊姆雷打电话告诉我，那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在这本书的图片附录上，有纳吉·伊姆雷的部下参谋长，前少将科瓦奇·伊斯特万所写的一个通知的照片。通知的原文是：“不要轰击这一片房屋。这样会在政治上造成尴尬局面。纳吉·伊姆雷特别强调不要采取那样的军事行动。”

下面是托特·拉约什的证词中与此相应的一段：

“还是纳吉·伊姆雷搅乱了准备在1956年10月28日对科尔文街内外的反革命暴徒进行军事扫荡的计划。这计划刚一提出，纳吉·伊姆雷就提出抗议说，这

个作战计划行不通，他威胁说，如果要实行这一计划，他就宁愿辞去他的总理职务。因为这个军事行动没有实行，科尔文街和附近地方发展成为更大的反革命营垒。”

· 納吉·伊姆雷命令停火。白色恐怖爆发

10月28日下午1时20分，科苏特电台开始作如下的广播：

“注意！注意！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发表：

“为了防止大量的流血和保证和平解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命令立即全面停火。武装部队只有在被攻击时，才准许开枪。納吉·伊姆雷，部长会议主席。”

武装部队接到部长会议主席的命令，叫他们不要对武装反革命分子采取行动，不要迫使他们投降。

那天下午的停火命令和納吉·伊姆雷的广播演说给了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新的鼓舞，造成了更多的恐怖、凶杀和使用私刑的暴行。

在1956年10月—11月，匈牙利国内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的新闻，传遍了世界。许多采访匈牙利新闻的资产阶级记者，报导了法西斯分子在匈牙利街道上所进行的可怕的凶杀事件。巴黎“世界报”记者讓·罗曼报导，在布达佩斯进行着大屠杀，重演了1919年“白党”复辟时的情景。“西德日报”关于这些事件写道：

“难于想象的恐怖——这就是事件的后果。受害者有有罪的，也有无辜的。私刑掘开了一条血的河流，泛滥在整个国家。”

杜塞尔多夫的“德国人民报”写道：

“……从苏联武装部队撤离布达佩斯的时候起，可怕的屠杀，一个真正的圣巴托罗繆之夜^①的大屠杀在进行着。”

在以前出版的“白皮书”中，详尽地讲到匈牙利国内发生的白色恐怖。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那些成百的凶杀事件。

1956年10月26日，切佩尔地方会议主席，切佩尔的老工人卡拉马尔·约瑟夫，在卡马拉埃尔多遭到谋杀。凶手用沙子堵住他的嘴，并曾施以酷刑。

1956年10月26日，科苏特奖金获得者旋工波尔道什·安德拉什，在外出为他的孩子买面包时，被击毙。

边防部队的中尉德涅什·季耶尔迪，在莫松马加罗瓦尔被反革命分子用旗杆打死。

边防部队的大尉瓦吉·约瑟夫，在莫松马加罗瓦尔被由奥地利潜入国境的反革命分子非刑拷打，并把他从窗口扔出去。这个军官受重伤后，被折磨致死。

赛纳广场的反革命分子，在一次战斗中，俘获了警察部队的少尉军官纳吉·卡罗伊。他在受尽野蛮的非刑折磨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斯特雷勒茨·亚诺什，一个警察中尉，在密斯科尔兹的街道上，受到反革命分子的袭击；死在枪托之下。

1956年10月30日，上校萨波·拉约什被用铁丝吊在树上致死；他是在对共和国广场市党委大楼的攻击中被俘的。阿斯塔洛什·亚诺什上校被一个富农的女儿杨科·皮罗什

^① 圣巴托罗繆之夜 (St. Bartolomew's Eve) 是指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繆节日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的大屠杀。——
譯注

卡用刀刺进心脏，旁边的反革命分子还喊：“挖出他的心来！”炮兵上校派普·約瑟夫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員麦澤·伊姆雷，在走出市委大樓談判停战时被击毙。这个上校受重伤后还被用刀戳刺，接着又被吊在埃尔克尔劇場旁边。保卫共和国廣場市党委大樓的忠于他們的誓言的許多青年被杀死。

反革命分子还在准备着更残酷的大屠杀。到处开列“死亡名单”，成千的支持人民民主制度的人被逮捕了，許多人被判处死刑，定期执行。

在維斯普雷姆州苏麦格区的所有“革命委员会”，开了包括住在該村的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的黑名单和死亡名单。有些村子里的这种名单包括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在科馬罗州涅斯梅伊村，“民族委员会”主席开列了准备处死的人名单。

在索尔諾克州蒂薩贊蒂姆雷村，“革命委员会”把三十八个共产党员和其他的拥护人民民主制度的人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准备將他們处死。

在貝克什州多博什村，有八十个共产党员被列入黑名单，并且选定了执行的地点。

在托尔納州薩卡伊村，四个携有机枪的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复仇法庭”，专门判决和处死共产党员。

前霍尔蒂军队少校特格拉西·格佐，在托尔納州納吉多罗格村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組成的执行小队。成員是箭十字党分子和前宪兵，每人負責处死六个共产党员。

在巴康伊森特拉斯洛(維斯普雷姆州)，將被处死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在議會大厅前的公开集会上，当众宣布。

在靠近奧地利国境的森特格哈德(瓦什州)，处决共产

黨員的日期定在11月7日—8日。“自由歐洲”电台的間諜在这地方十分活跃。

布达佩斯第十六区的“民族委员会”里就有执行小队的組織，决定要在11月4日处死一百三十名共产党员。

布达佩斯第十七区的“民族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开好了約包括一百五十名共产党员和有进步思想的劳动人民的名单，准备将他們处死。

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是反革命暴乱末期，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事件。反革命分子成立了几十个箭十字党的“复仇法庭”，开列了几百张死亡名单。在布达佩斯，被反革命匪帮逮捕关起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定在11月6日处死。根据計划，在維尔麦佐(博达的公园)举行的一个隆重的集体葬礼上，将由代表仇恨的明曾蒂·約瑟夫紅衣主教講話。这个葬礼和葬礼演說，是将实行普遍的集体屠杀的信号。

一个商业企业的科长凱奇凱什·費倫茨和他的几个同事，曾被反革命分子逮捕，拘留在普拉特尔街。他証明說：看守他們的人，好几次說，他們快完蛋了；陣亡的“自由战士”的葬礼定于11月5日或6日在維尔麦佐举行；随后“革命法庭”将在那里开庭，对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判处死刑。

根据其他文件，反革命分子曾計划在夜間派出匪徒，搜索有紅色或其他顏色标志的房屋，并布置一个“长刀之夜”，处死被逮捕的三千名忠于人民民主制度的人，屠杀已列在死亡名单上的一万多人。

这些事实說明，到11月4日为止，在布达佩斯和全国其他各地，疯狂的反革命白色恐怖，虽然已极尽残酷的能事，但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行动。如果不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英勇战斗，并鎮压了反革命叛乱，反革命匪徒还将造成

更大規模的恐怖，而法西斯的恐怖手段將把整個匈牙利國家浸在血海之中。

在布達佩斯和密斯科爾茲實行法西斯大屠殺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共產黨員”納吉·伊姆雷是匈牙利的總理。在反革命叛亂爆發的前幾年，納吉·伊姆雷常常以法律和秩序的保衛者自居，因而受到許多人的擁護。他的陰謀集團的成員，或他的其他擁護者也常在這方面替他吹噓。聯合國五國委員會公報也稱他為“法律的保護人。”

在反革命恐怖的血腥日子里，一個總理的責任，毫無疑問應該是維護法律秩序，保護上萬的誠實、無辜的人民的生命。可是納吉·伊姆雷，在抵抗反共大屠殺和猖獗的白色恐怖方面，並沒有採取過任何措施，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相反地，他卻通過他和反革命匪幫暗中的勾結和合作，變成了1956年凶殘的白色恐怖的主要贊助者。他在審訊期間的態度，就最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納吉·伊姆雷，在2月里的審訊中說了以下的話：

“我最感抱歉的是，我並不知道10月30日攻擊共和國廣場市黨委大樓的事。”

審判長問：

“你知道不知道，布達佩斯和各州，在進行着恐怖活動，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在被吊死？”

納吉·伊姆雷回答：

“我並沒接到任何這一類的報告。他們並沒有告訴我國內在發生着什麼事情……並且我當總理也沒有在這方面插手的責任。”

在6月13日的審訊中，納吉·伊姆雷從前的秘書，巴洛格·約瑟夫證明：

“我感到很苦恼。我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执。我和納吉·伊姆雷也吵了嘴。他几次命令我們不要制造紧张空气。星期三，我已經看到他們絞死穿制服的人。那时納吉·伊姆雷还說不要制造紧张空气。当共和国广场市党委大楼遭受攻击时，我亲自告訴納吉·伊姆雷，市党委大楼遭到攻击了。那时他仍然告訴我們，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証人在回答檢察官的問話时說：

“有一天党发給我們(給国会的——編者)一份通报。通报中記載了駭人所聞的血腥暴行的消息。我把这份通报拿給納吉·伊姆雷，請他看一看。我催他两次，他才走馬觀花地看了看，然后把它扔在一边，他說‘他們太夸大了’。接着他告訴我不要拿这样的事来打攪他。从此以后，就只我看这些通报，然后把它們編入案卷。”

納吉·伊姆雷对巴洛格夫人的証詞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并不知道市党委大楼遭受袭击的事。”

在6月13日的审讯中，檢察官宣布，总檢察长获得了1956年10月—11月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期間西方通訊員和摄影記者所接的影片，以及在反革命期間和以后，西方报纸刊載的有关恐怖暴行的照片。审判长根据檢察官的建議，命令放映这部影片。几个被告对放映的影片应說出自己的意見和感想。

蒂尔迪·佐尔坦說：

“这部影片使人目不忍睹。我的名字竟与这些事有关，太使我难过了。”

多納特·費倫茨說：

“白色恐怖的消息传到了国会。虽然我們不难解

释，我們仍然維護政府的立場，不过这也不能減輕我們的罪惡……。我認為，憑良心來說，我們應該对在反革命叛乱时期牺牲的共產黨員、匈牙利人和苏联战士們，表示深切的歉意。”

科帕契·山多尔說：

“我是有罪的；并且为我的朋友完全有权对我的名字施以侮辱而感到羞耻。而且我是罪有应得的。我現在看到了这个記錄片，知道了人民是怎样被杀害的。我感到，我應該对这件事間接負責。我看到由坦克中抬出来的死亡的苏联战士；他們的指揮官在旁边落泪說，明天他們就可能复員了，可是現在他們却死了。……我对我所作的事感到悔恨，我受到了良心的譴責。”

納吉·伊姆雷並沒有說什么。

納吉·伊姆雷、洛松齐和多納特与 杜达什·約瑟夫的血腥的握手

10月30日不仅是共和国廣場上可怖流血事件的难忘的悲慘日子。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反革命事件也是和这一天有关的。

这一天，就是納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和多納特·費倫茨——陰謀集团的參謀本部——和該集团的另外一些人与反革命分子中最凶恶的人，杜达什·約瑟夫，坐在一起商談的日子。

杜达什·約瑟夫，自封为“武装起义的自由战士”的領袖，自己成立的全国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个反革命的領袖，一帮凶杀犯头子。这个反革命头子把他的总部設在“自由人民报”編輯部大樓里，并組織了一个所謂“猎取人头的

人”的“行动小组”。这一群恐怖分子是由前霍尔蒂中尉军官帕尔哈吉·费伦茨领导的。它的成员中有瓦尔加·雷佐和普雷什·佐尔坦。反革命暴乱以前瓦尔加·雷佐曾因盗窃、诈骗和流氓行为被捕。反革命叛乱的爆发使他得到自由。普雷什·佐尔坦曾被判八年徒刑，在10月23日后释放出来。“猎取人头的人”谋杀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并从事搶劫和掠夺。杜达什从被释的罪犯中招募他的部下。

洛松齐和多纳特在“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里见过杜达什，而纳吉·伊姆雷在国会大厦里也见过他，并同他谈过话。马耶什·伊斯特万证明说：

“我记得，在10月30日，杜达什·约瑟夫应某人的邀请，来委员会会谈。委员会参加会谈的有：阿达姆·季耶尔迪，纳吉·塔马什，卡达尔·伊万，坦措什·加博尔，纳吉·巴拉什，卡尔多什·拉斯洛等人。

“参加会谈的还有：洛松齐·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和我自己。这个会议在形式上是由阿达姆·季耶尔迪主持，但洛松齐·格佐的意见却很有力。杜达什向我们说明他的要求，简单地说是：邀请联合国派武装部队来；在多党制的基础上，宣布于两星期内定出大选日期；立即召集由武装战士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杜达什又说，只要答应召集一个由起义者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并且在联合国军队监督下举行秘密投票选举，他们就可以立即停战。”

坦措什·加博尔证明：

“会谈是由阿达姆·季耶尔迪主持的，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和洛松齐·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和杜达什·约瑟夫。10月30日，多纳特·费伦

茨和洛松齐·格佐来到了‘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在那里遇到了杜达什·约瑟夫并同他谈话。我不知道多纳特和洛松齐是否知道‘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将和杜达什及其同谋者们进行商谈。不管怎样，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会谈。阿达姆·季耶尔迪，卡尔多什·拉斯洛和我自己都代表委员会出席了这次会谈。对方有杜达什和他的两个同伙以及洛松齐·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和作家马库什·伊斯特万。大部分时间是洛松齐·格佐在发言；他很受与会者的重视。杜达什告诉我们，他建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并且有很多的武装部队。他说，他打算召集一个起义英雄大会！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他的要求中有一项涉及苏联军队撤出国境和解散公安部队的问题。这些就是杜达什和我们会谈的要点。”

而纳吉·伊姆雷——忠实于他自愿担当起来的任务——迫切地要和“猎取人头的人”的首领会面。

纳吉·伊姆雷的秘书，巴洛格·约瑟夫，对于这一点作了以下的说明：

“杜达什·约瑟夫，以后还有他的老婆，曾多次催促举行会谈。最后他们决定第二天下午举行。纳吉·伊姆雷叫我给杜达什打电话告诉他会谈的时间。

“会谈时间已到，纳吉·伊姆雷在等待杜达什，并几次催促他动身。约一小时后，杜达什打电话来说，他有事，要晚一点才能来。纳吉·伊姆雷听到后，就等着他。我并不知道会谈的内幕是什么。会谈是在会议室举行的。”

纳吉·伊姆雷也曾和其他反革命武装集团的首领谈判

过。

属于杜达什的“匈牙利独立报”，在某一期中，用大号字标题发表了如下消息：

“全国革命委员会代表与部长会议主席举行谈判”。

下面是那段新闻的内容：

“谈判于1956年10月30日下午6时举行，参加同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谈判的有起义的‘自由战士’武装部队的代表，全国革命委员会委员与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代表。谈判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判的基础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杜达什·约瑟夫代表起义武装‘自由战士’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起义者提出的建议书将由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提交政府。”

在洛松齐领导下的“自由科苏特电台”于1956年10月30日下午7时50分的广播是这样开始的：“现在你们将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接着它就把上面所引的杜达什在报纸上发表的话，一字一字地广播了出去。

同一天早上(1956年10月30日)反革命分子，包括杜达什匪帮，围攻共和国广场的市党委大楼，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可是电台却如此推崇纳吉·伊姆雷和杜达什在那一天所举行的会谈，甚至在下午7时58分，即八分钟以后，又把刚才的广播重复了一遍。

纳吉·伊姆雷无法否认几个证人所提出来的事实(他和杜达什举行过谈判)，他却想否认他知道或是曾经赞同在杜达什的报纸上和广播中发表上述的消息来为自己开脱。

下面是办公室职员莫尔纳尔·费伦茨夫人的证词中的

录：

“在十月事件期間，我是納吉·伊姆雷的秘書之一。杜达什曾來訪晤納吉·伊姆雷，並和他會談。杜达什叫我記下他口述的一段話，就是以後電台上廣播的那些話。納吉·伊姆雷曾看過記錄並且說很好。我並不知道他有沒有在上面簽字。”

納吉·伊姆雷對這証詞的意見是：

“關於我和杜达什談判的公報的公布，沒有得到我的同意。”

証人對審判長所提出的問題，回答說：

“納吉·伊姆雷把我叫進去，要我記下杜达什那一幫人的口述。杜达什把他口述的原文念給納吉·伊姆雷聽過。”

第四章

資產階級的、反动的和法西斯党派 的出現和它們的目的

在反革命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党派，象雨后毒蕈一般，紛紛地鑽了出来。在反革命的全盛时期，大約有七十個不同的党派——由小农独立党直到公开的法西斯政党——宣告成立。

下边列举这一类的党派和政治集团：小农独立党，社会民主党，裴多菲党（前全国农民党），匈牙利独立党（法西斯費佛尔党的繼承者），匈牙利生活党，匈牙利自由党，匈牙利革命党，基督教民主党（仿效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意大利教会政府党），基督教匈牙利党，資產階級民主党，匈牙利民主同盟，匈牙利革命青年党，法西斯箭十字党（吉厄尔城），匈牙利人民党，民族陣營，基督教陣綫，民主人民党（卖国贼巴兰科維奇党的繼承者），天主教人民党，基督教人民党，全国政治犯战斗联盟，匈牙利全国委员会（杜达什的党），这张一览表上边不包括以政党姿态（要不是在名义上也是在实际活动上）出現的“革命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从这张党派一览表本身就可以充分說明納吉·伊姆雷所批准的施政是怎样的“民主”了。

納吉·伊姆雷并不是被事物的发展趋势推向这个方向的。他很早以前就有了計劃了。

他的阴谋集团的成員，在反革命叛乱正在酝酿阶段，已

經和克特利·安娜——工人階級和她的國家的叛徒——與艾爾德加·伊斯特萬進行過談判，打算重新組織社會民主黨，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這一點充分地說明了上述的事實。

小農獨立黨也萬事俱備，只待反革命時機的到來。蒂爾迪·佐爾坦提供的證據，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反革命爆發後的第二天，即10月24日，許多前小農黨黨員聚集在薩爾達街該黨的總部里，對於某些人的活動展開了激烈的爭辯。索爾貝·亞諾什以年高德劭主持辯論。……這次會上所考慮的問題是，從黨里開除1949年以後在人民民主政府擔任職務的一些人——就是道比·伊斯特萬、波格納爾·約瑟夫、歐爾特塔伊·居拉和佩斯塔·拉斯洛”。

小農獨立黨的右翼首領們為什麼要重新改組黨呢？由該黨的副主席薩波·伊斯特萬（貝科什的富農，納吉·伊姆雷政府的前國務部長）在電台上把這個原因告訴了全世界。人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們主要是擁護1930年貝科什的計劃（納吉亞塔迪—薩波·伊斯特萬的計劃）。

這個計劃是企圖（在許多事情當中）把農民最後獲得的土地奪回去，並恢復包括剝削與虐待農民的前霍爾蒂的市政局及其代表機關。

蒂爾迪·佐爾坦在法庭上供認他的黨的極端右傾的領導者的目的。

“小農黨成立得比較早。在較出名的黨員中，值得一提的有：凱瓦戈·約瑟夫，薩波·伊斯特萬，基什·山多爾——他也是農民聯盟的總裁，和帕爾塔伊·蒂爾瓦達爾。我在1945年以後的小農黨里認識他們的。他們確實是屬於右翼的，事實上，是極端右翼。

“他們曾兩次，在國會中向我彙報關於聯合政府的問題，我很快就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的要求中包括着廢除主席團。

“他們主要的要求是，全部內閣席位應根據 1945 年聯合政府的基礎，按同樣的比例分配。”

為了使這個綱領的要点得到實現，納吉·伊姆雷曾兩次，每次撥給小農黨三十萬福林，總共六十萬福林，並且承認小農黨占用匈—蘇友好協會在塞麥爾維什街的會址和那里的一切家具什物。納吉·伊姆雷還批准給前全國農民黨改組而成的斐多菲黨三十萬福林。

匈牙利獨立黨的綱領規定不許侵占私有財產，和實行“純潔、永久的匈牙利資產階級的民主”。

總的說來，幾乎所有黨派的綱領上，都有隱蔽的或者公開的恢復私有財產的要求。非黨派人士集團在這個問題上，甚至宣稱：私有土地在一千霍爾德以上的才應歸“國家管理。”在工業方面，他們的綱領第十五條要求：

“改國營企業和工廠（除去重要的企業象采礦業等外）為聯合股份公司。”

堅持這一主張的黨派，它的綱領自然會包括象管制前游擊隊人員，“清算”國家保安當局，封閉在工廠中的黨委員和工會委員會等這類要求了。“民族陣營”以真正的薩拉希的神怪方式提出了它的綱領，它的綱領中第六條的條文是：

“匈牙利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一個古代匈牙利集體主義的理想上，即‘血緣聯盟’上，也就是建立在有節制的私有制的基礎上。”

我們可以列舉出許多這類黨派、聯盟、同盟、聯合陣綫，以及委員會的綱領。這些綱領都經納吉·伊姆雷審閱過并

得到了他的同意和贊揚。它們甚至超过了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而清清楚楚地提出了法西斯的要求。

隨着許多黨派紛紛成立也涌現了大量的反革命報紙。

納吉·伊姆雷非法為明曾蒂“恢復名譽”

明曾蒂這個臭名遠揚的代表極端反動勢力的人物，在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支持之下，又重新恢復了他的政治活動。

有一個“工人委員會”，首先在電台上表示擁護明曾蒂。乍聽起來顯得很新鮮，可是對那些熟悉“工人委員會”是怎樣成立和由那些人組成的人來說，却毫不奇怪。佐姆巴特利電台，在10月30日宣布了“瓦什州工人委員會”的要求，它包括以下的內容：

“此外，應該毫不遲疑地使紅衣主教明曾蒂·約瑟夫和其他曾遭受不幸的教會顯要人物完全恢復名譽，並儘早地使他們回到教會的崗位上去。”

蒂爾迪·佐爾坦的秘書哈莫里·佐爾坦，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帕林卡什·安托爾少校，帕拉維西尼侯爵的後裔，10月31日由省內給蒂爾迪打電話，告訴他，他們已經把明曾蒂放出來了。蒂爾迪指示他把明曾蒂帶到布達佩斯，並把他帶到他在古堡山的住所。哈莫里在他的日記後邊作了如下的記錄：

“……蒂爾迪到古堡山訪問明曾蒂……馬勒特和克雷斯特什·亞諾什一起去。蒂爾迪這次會見明曾蒂是正式訪問……”

納吉·伊姆雷專斷地把明曾蒂恢復名譽，因而嚴重地破壞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恢復名譽文件的原文如下：

“匈牙利国民政府宣布，1948年对红衣主教兼总主教明曾蒂·约瑟夫提出的控诉并无合法根据，前政权对他的控告也并无理由。根据上述理由，匈牙利国民政府宣布撤销褫夺红衣主教明曾蒂权利的法令，因而红衣主教可以享有公民权和圣职权，而不受任何限制。

总理纳吉·伊姆雷”

不可忽视的而且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这个由纳吉·伊姆雷亲笔签字的原文，提到“前政权对他的控告”。是哪一個政权呢？显然是1948年的政权！纳吉·伊姆雷采取了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立场，他和“前”政权——人民民主政权，划清了界限，显然他是在向往着另外一个政权。

在这里面，他把明曾蒂·约瑟夫当作了一个政治上的同路人，战斗里的敌友。1956年10月31日，在明曾蒂被释放的当天，匈牙利电讯社披露了以下的一段：

“雷特沙格的人民，首先向恢复自由的红衣主教致贺。明曾蒂在回答这些祝贺时，说：‘我的儿子，我将继续做我在八年前被迫丢开的事业了！’”

在由洛松齐·格佐直接掌握的电台上，明曾蒂获得了两次发言的机会。

11月1日，明曾蒂做了简短的演说，他声称：

“……我现在正在寻找我的方向。两天内我将对全国发表我个人的见解，说明将怎样解决当前的问题。”

尽人皆知，明曾蒂和西方是一贯有联系的，他曾一度去拜访在纽约的红衣主教史培尔曼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托。以下是流亡者的“新匈牙利报”的职员塞曾伊·贝阿特里伯爵夫人（发生反革命暴乱时她在匈牙利）所引用明曾蒂秘书的日记的片断：

“虽然市内只有极少的电话可通，州与州之间的电话已完全断绝，可是今天早晨我们和华盛顿通了两次话，而且清楚得就象和我们的隔壁谈话一样……”

明曾蒂刚被释放，有什么事情要和华盛顿通两次电话呢？西德的“德国周报”报导了明曾蒂在11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当时红衣主教在报界代表面前公开向西方呼吁，要求他们给以政治上的支持和援助。报导继续说：

“在举行招待会以前，他和他的旧同事旧金山的亚佐斯基神父，在电话里谈过话。明曾蒂通过他，给美国总统送去一封私人信件，请求支援匈牙利人民的自由斗争，并请求开放奥地利边境以便运进来军械和物资。”

明曾蒂刚一释放，“自由欧洲”电台就委派了维泽伊神父当他的顾问。明曾蒂从被释放到逃入美国使馆的四天中间，和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更进一步的密切联系。明曾蒂的秘书托尔山伊·埃功·阿尔博特博士的证词，在这一方面和在他的政治见解方面，作了全面的说明：

“一个代表西德和瑞士红十字会的三人代表团，在1956年11月2日，访问了明曾蒂。其中有一个是勒文斯坦亲王。……明曾蒂说，勒文斯坦亲王是阿登纳的密友，也是他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在和勒文斯坦谈话中，了解了世界的大势。在这方面，他说，德国的分裂将造成世界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战争随时可以爆发，西德将冒发动干涉的危险。明曾蒂明确指出，‘德国人已经拟定下了日程表，不会多久就会发动’的。明曾蒂坚持指出西德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唯一的敢于冒这个危险的积极力量。明曾蒂还说，他个人认为，在我们这方面，参加这一行动是值得付出任何流血代价的。他说，1957

年到1958年間，德國將牽制住蘇聯的軍隊，這樣美國和英國就可以使用他們的空軍而不至于冒多大的危險。他說，英國應該和德國好好籌劃一下，因為蘇聯的力量是占優勢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還沒有和美國取得一致的立場，但正在為這一點進行會談。明曾蒂還引用勒文斯坦的話說：‘西方國家所以反對禁止原子武器是因為不使用原子武器，就不能征服蘇聯’。”

1956年12月13日的瑞士報紙“日內瓦新聞”寫道：

“有些匈牙利人顯然為了梵蒂岡沒有對他們的民族起義給以積極的援助而感到不滿。這個想法是毫無根據的……梵蒂岡不斷派遣它的親信（去匈牙利一編者），其中就有梵蒂岡的持使羅德音主教，他已到了布達佩斯，並且和剛被納吉政府釋放的明曾蒂進行接洽。他在了解情況，並且把教皇送給匈牙利天主教的款子交給了明曾蒂之後，帶着有重大價值的秘密文件回到了梵蒂岡。此後不久匈牙利宗座學院院長薩功主教也作了同樣的旅行……”

獲得這樣的“情報”和會談之後，明曾蒂在11月3日發表了他的陰險惡毒的“意見”。它清楚地說明，反革命的目的是要恢復1945年以前的法西斯政權，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資本主義統治。

這樣，整個的畫面就完全勾了出來：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于深思熟慮之後沿着一條直綫的道路前進。從和資產階級黨派秘密會談，到利用電台提倡和支持半法西斯和法西斯黨派的成立，再到正式拜訪要求恢復教會地產和把未來計劃寄托在對蘇聯發動原子戰爭的發言人，完全是一條直綫。

第五章

帝国主义——反革命叛乱的主要組織者

在反革命叛乱前西方国家的宣传活动

国外和国内的反动派，很久以前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进行了周密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这种阴谋活动自从1951年臭名远扬的共同安全法案通过以来，就开始进行，直到现在从未间断过。这个共同安全法案动用了一亿美元从事间谍活动。到1956年，更进一步从一亿美元增加到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在阴谋組織和指揮1956年的反革命事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自由欧洲”电台，便是用美国經費建立和支持的；其他如宣传气球和各种反革命流亡組織，也是用这笔基金建立、資助和支持的。

在1956年10月以前的几个月中，这些反革命宣传組織特別猖獗，他們甚至公开表示准备直接进攻人民民主制度。

1956年夏季，前霍尔蒂政府总理加雷·米克洛什在南美洲旅行。他对着大部份是流亡到該地逃避战犯罪責的法西斯分子的听众宣称：

“解放匈牙利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实现，也許现在就处在解放前夕。匈牙利人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就在眼前了，我相信我們不久就可以回老家去。”

1956年8月19日，“自由欧洲”电台在一篇評論中，更

露骨地指出了发动反革命叛乱的时间：

“我们的未来不能从1939年或者是1945年算起，可是总是能从将来一部分匈牙利人的要求成为现实的那一年算起。……这个未来也许已从1956年开始了。”

帝国主义的宣传家所一致期望的、准备的和为此而匆忙通知“一部分匈牙利人”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英国广播公司1956年9月26日的广播中，他们甚至说出了他们心目中的人的姓名，和他们对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地，匈牙利人对纳吉·伊姆雷也有相当的信任，他们希望他能从1953—54年折衷政策的失败中获得教训。”

前国务部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艾尔德加·伊斯特万在与纳吉·伊姆雷的谈话中，说到折衷政策时所用的几乎也是同样的话，而纳吉回答说：“我决不采取折衷政策。”这难道还不是很明显吗？

为什么他们觉得纳吉是“发动摊牌”的最理想的人选呢？

1956年9月6日，西德的“每日镜报”说得很清楚：

“斯大林逝世几个月以后，纳吉·伊姆雷当上了匈牙利的总理。上任以来他应许并实行了许多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改良措施，……纳吉·伊姆雷不久将获得胜利。”

当然，如果他们——这些从事反革命冒险活动的亡命徒和他们国内的同盟者，考虑到这个在纳吉的帮助下开始的反革命进程，会以一种“半共产主义”的制度告终的话，也不会集合在纳吉的麾下的。

8月18日，罗马电台的广播说出了它希望纳吉及其同

謀者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和他們的命运如何：

“至少，在短期內可以暂时接受铁托主义作为过渡阶段，使这个国家获得解放和独立。如果匈牙利铁托主义者能够使苏联撤兵，結束受俄国人压迫的局面，和停止俄国化，那么就讓铁托主义执政一、两个月。为了使这些匈牙利铁托主义者，民族共产主义者，被匈牙利人民的爱国意識和他們酝酿着的不滿情緒一扫而光，这一段时间也是必要的。匈牙利铁托主义者事前一定会估計到这一点。如果他們真正是站在民族立場上，把民族利益放在一切之上，那么他們必須准备做这样的牺牲。讓他們做铁托主义者好了，在他們致力驅逐俄国人和俄国影响的时候，我們預祝他們一帆風順。……”

“自由欧洲”电台在8月28日的广播中，提出了两点要求。其中一条是：

“原則上，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里，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資料，所以政权屬於劳动人民。但是这只是在原則上如此，或者說仅仅在書面上是这样。工厂以及国营企业并不是工人委员会管理的。”

換句話說，首先要求建立“铁托主义的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厂矿企业的不是“匈牙利铁托主义者”，竟是拿美国經費的和为老牌法西斯分子所領導的“自由欧洲”电台了！的确，是“自由欧洲”电台第一个要求把政权交給所謂“工人委员会”的，而且是远在声名狼藉的“中央工人委员会”成立以前就提出来的。

第二个“动员”建議是在“自由欧洲”电台同一天的另一个节目中播出的：

“7月18日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格罗政权采取

了什么决定和措施呢？他們有沒有把那个立在道薩·捷耶尔吉大街上丑陋的銅象，拆下来熔毀掉？”

那些亲身經歷 10 月 23 日事件的人都知道，反革命分子首先干的事情之一，便是执行慕尼黑的这个指示。

大家都知道，在反革命叛乱爆发前一个月里，“自由欧洲”委员会用宣传气球在匈牙利領空，特别是乡下，投擲了大量的煽动性小册子。其中一本列举了“民族对抗运动”的十二項要求（这种要求前面已經提到过），就是：

“反对农业合作社是爭取民族自由的一种形式。”

前小农独立党議員、現在的“自由欧洲”电台常任“农业顧問”澤比·巴兰在 1956 年 9 月 4 日談到农业拖拉机站时說：

“……当紅星从匈牙利天空落下来的那天，人民就要解散这些拖拉机站。”

10 月 13 日，就是說在反革命爆发前夕，“自由欧洲”电台在广播中給反革命叛乱提出了更具体的口号和要求。茲抄录如下：

“我們要求撤退苏联軍隊，公布苏匈之間的一切条約和协定，要民主，而不要空喊民主主义口号；我們要求独立，而不要外国保护。”

西方国家的喉舌不仅提出上述的这些有利于反革命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并且經常有系統地公布白色恐怖的綱領。許多个月以来，“自由欧洲”电台每周都有道地的美国“惊险小說风格的“死亡之音”，它公布了那些忠于人民的党和非党人士的名字，揚言要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將他們非法处死。反革命匪徒之所以沒有能够把这些被“死亡之音”宣判了的人們全部处死，那倒不决定于“自由欧洲”电台或者納

吉及其同謀者。

間諜特務在策划反革命叛乱 中所扮演的角色

显然，策划反革命叛乱，只用宣传手段是不够的，这需要进行广泛的、多方面的組織活动和軍事准备，同时还需要十分周密的情报网，甚至建立武装部队。从失望的逃亡者和反革命事件前后所捕获的間諜特務的供詞，以及他們的有关材料，也証明了这些阴謀活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国外的政治逃亡分子組織同帝国主义情报机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56年9月9日为匈牙利公安机关逮捕的間諜分子費茨尼·山多尔供称：

“由美国操縱的西德盖倫情报机关（一个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西德間諜机关——編者）的匈牙利科在准备1956年十月事件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早在这个事件以前，匈牙利科的全部雇員就經常拜訪西德和奧地利的匈牙利难民收容所，以及其他在慈善机关的幌子下工作的机构。他們在这些匈牙利难民中进行宣传和煽动，号召他們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同时在他们之中招募特務，經過短期的訓練以后，把他們送到匈牙利去煽动人民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其他的匈牙利侨民机构也进行着同样的活动。……”

这些匈牙利政治逃亡分子机构經常訓練和派遣由逃亡分子中招募的間諜特務分子回国。所謂“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在这方面一貫是最积极的。这里可以簡短地举两个被捕

特务的活动作例子，来说明他们的手段和目的；

麦佐·山多尔于1951年逃到西方国家。他在奥地利的格拉茨见到了马尔沙·山多尔和佐托·伊斯特万。两个人都是前霍尔蒂的军官，他们便把他吸收进间谍组织。他们教给他使用武器、搜集情报、摄影、密写以及偷越国境的方法。受训以后他每年奉命到匈牙利进行一次间谍活动。麦佐在这个期间内吸收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人，组织了一个间谍网和反革命组织，他告诉他所吸收进来的特务说，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武装配合外来的进攻，或者配合内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

1952年在他第一次执行间谍任务的时候，他帮助了帕蒂·拉约什逃往西方，随后又将他介绍给马尔沙·山多尔。帕蒂·拉约什的参加和受训情况完全和麦佐·山多尔相同。1954年他第二次被派来匈牙利。他的任务是侦察和拍摄军用机场、兵营及其它军事目标与重要建筑物。麦佐和帕蒂得到了一千五百奥地利先令做为他们间谍活动的报酬。他们每次越过边境，都携带武器和适当的侦察用具以及伪制证件。

当然，这些用几个小钱雇来的小特务，不可能了解这些组织作用的全部情况，也不会知道这个间谍网的旨在阴谋反革命叛乱，推翻匈牙利人民政府的内在联系和任务。

前独立小农党代表人物，亡命者头子之一萨波·米克洛什，他对流亡组织背叛祖国的阴谋活动感到失望和厌恶。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1957年离开他以前的伙伴回到了祖国。在一次公开的谈话中他说：

“就在10月23日的前一两天或者是当天，一个以前是霍尔蒂军官后来是盖伦情报机关的奥地利间谍

說，进入匈牙利实行軍事管制的时刻已經到了。他果真去了。他帶着一部無線电收发报机，大約还有几个別的人，进入了匈牙利。1956年12月他方回到維也納。

“这时他們开始在‘匈牙利难民服务部’（在此以前这个机构一直在薩尔斯堡）的名义下籌組情报局。当时决定指派一个叫塔宾吉尔的正統主义者主持这件事，这人受美国人的雇佣已經好几年。这个机关是‘自由欧洲’电台設立的，同时也受‘匈牙利民族委员会’的領導。”

1956年11月21日“柏林日报”对关于西德的准备工作情况作了重要的报导。下面是从那篇报导摘录的一段：

“10月20日以后，在慕尼黑和慕尼黑郊区的飞机場上，出現了从勒根斯堡、斯图加特和其他西德城市来的匈牙利武装队伍。这些霍尔蒂匪徒在与慕尼黑居民的談話中，公开地承認他們准备以‘統治者’的身分回到匈牙利去。”

“紐約先驅論壇报”，在1956年10月25日登載了前美国駐布达佩斯大使克里斯琴·腊弗恩达耳的一篇值得注意的談話。腊弗恩达耳先生在談到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时說，他仅仅对它爆发時間过早感到有点意外。西方的观察家們已經預先估計到会发生一次反苏暴动，只是比他們所預計的早了一些。他說他們原来希望大約在年底发生象这样的一次暴动。

根据所查获的材料証明，西方帝国主义者不是在“等待”这次反革命叛乱，他們实际上是在資助、組織和煽动了这次事件。所以这位前美国駐布达佩斯大使的話的真正意义是，这次反革命叛乱原先是計划在1956年底发动的，但

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使它可以提早爆发。

帝国主义所领导的反革命叛乱

“自由欧洲”电台是这次反革命叛乱
军事和政治上的外国总指挥部

当布达佩斯和其他许多匈牙利城市的街道上洒满了鲜血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政客正在议会里、无线电广播中和报纸上，兴高采烈地为这个所谓“新诞生的自由的匈牙利”欢呼祝贺。几十个西方电台给反革命分子以声援和鼓励，并帮助他们出谋划策。

从军事和政治上看，“自由欧洲”电台是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实际指挥者。10月22日，反革命叛乱爆发的前夕，这个电台把匈牙利语广播时间几乎延长了一倍，增加到一天播送二十小时。从此以后这个电台天天广播政治和军事指示，一小时也不间断。武装反革命匪徒准确地执行了这些军事命令。依据这些指示，他们立刻提出愈来愈新的政治要求，不断向右转。作为总理的纳吉·伊姆雷也毫不迟疑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这个被称为“自发的群众性运动”的反革命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经过周密布置的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这是布达佩斯经历过这次叛乱的一百五十万居民可以作证的。西德的“每日镜报”也证明了这个事实。这家报纸在10月27日写道：

“暴动者是按照经过周密考虑的计画进行的。这个事实是布达佩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人所一致同意的。他们企图袭击并占领这个首都的六个神经中枢，

确切地说，就是：

1. 议会大厦及其邻近地区，这里有好几个政府机关；
2. 广播电台；
3. 匈牙利共产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报馆和印刷厂；
4. 凯地火车站，所有通往西方的火车均从此出发；
5. 罗伯特·卡罗伊兵营，布达佩斯最大的卫戍部队所在地；
6. 炼桥，多瑙河上最有战略价值的桥梁。”

反革命军事领导组织的任务之一，无疑的是要使武装反革命匪徒保持作战状态。但戒严令的宣布，将使这些匪帮中不坚决的胁从分子离开他们。“自由欧洲”电台从戒严令公布那天起，就坚持要求解除戒严令。在10月25日的广播中，它发出了实质上是反革命叛乱初期所奉行的军事战略：

“必须撤销戒严令，并命令苏军退回营房。如果立即撤销戒严令，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流血。……”

换句话说，应当解除为避免流血而宣布的命令，应当下令叫阻止暴徒行凶的苏军返回营房，这样才可以“避免更多的流血”。这种谬论，除了对政治和军事行动完全无知的人，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同时，也只有甘心为反革命扫清道路的人，才会接受这种要求。大家都知道，纳吉·伊姆雷一再延长放下武器的限期，并阻止戒严令的实施。

反革命的头子不止一次地遇到了怎样保持武装反革命匪徒的作战状态和战斗阵容的困难。“自由欧洲”电台对于这一点发出了无数次的指示。例如在10月28日的广播中

說：

“布达佩斯国防部刚刚发出的公告說，布达佩斯城內的抵抗武力已在双方同意下开始将武器交給了来接替苏联部队的匈牙利军队。这段公报完全是假的，不真实的。布达佩斯抵抗武力不可能——根据最后消息，他們已消灭了一万五千人——在击潰了的紅軍面前放下武器。……这个消息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虽然爭取自由的斗争已經取得了軍事上的胜利，但距离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还很远……如果放下武器，那就等于姑息专制独裁和加深民族灾难。”

10月28日，納吉·伊姆雷在他的广播演說中，宣布苏联军队已經撤回到他們的軍事基地去。于是在慕尼黑的这个反革命总司令部立刻又前进了一步。就在同一天（10月28日）“自由欧洲”电台提出了新的軍事要求：

“首要条件就是苏軍立即在停战的条件下撤出匈牙利。……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說，我們虽然为胜利而欢呼，但我們还是仅仅走了第一步。”

的确如此，几个鐘头以后，他們就采取了迈向第二阶段的步驟。前霍尔蒂軍官，“自由欧洲”电台的軍事顧問帕尔什尼·吉兰中校，10月31日用貝尔上校的名字发出如下的指示：

“匈牙利军队中的共产党領袖必須滾开：这里不容許你們插手。兵士們！自由战士們！你們要夺取国防部长，陸軍总司令和參謀长的职务！”

“自由欧洲”电台抑制不住了。11月1日它除了重复貝尔上校的要求而外，还增添了另一个項目：

“誰有武器，誰就有政权！……对全国范围來說，內

政部和国防部就是武器。……自由战士们！……不要放下你们的枪。”

第二天，11月2日，納吉·伊姆雷任命馬勒特·帕尔——他是反革命分子，‘吉利安’軍营和科尔文街的指揮者——为国防部部长。

“自由欧洲”电台为了給納吉·伊姆雷进行宣传，对戒严令作如下的解释：

“我們还是不明白这个可耻的戒严令是在什么情况下通过的。我們不知道納吉·伊姆雷和这个以他名义发表的命令的关系如何。但一个事实是肯定的：这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势力的一次胜利。”

紧跟着这个辯白之后，謠言立刻就传开了——納吉自己以后在謁見他的“工人”代表团面前証实了这个謠言，这个代表团是为了这一点而組織起来的；以后还在电台上为此大肆宣传吹嘘。

前匈牙利全国委员会主席瓦尔加·貝洛从反革命叛乱一暴发就拥护反革命分子的一切要求——主要是“自由欧洲”电台在当日和在叛乱过程中配合当时情况而发出的那些指示。同时美国的匈牙利文“自由日报”，在10月24日就已经把它们发表出来：

“从匈牙利領土上撤退一切苏联军队。立刻遣散政治警察和消灭一切在军队中的苏联影响。立即解散傀儡議會。結束共产党統治及其在国家各行政及管理部門的領導权。解散群众团体。……派遣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到匈牙利来，以便在联合国监督下为实行自由选举創造条件。由联合国考虑采取措施保証通过自由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管理国家事务。”

仔細研究一下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出，虽然時間較匆促，納吉·伊姆雷已經尽量将这些要求付諸实施。当然，要执行象解散議會、实行“自由”选举这样的要求時間是不許可的。可是納吉·伊姆雷在电台上也应許了这些，并为此創造了前提，他正式答应成立資產階級的、反动的、以及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法西斯政党和团体。

反革命分子不滿足于第二个政府，于是納吉·伊姆雷不久便把它扔在一边。这时他建立了“小內閣”，其中的多数是資產階級政客。可是反革命分子認為这还不够。他們已是迫不及待，于是“自由欧洲”电台在11月2日提出了新的要求：

“大小內閣必須一齐解散。在这个所謂大政府里，二十五名閣員中有二十一名是共产党员。这个政府还没有来得及組成便垮台了。甚至部长會議主席本人也不認為这个政府能被人承認，而不得不建立一个范围較小的內閣来执行政府职务。可是这个小政府也是不可靠的。这种办法笨拙无比，虽然是暫时的，可是也不能接受。目前当务之急，正如自由电台所要求的，是立即建立一个全国临时政府来执行任务。只有各党派真正的代表和爭取解放斗争的实际領導者，才在这个政府里有地位。”

11月3日，納吉·伊姆雷也执行了这个指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自由欧洲”电台和整个西方宣传机器，在指揮这次反革命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我們这样認識。就是西方人士也是这样看和这样理解的。而且毫不犹疑地公开地予以承認。反革命武装叛乱失败以后，美国“新聞周刊”在11月12日这一期中写道：

“对美国广播电台来说，各电台单独提出的要求，同“自由欧洲”电台以前所广播的要求非常相似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和令人兴奋的。”

帝国主义者对反革命叛乱的“道义”上的支持

1956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对报界发表的声明说：

“美国认为匈牙利情况的发展是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渴望自由的新的表现。……美国对匈牙利人民是同情的。”

共和国广场流血事件发生还不到二十四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又说话了，他毫不掩饰地对匈牙利事件发展情况表示满意和高兴。兹将这位总统在1956年10月31日的电视演说中有关的一段录下：

“……在今天看来，一个新的匈牙利可以从这次斗争中诞生了，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个匈牙利将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我们为这些历史性的事件感到欢欣鼓舞。”

应该重复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演说，是在10月30日共和国广场发生大屠杀以后发表的。这表明在这些漂亮的言辞和象“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种诱人的口号后面隐藏着什么。这就看出帝国主义者怎样来解释“自由”的。

纳吉·伊姆雷11月1日发表的中立声明，国内外一致认为这是匈牙利宣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外交步骤。第二天，11月2日，合众社从华盛顿向全世界发出以下的消息：

“艾森豪威尔总统今天提出供给匈牙利价值两千

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命令立刻从他的规定用来援助友好人民紧急基金中拨款。”

纳吉·伊姆雷证明了他的确是有资格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美国援助“友好人民”紧急基金的美元拨款的人。这笔钱虽然华盛顿已经拨出，布达佩斯却从未收到。这个事实极清楚地证明这几千万美元不是预备用来援助匈牙利人民，而是准备援助反革命的：匈牙利人民和人民民主制度在华盛顿是被认为不“友好”的。

西方国家供给反革命分子武器

帝国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在准备阶段仅用宣传来支持反革命，他们还用间谍、破坏和有组织的活动等方法来帮助他们。在具体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上，他们的活动也不只限于通过电台、报纸发送军事和政治指示。

从反革命叛乱开始和以后的整个期间，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和国外流亡组织，将大批的武器弹药偷运入匈牙利。除了其他手段外，他们还常常利用红十字会名义来偷运军火，这个事实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者灭绝人性的本质。有无数目击者向我们报告了这些用各种欺骗方式偷运来的军火的到达、接受和分配情况。要是把这些证人的名字举出来，就够印上好几本书。我们随手捡了几份典型的证人报告，例如伯达基夫人（原名卡尼曼·爱尔扎伯特）提供的证据：

“1956年10月26—27日，我看见一辆从奥地利进入匈牙利的匈牙利卡车，上面载着一批红十字会的物资。在文化中心区他们卸下一部分物资，其余的留在车子上。这时候我看见在红十字会的包裹里，藏着武器和

彈藥。我留心听押送物資的人的談話，他說：押送物資的头子，警告其他的人把武器包藏好，因为这輛車子曾經在边境被拦阻搜查过。他叫他們沿途只跟那些有和他們一样的許可証的人談話……”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軍火都能順利地送到送貨人所要送達的那些人的手里。佐姆巴特利的汽車司机，多特·維尔摩什，就告訴我們这样一桩沒收軍火的事：

“警察局里停着一輛帶有紅十字会标志的貨車，它从西方把軍火和德国制的步枪运进了匈牙利。車上有两箱步枪和一袋步枪子弹。”

凱奇凱什·費倫茨，是布达佩斯的居民。他証实有一批外国武器送給一股指揮部設在普拉特尔街小学的匪徒，他說：

“1956年11月4日下午，武装反革命分子当着我們的面，在普拉特尔街小学的地下室里，打开許多木头箱子，上面写着德文，并有紅十字标志。他們說，这是那天貨車送来的。这些有紅十字的木箱——大約是50×50公分——被金屬板隔成几部分。一边装着檸檬、桔子、巧克力和其他食物，另一边是手榴彈。”

費洛·拉約什，吉尔医院的看門人，在証詞中說：

“反革命叛乱时期，我一直在医院里。1956年10月27—28日，一輛西德汽車开到医院的大門前。車子里有三个西德人，他們抬进来一个受伤的匈牙利人。……我好几次亲眼看見在这些运送伤兵的帶有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牌照的汽車里，以及車里的人的身上，携带各种不同的武器。”我驗明上述那輛西德汽車时，我发现在車子里前后放着六支枪。”

事实上匈牙利当局在扫荡反革命匪徒以后，截获了大批西方制造的新式武器，如“MP.44”西德自动步枪，标着“V. S. Carbine”的美国自动步枪，英国新式手提机关枪和“Mp.40”的西德造轻机枪。

一心要把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称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的西方政府官方，是不愿外界知道输送武器这件事的。汉堡“星期世界”报于1956年11月4日报导了与一个匈牙利暴徒的谈话，这个匈牙利人说：

“我们仅在星期六接到第一批食物。一个操流利匈牙利语的外国人，交给我们四卡车小洋铁箱子，并警告我们打开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事后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其中有二百个箱子里都装满了手榴弹。”

瑞士“行动”报在报导了汉堡报纸上的这段新闻后，还作了如下的评论：

“这是登载在‘星期世界’第一版上的，而且也仅仅一部分报纸上有。这个编辑上的错误，一经发觉便停止了报纸的印刷和发行，另排新版，在新版中上述这一段就找不到了。”

回国的流亡分子领袖萨波·米克洛什——他的声明以前已经引证过——谈了一些有关输送武器的有趣的细节：

“流亡分子的领导人物一致认为必须全力支持这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些人中，札柯将军、法卡斯·费伦茨·基什巴纳基少将、达罗奇·塔西洛、海底克·贝洛伯爵、贝尔上校和‘盖伦’情报机关都竭力去搞军事援助，或者至少是供应武器。”

除了西方的武器及其它军事器材外，在西方兵营中受过训练的大批武装匪徒，越过匈牙利边境，参加了这次反革

命战争。这些匪帮都是在奥地利和西德的兵营里训练出来的，慕尼黑的“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维也纳附近由“卡里塔斯”支持的林嗣和音斯布鲁克的兵营，以及在萨尔茨堡与勒根斯堡附近“匈牙利退伍军人会”自己组织的突击队兵营。这些队伍是怎样招募来的，又是怎样偷越边境的呢？卡托纳·约瑟夫在反革命事件前很久就逃到西方，以下是他叙述个人的经过：

“1956年10月23日以后几天，在吉尔恩多夫兵营的两个名叫科库拉斯和卡拉松伊·西拉德的流亡分子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回匈牙利。我们一行大约有三十至三十五人乘汽车回匈牙利去。

“在萨尔茨堡其他流亡分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前右翼议员巴尔萨·亚诺什在萨尔茨堡“卡里塔斯”的指挥部里对我们说，有一位上校和我们同行。”

有趣的是萨尔茨堡的“卡里塔斯”在10月24日以“志愿工作队”的名义派了四十五个人到布根兰德去。这不是平常那些价钱便宜的“招募工人”，根据匈牙利当局所获得的收据，证明“卡里塔斯”为这个“工作队”的旅途食宿和其他费用化了二千五百八十七奥地利先令又二十克朗。这些武装匪徒越过边界，参加了武装反革命叛乱。驻扎在旁那巴提前哨的边防军伯伦沙克·卡洛利为这伙人作证说：

“10月29日有一队约一百三十人的武装队伍越过边境。他们说他们是从前逃往西方的匈牙利人，他们要到布达佩斯去打苏联军队。他们告诉两个值勤的边防哨兵，叫他们在晚上十点钟把前哨站的武器交出来，否则他们就要进行攻击。这伙人携带有手枪和轻机关枪。”

西方报纸对这些武装流亡分子越境的事有极详细的报导。例如伦敦“雷诺新闻”1956年1月4日报导说：

“聚集在匈牙利国外的匈牙利法西斯分子……革命者，是极右的匈牙利派别的代表……有以下几种选择：

1. 一个‘铁托主义者’仍将占重要地位的纳吉政权。……
2. 一个西方议会制度。……
3. 一个由霍尔蒂和萨拉希信徒组成的极端法西斯政权。……”

一些西方的民主报纸当时也披露过逃亡西方的法西斯流氓返回匈牙利的情况。1956年10月30日的“奥地利人民之声报”写道：

“反革命势力在一些边境地区建立了正式的参谋部。前几天在匈牙利政治流亡分子中有许多反革命间谍越过了边境，他们说是要在那里同参加暴动的人汇合。”

“新德国”报报导了一则关于这方面的惊人消息：

“在弗格尔威美国劳动营中工作的所有匈牙利流亡分子（他们大多是箭十字党人），都离职不知去向。在其他几个雇佣匈牙利人的西德公司中，情况也是如此。”

在柏林出版的“晨报”证明了这并非个别的例子。这家报纸还报导了西德资本家们对“匈牙利事件”的“热心”情况。

“埃施魏勒尔矿业公司，在10月下旬给与在该公司工作的所有匈牙利流亡分子和霍尔蒂法西斯分子一

天假期，使他們有機會參加匈牙利反革命叛亂。”

讓我們附帶說一句，這個埃施魏勒爾礦業公司，在當地不是一個小公司。它的股票掌握在西德、盧森堡和比利時的大股東的手中。

歷史垃圾的蠢動

反革命叛亂以前不久，匈牙利政治流亡分子組織大大地加緊了他們的活動。它們的領導人幾乎到世界各地做旅行宣傳。回憶一下他們旅行的一些情形是有必要的：

納吉·費倫茨，前匈牙利總理，1955年11月25日到達日內瓦參與四國會談，然後在羅馬、巴黎和倫敦繼續進行會談。1956年6月26日到達維也納，在當地與奧地利要人和流亡分子領袖晤談。納吉·費倫茨由維也納到慕尼黑去了幾天，於7月6日回到維也納。然後，經由瑞士返回美國。反革命叛亂爆發時他又到了維也納。在反革命叛亂期間，11月3日他曾與蒂爾迪·佐爾坦在電話上交談。這次談話以後他干涉了“自由歐洲”電台——這時“自由歐洲”電台正開始攻擊納吉·伊姆雷——讓他們在口氣上和緩一點。

前獨立小農黨主席、流亡分子“民族委員會”主席瓦爾加·貝洛，8月4日從美國起程赴歐洲旅行。訪問了英國、法國、西德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些國家。佩叶爾·卡羅伊，臭名昭彰的工人階級叛徒，甚至社會民主黨也因他的右翼觀點而把他開除，1956年7月間，他在維也納住了兩個星期。

赫爾瓦特·科吉·約瑟夫，天主教神父，從1955年6月至年底他在法國、西德和西班牙。1956年夏季他又做了一次類似的旅行。於1956年8月中旬到達維也納。

霍尔蒂·米克洛什, 10月29日他打电报给三大帝国主义国家的领袖, 要求他们干涉匈牙利叛乱事件。

哈布斯堡王朝的奥托 1956年初在美国做旅行演说。在此以后去西德。反革命叛乱时期, 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 要求将国徽“斯捷文皇冠”归还给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匈牙利代表。

哈布斯堡王朝的奥托认为使皇室制度复辟的时代来到了!

在国外指挥反革命叛乱的流亡组织, 企图利用适当的人与国内反革命分子直接建立联系。1956年10月30日“自由欧洲”电台派遣前霍尔蒂军官绍莫李瓦里·拉约什去吉厄尔城, 组织一个反革命政府, 同时准备以“战斗青年的代表”出现。

费什特蒂奇·米克洛什和阿朋伊·艾伯特伯爵也在反革命叛乱期间, 越过奥匈国界, 并与在绍普隆的反革命分子建立了联系。

纳吉·伊姆雷的手稿是怎样 送到西方去的?

6月11日的人民法庭审讯中, 将前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司机纳吉·雷格奇·拉斯洛传来出庭作证。在证词中他对法庭叙述了纳吉·伊姆雷的手稿被送到西方国家的经过。

“1957年2月初, 我的朋友孔奇·阿尔帕要求我问一问公使馆秘书科普先生, 他是否愿意将纳吉·伊姆雷的政治文件送出国外。这是必要的, 因为保管纳吉·伊姆雷文件的人准备出国, 只是他与国外流亡组

織沒有任何联系。

“我把這話跟科普講了，他答复說，他不能把這個文件直接送給流亡組織，但他願意把這份文件轉交他的上級。

“我把這番話告訴了孔奇·阿尔帕，他願意接受科普的條件。

“我在統計局后面的一條小街上和孔奇·阿尔帕碰頭。我是駕着公使館的車子去的，他遞給我一個紙包，當時我沒法知道里面裝的是什麼東西。我接下了這個紙包，當我打開的時候，發現是一卷大約有三百張打字的四開紙。納吉·伊姆雷的名字橫排打在第一頁紙的下面。

“5月，孔奇告訴我，那個給納吉·伊姆雷保管文件的卡爾多什·拉斯洛已被捕了。”

英美公使館人員在“吉利安”軍營

在法庭審訊的過程中，馬勒特·帕爾詳細地敘述了英國武官考萊先生拜訪他的經過。

“我們用德語交談。我的客人說他听到了許多在‘吉利安’兵營附近發生的事，並希望再知道一點。我便將事情發生經過告訴了他。”

考萊先生對馬勒特提供了具體的建議。例如他建議各個武裝團隊應該有一個統一的領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既得的成果。”他強調說，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心，一個軍事獨裁……

在訊問幾個証人之後，事情已經很明顯，英國武官考萊上校在反革命叛亂期間行為越軌，以至匈牙利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部长不得不照会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館，要求考萊上校离境。現摘录这个照会的一部分如下：

“1956年最后几个月，发生反革命叛乱期間，英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館武官詹姆斯·恩·考萊同几名武装反革命力量的領袖和許多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人积极保持直接联系。例如，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支持了旨在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叛乱活动的組織者和侵犯匈牙利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例如吉利安軍营、科尔文街等处的反动势力，供給他們以軍务和軍政上的建議。武装反革命叛乱失敗后，考萊上校又建議上述反动分子隱藏武器和装备。……”

在美国公使館那一方面，則不仅間接地破坏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則，而且与反革命分子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美国公使館官員奎德在1956年10月30日拜訪了在吉利安軍营的反革命分子，并告訴他們，他以一个公使館武官的身分来了解当前政治局势。奎德听取了武装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并向他們担保他們一定可以得到美国的貸款。随后他到了共和国廣場，那里对市委大厦的袭击刚刚結束，反革命分子正在散布关于禁閉在“地獄”里的犯人的謠言，企图进一步煽动群众的情緒。奎德自己也加入煽动者的行列中去，宣称他也听见了囚禁在“地獄”里的人发出来的鏗鏘的鐵鏈声音。

胡伯特·馮·勒文斯坦亲王与
洛松齐·格佐的会談

匈牙利反革命头子們也千方百計地和在西德复活的大資本家取得联系。当然，大資本家也希望有这种联系。反革命叛乱时期发表在“巴伐利亚邦报”上的一篇文章，清楚地

反映了大資本家們對匈牙利反革命事變所抱的希望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這篇文章寫道：“某些方面”估計，匈牙利事件也將在民主德國“引起同樣的波動”，“這將有利於解放蘇聯佔領區和重新統一德國。”

西德聯邦議院議員、馬爾他騎士團的騎士，胡伯特·馮·勒文斯坦親王在反革命叛亂高潮的時候，曾押送紅十字會物資來到布達佩斯。許多外國報紙都公開的或暗中確認他是西德政府的代表，這件事，並不是偶然的。

胡伯特·馮·勒文斯坦親王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特別是約瑟夫大公爵的本家。1956年約瑟夫大公爵曾建議在西德組織一個完全由前霍爾蒂的將軍們組成的“保衛匈牙利委員會”，企圖在未來的反革命暴亂中起着重要作用。

他與西德“金屬大王”馬爾坦也有關係。馬爾坦家族主要控制着制鋁業。1945年以前他們主要從匈牙利獲得制鋁必需的鐵矾土。鐵矾土是由澤里赫的鐵矾土托拉斯負責開采的。這個企業仍然存在，當然，它在匈牙利的財產已被沒收。前克斯帕爾工廠廠主阿尔丰茨·魏特男爵，斯坦茨公司的卡尔·席文諾和波恩政府的部長路支·魏什特里克都是這個企業董事會的董事。西德對匈牙利鐵矾土礦藏是特別感興趣的。

1953年，“蒂森康采恩化費二十萬馬克使勒文斯坦親王當選為波恩議院的議員。康采恩的所有人之一不是別人，乃是出身匈牙利貴族家庭的姬絲伊伯爵夫人。

所以就有許多理由和借口派遣勒文斯坦親王帶着一張外交人員的護照，押着“紅十字會”的物資在那個時候專程前往匈牙利。

下面是勒文斯坦亲王 11 月 2 日广播演说的摘录：

“……我们在德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能忘记匈牙利曾经为我们而战。”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必须给予你们以政治的和道义的援助。”

勒文斯坦亲王与明曾蒂的会见（见本书第四章），是当时通过叛乱的途径走向资本家大地主政权复辟的匈牙利领导人与西方资本家集团互相勾结的又一例证。

胡伯特·冯·勒文斯坦亲王在他的谈话、访问和公开演说中，鼓励——虽然是外交辞令，但意思却极为明显——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领袖继续战斗，并告诉他们必能获得“自由世界”的“积极援助”。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对马尔他骑士团的骑士拜访布达佩斯的分析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引用 11 月 4 日他从匈牙利回来以后，在维也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谈话。在谈话中他总结了他从匈牙利事件中获得的“教训”：

“在布达佩斯时我得到一个信念，就重新武装来说，我们连一分钟都不应耽搁。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房，斯特劳斯（西德国防部长——编者）有责任日以继夜地把它盖起来。只有在西方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实行革命才能获得德国的统一。”

华盛顿要纳吉·伊姆雷含苦一点

消息灵通的美国“报导”杂志的欧洲特派记者埃德蒙·泰勒，在该杂志 1956 年 12 月 27 日的一期中，发表了关于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对纳吉·伊姆雷的“劝告”的某些事实真相：

“按照雷斯頓先生(見10月24日‘紐約時報’)的說法，華盛頓特別擔心新的波蘭和匈牙利政權可能留在華沙條約組織之內，而對西方國家抱着即使不是敵意的，也是疑懼的態度。

“幾天以後我從美國在歐洲的官方可靠方面獲得消息，它所憂慮的只是匈牙利新政權跑得太快……美國代辦曾經受命訪問納吉·伊姆雷總理，請他為了實際的理由，在蘇軍尚未完全撤離匈牙利以前，對西方至少要稍稍保持一種含蓄的態度。

“告訴我這話的人沒有說明，我們是否要特別勸告納吉不要廢除華沙條約，但那意思似乎是隱含着的……在目前情況下勸阻納吉不要過快地脫離共產主義，是完全正確的。但遺憾的是太遲了，缺乏支持它的適當的權威力量——它的作用為其他官方或非官方的行為所抵消，這些行為促使加強了匈牙利國內立即完全脫離共產主義的要求。”

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大意說，在美國所採取的措施中，最危險的，莫過於拿明曾蒂作反對共產主義的旗幟。

第六章

納吉·伊姆雷及其集團投靠 帝國主義陣營的准备工作

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瓦解了人民民主政權的國家機構，建立了主要包括反革命分子的武裝力量，容許資產階級反動的法西斯主義的政黨活動，把反革命稱做是“爭取自由的鬥爭”，下令停火，容忍法西斯分子的恐怖暴行。在採取這些措施以後，他們確信使匈牙利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宣布匈牙利中立、廢除華沙條約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華沙條約是怎樣產生的，和由於什麼目的才產生的呢？它對匈牙利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意義怎樣？

華沙條約是匈牙利獨立 和歐洲和平的保障

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及其內部的社會結構，它不需要製造武裝衝突，征服其他國家人民和掠奪新的領土。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勞動人民掌握了政權，發動戰爭對於他們是沒有好處的。

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包圍的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實行自衛，以防止外來的侵略。他們不能不保衛他們自己國家和世界的安全，以抵抗從事新的戰爭冒險和進行軍備競賽的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了這個目的，他們於1955年5月締結了華沙條約，歐洲社會主義國家軍事防禦同盟。

华沙条約的防禦性質可由下列事項証明：

1. 它是在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六年以后締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公开从事于新的战争威胁，企图加强或在已經解放的国家內恢复帝国主义的統治。

2. 所謂的“西欧联盟”成立以后，华沙条約的締結就更有必要。在这个联盟中西方国家把重新武装西德合法化。他們还讓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这就加深了新的战争的危險，并增加了对爱好和平国家安全的威胁。

武装起来的西德，是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它的存在将会給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3. 华沙条約的和平防禦性質的証明是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願意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国家，均可以参加該条約。此外这个条約还宣布，本条約的締約国要努力爭取建立一个以所有欧洲国家参加为基础的全欧集体安全体系。在另一方面，苏联要求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遭到拒絕，也証明了这个条約組織的战争目的，以及无可爭辯的侵略性質。

4. 华沙条約的参加国，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反，不以建立軍事基地来威胁北大西洋公約国家。可是北大西洋公約国家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了，而且仍在建立一系列的基地。

5. 华沙条約清楚地規定一旦威胁和平的軍事集团解散，华沙条約也将宣布无效。

6. 华沙条約国家和平願望的另一个証明是，这个条約的参加国集体地和单独地曾經不止一次地建議与北大西洋公約国家締結一个互不侵犯条約，或者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約和华沙条約的双方国家之間締結一个条約。到目前为止，这些建議均遭到北大西洋公約国家的断然拒絕。

由此可見企圖削弱華沙條約國家的團結不僅是直接反對社會主義，而且是直接反對和平。這種企圖如果得到實現，就要使歐洲的人民任憑復活的德國軍國主義和戰爭冒險者的宰割。

納吉·伊姆雷集團退出華沙條約的決議，不僅是違背匈牙利人民基本利益的罪行，同時也是對歐洲和平和安全的威脅。匈牙利將會變成歐洲心臟的戰爭溫床和發動新的軍事侵略的跳板。

組織“公眾輿論”和製造“既成事實”

象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納吉·伊姆雷集團使用前述的雙管齊下的策略，為匈牙利人民民主政府脫離社會主義國家打下基礎。

他們活動的特點完全是組織“公眾輿論”的策略，也就是喊口號、提要求、貼標語。這是事實，順便說一句，就連臭名遠揚的“聯合國五國委員會”在關於納吉和中立問題上，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見本書第三章）。

洛松齊·格佐領導的電台和反革命報紙就專門從事這種組織公眾輿論的工作。

他們的第二個策略就是製造“既成事實。”

在反革命暴亂時期出版的，由納吉集團（吉梅什·米克洛什和洛契伊·帕爾）主編的“匈牙利自由報”，在10月31日創刊號的社論中自稱代表公眾輿論提出下列要求：

“匈牙利曾在華沙條約中承擔義務，如果要改變這種情況，匈牙利政府想要同蘇聯政府進行談判。應該儘速舉行這種談判，以便取得諒解。”

這篇社論是納吉集團的頭子之一吉梅什·米克洛什執

筆的。10月23日以前他還曾建議該集團必須成立一個地下組織。

電台在10月31日晚八點三十分也廣播了“匈牙利法律工作者革命委員會”(它是由幾個前箭十字黨的法學家和曾被禁止開業的訟棍組織起來的)的呼喚。這個用他們典型的辭句寫成的呼喚是：

“匈牙利法律工作者民族革命委員會……宣布，它認為保證重建匈牙利是上天的莊嚴法則和祖國的神聖概念所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要求立即終止強加在我們頭上的和與匈牙利人民的利益相違背的華沙條約。要求政府宣布匈牙利應成為一個中立國家……”

納吉·伊姆雷未經與其他有關的領導人和領導部門研究，就在10月31日對聚集在科蘇特·拉約什廣場上的群眾發表演說，宣稱在廢除華沙條約後，他正在要求蘇聯軍隊立即撤退。

他們組織了附和他們的報紙輿論來給這個“既成事實”的策略捧場，甚至將那篇演說在電台上大吹大擂。納吉·伊姆雷集團的支持者，洛松齊·格佐的密友，新聞記者康德·佩特爾，在11月1日“匈牙利自由報”上寫了一篇社論，贊同這項要求，並提出新的意見。

“我們贊同政府已經就我國退出華沙條約一事進行談判。廢除強加在我們頭上、束縛了我們手腳的華沙條約，是走向新的道路的第一步。但也僅僅是第一步。我們必須在這條既定道路上前進，並應斷然宣布匈牙利決定奉行中立政策，就象我們鄰邦奧地利一樣。匈牙利無意在世界政治中，參加任何集團。……”

11月1日“自由科蘇特電台”在新聞述評中，繼十時八

分报告新聞之后，对“匈牙利自由报”的社論“对独立的匈牙利将守中立”問題大肆喧嚷（見前面提到的广播手冊第二百四十八頁）。

在这些准备工作布置就緒以后，納吉·伊姆雷便召集內閣會議。蒂尔迪·佐尔坦在他对法院的供詞中，講到这次會議時說：

“这个會議是經過妥善布置的。納吉·伊姆雷帶着一份事前草拟好的提案来参加會議，便是証明。他在會議上宣讀了提案就匆匆离去，說还要在电台上把这个決議案广播出去。然后他們抬进来一幅大画牌，画着新的国徽和国旗，上面写着‘独立和中立的匈牙利万岁’。这也表明都是事前安排好的。”

从蒂尔迪·佐尔坦的供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納吉·伊姆雷把他的关于中立和退出华沙条約的建議交給內閣，并不是为了讓內閣討論，而只是片面地将它作为既成事实向內閣宣布。

在回答庭长提出的一个問題的時候，蒂尔迪·佐尔坦說：

“废除华沙条約是納吉·伊姆雷发起的。我可以肯定地这样說。”

納吉·伊姆雷对蒂尔迪·佐尔坦的証詞申辯說：

“关于蒂尔迪的証詞，我觉得他在許多問題上是不誠懇的。我想尽量說清楚些。蒂尔迪咬定說废除华沙条約是納吉·伊姆雷发起的。蒂尔迪应当比誰都清楚这不是我发起的。他一定知道我的看法，他也一定知道他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以前比內閣里所有其他的人都更明确。無論是在宣布中立或者是废除华沙条約上，

蒂尔迪·佐尔坦这个人都是有他自己明确的意見的。”
甚至当庭长要澄清关于宣布中立的一个重要細节的时候，納吉·伊姆雷还坚决否認这一点。

“主席：下一个我要問的事是宣布中立的問題。我第一个問題是，在10月31日那天，你是否对聚集在議會大厦前面的群众发表了一次演說。这个演講的主要內容是說，关于撤退苏联军队和废除我們在华沙条約中承担的义务的談判已在进行。如果有这么回事的話，你是否有权这样宣布？同时在那个时候是否确实举行了关于这些問題的談判？”

“納吉·伊姆雷：10月31日我对聚集在議會前面一个人数不多的人群做了一个临时演說。我提到当时我們已在进行的那些談判，但不是关于华沙条約的談判。起訴書对这些事实表示怀疑，但很遺憾，我必須說这是事实，而且我知道这些事实：那就是撤退駐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的問題。”

虽然这一点已为証人和亲笔文件所証实，他仍很遺憾地对起訴書中的这段話表示怀疑。除此以外，值得提到的是甚至“自由欧洲委员会”也暴露了納吉·伊姆雷企图对已經証明的事实进行抵賴。

下面是載在前面已提过的广播手册第二百十七頁上的“自由科苏特电台”的广播。（“由匈牙利国内无线电广播看匈牙利革命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自由欧洲出版社，“自由欧洲委员会”科。紐約市十六区，公园大道二号。第八卷，第十一十一期）。

“今天下午有一个很大的人群聚集在科苏特·拉約什廣場上。（电台这时說是‘一个人数很多的人群’。納

吉·伊姆雷在法庭則說是‘一個人數不多的人群。’——
編者)納吉·伊姆雷總理從議會大廈來到科蘇特紀念廣場，並發表演說。在演講中，他強調說，他沒有邀請蘇聯軍隊予以幫助，採取這個步驟事前他全不知道。他宣稱，在廢除華沙條約的同時，要求了蘇聯軍隊立即撤退。”
此處的重點是該書編輯加的。可是納吉·伊姆雷打了自己的嘴巴，否決了他的申辯，因為就是他自己在那天(10月31日——編者)晚間八時一分，在“自由科蘇特電台”說的，——自然這是鋼絲錄音。

“部長會議主席納吉·伊姆雷於1956年10月31日在議會前面廣場上的講話：

“匈牙利兄弟們，我以親切和熱誠的心情再一次來對你們講話！

“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我們已就從我國撤退蘇軍和終止我們在華沙條約中所承擔義務問題開始進行談判。但是我請你們稍稍忍耐一下，而且我認為結果一定不會使你們失望的。……”

(錄自廣播手冊第二百十九——二百二十頁)

此處的重點是紐約廣播手冊的編輯加的，而不是本書編輯加的。

不管是對一個廣大人群，還是不很大的人群，這個演說是在1956年10月31日午後發表的。而正如蒂爾迪·佐爾坦在法庭上說的，納吉·伊姆雷將這個宣布中立和廢除華沙條約的提案遞交內閣卻是在第二天，即1956年11月1日。

雖然鐵証如山，他還要遺憾地對起訴書中的這段事實表示不能同意。

桑托·佐爾坦在6月13日審訊的供詞中，揭露了納

吉·伊姆雷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细节：

“在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納吉沒有和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商量。例如，在中立和废除华沙条約的問題上他就沒有这样做。这些問題只是在內閣中討論过。我認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当时閣員中其他黨派的代表都說，当內閣要討論新問題的时候，在对議程中這個問題表明态度以前，他們要和党内其他的領袖談一下。而作为匈牙利劳动人民黨代表的納吉却沒有这样做。”

納吉·伊姆雷給联合国的“函件”

內閣还没有开完会，預先妥善布置的“公众輿論”又已經明确起来了。晚报上已經登載了身兼罪犯和法西斯分子的科尔文街暴徒們的要求：

“鑒于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駐联合国代表团應該緊急宣布，从10月23日开始的和已經取得胜利的大革命，匈牙利已經进入中立国家的行列中。”

納吉·伊姆雷集团立刻批准了这些“自由战士”的要求，因为这不过是实现他們自己早已决定了的阴谋。前外交部職員菲利克斯·帕尔証明說：

“納吉·伊姆雷命令我們起草关于废除华沙条約和宣布中立的照会。这些照会除了送給联合国以外，还分送給駐布达佩斯的各使館。”

下面是納吉·伊姆雷1956年11月1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照会中的一段摘录：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6年11月1日宣布中立。因此我要求閣下將匈牙利中立和四大國問題

作为特别提案列入目前正在开会的联合国大会議程。”

他們还訓令当时匈牙利駐联合国代表表明态度支持这个立場。随后就是給联合国秘書长、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匈牙利代表团一連串的紧急照会。納吉·伊姆雷集团当时的紧急任务就是使他們这个“既成事实”的冒险政策在国内和国际間获得通过。

11月3日納吉·伊姆雷对匈牙利駐联合国代表发出如下的訓令：

“我正式命令你立即通知联合国秘書长，現在以及将来所发出的电报、信件、照会以及其中的情报——包括直接送交秘書长的函件——均代表整个匈牙利政府的官方意見。”

在这方面我們想再援引一下蒂尔迪·佐尔坦的供詞。納吉·伊姆雷欺騙了祖国，他不仅在討論和决定这种重大政策上越过国民議會和政府，而且对这个已經經过了“清洗”的共产党人小內閣，也是先斬后奏。的确，从那时起，他甚至不將他的外交措施通知內閣，而自己以外交部长的地位，命令起草或发送各种照会。

納吉集团分子又一次地欺騙了信任他們，相信有可能获得中立的人民，把他們領入歧途。这个“中立”的国家刚或立，就馬上向西方要求援助，这是什么中立呢？匈牙利一分鐘都不可能中立，說它能保持中立那是謊言。对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来講，中立只是一种手段，为的是使这个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陣营，而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讓这个国家在国内落入法西斯分子的掌握，在国际关系上落在帝国主义手中。他們打着中立的幌子来玩弄其卑鄙的把戏！

1956年11月4日，当时落入小农党极右翼领导人手里的“匈牙利民族报”，一针见血地描绘了这种情况。在一篇题为“什么是中立？”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美国先驱论坛报”上美国帝国主义“实体政治”理论家华尔特·李普曼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东欧不能以战争来解放，也不可用野蛮的反革命手段来解放，必须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变成中立国，才有可能把他们解放。

所以它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用中立把匈牙利从社会主义阵营中“解放”出来——我们再说一句，伴随着中立而来的将是疯狂的反革命暴乱。

1956年11月2日，纳吉·伊姆雷的内阁又举行会议。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的决议。一个是由纳吉·伊姆雷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起程赴伦敦和纽约。此行的终极目的是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个决议是派一个以洛松齐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赴华沙。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正式废除华沙条约。按照这项决议，工人委员会的一个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团（很明显，这个决议是想盗用“工人阶级”这个名义）。

由蒂尔迪·佐尔坦来推荐“工人委员会”的代表一事是很说明问题的。

11月4日拂晓，当纳吉·伊姆雷得知革命的反攻已开始，他将议会里的蒂尔迪·佐尔坦和多纳特·费伦茨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将已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蒂尔迪建议应当以某种方式把这件事立刻在电台上发表。在多纳特·费伦茨和蒂尔迪·佐尔坦的协助下纳吉·伊姆雷草拟了一篇广播呼吁书，然后跑进议会广播室的麦克风前将它宣读。

他在广播中对“全世界”宣布政府将坚守岗位，然后纳

吉·伊姆雷在他亲近伙伴的陪同下，同时又拐騙了其他几个閣員，往南斯拉夫大使館去了。

可是在6月9日审讯中，想不到納吉竟詭称11月4日清晨的那份广播演说詞，不是他写的。很显然他沒法否認他在电台念过这篇稿子，于是他想把起訴書中关于这一件事的責任部分地或全部地推在他的同伙身上（即多納特·費倫茨和蒂尔迪·佐尔坦）。

审讯过程中发生了好几次对質。其中一次是：

“多納特·費倫茨：11月4日我一早醒来，知道苏联军队已进入市区，我奉命召集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們。我給山多·佐尔坦打电话时，蒂尔迪·佐尔坦和他的妻子进来了。此后我們便去書記处。

“这时蒂尔迪轉向納吉·伊姆雷說，当我们还能够广播的时候，政府应该用一个声明，公布这些事实。納吉·伊姆雷便口述这篇声明，我开始用鉛筆記，当我写完时，我記得他說他看不清楚，这时我才将全部声明用打字机打出来。对文字上我提了一些意見，但对其內容實質我什么沒說。除納吉·伊姆雷外，听写時間蒂尔迪·佐尔坦一直在場。这个声明是这样写成的。

“納吉·伊姆雷：‘我没有口述。这篇声明是多納特用鉛笔写出来的，在这个時間內我足足打了十五次或二十次电话。’”

在証詞中，蒂尔迪·佐尔坦对法庭講述，作为納吉內閣里的一个部长，在11月4日那天納吉是怎样对待他的。

“起訴書指責我将納吉·伊姆雷11月4日的广播声明送給联合国秘書处，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想說一下11月4日議會里的情况。我两次去納吉·伊姆雷的办

公室。当我第二次去时，我的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我们便一起回到纳吉那里去。纳吉·伊姆雷和所有其他的人都戴好帽子，穿上衣服，夹着公事皮包正预备出屋子。我问他们到哪里去。纳吉·伊姆雷说他们到地下室去，因为估计可能会开枪，他们在楼上危险。我便又回我的屋子去取大衣，然后下楼去。我找不到路了，一直跑到地下室，等我回来以后纳吉·伊姆雷不见了。我打听他哪里去了，和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在哪里。看大门的一个军官进来告诉我，纳吉·伊姆雷去苏联大使馆谈判去了。议会非常混乱，这情景使我感到有点凄然，听说纳吉到苏联大使馆去还使我安心一些。我通知电台停止广播纳吉的声明，因为一直到那时为止电台还不断地在广播。后来我才发觉，不是那天，而是第二天发觉纳吉·伊姆雷在离开议会大厦之后，就一直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去了，而不是苏联大使馆。在我一生中这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只剩下我一个人处于这样可怕的苦境里，而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说成是纳吉造成的。如果那天早晨纳吉·伊姆雷还有一点人格的话，他至少应该让我知道他们是找地方避难去了，而不应当骗我说到苏联大使馆去。”

同一天早晨，纳吉·伊姆雷还欺骗了他的另一个部长。萨波·伊斯特万于6月11日作证时说：

“11月4日有一辆车子来接我去议会大厦。纳吉·伊姆雷和其他四个人正要出屋子，他说所有的人都要到地下室去。在蒂尔迪·佐尔坦的办公室中，明曾蒂也来了，我们都到地下室去，但是纳吉·伊姆雷从此未露过面。”

第七章

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是 反革命掩护战的领导者

11月4日以后，某些同納吉同流合污的阴谋集团分子在曾經支持他們的地方找到了避难所。

在西方国家中的納吉同謀者

一部分逃往西方国家的阴谋家，在敌人豢养下繼續进行活动。

下面便是其中的几个：

在1956年11月1日的“人民报”上，克特利·安娜在她的文章中写道：

“今天反革命分子在嘟囔，說他以往干过的事今后絕不再干了。我們必須随时警惕，在重建我們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讓这种嘟囔变成洋洋得意的笑声。”

11月2日她动身前往参加在維也納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1956年11月27日“人民之声报”发表了一篇題为“克特利·安娜談反革命”的文章，写道：

“德国社会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編者）执行委员会委員赫伯特·魏勒本周在汉堡对党的工作人員講話。从現有的講話全文来看，魏勒参加了11月2日在維也納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

他传达了匈牙利社会党领袖克特利·安娜的演说。下面摘录魏勒的一段讲话：

“克特利·安娜在维也纳演说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匈牙利的群众运动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克特利说，由对保安部队的痛恨，变成了反对每一个被指控为共产党员或党的干部的一般运动。不仅这些人遭到了杀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受到株连——不只简单地杀死他们，而是一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克特利·安娜说，这些残暴事件只有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倾复后，1919年霍尔蒂统治的恐怖时期可以相比拟。

“她接着解释说，当时被释放的红衣主教明曾蒂变成了——如克特利所形容的——这些白色恐怖分子的旗手。”

这家报纸对报导魏勒演说的这篇文章做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不断地请求‘工人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编者）发表这位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文章。但直到现在毫无反应。显然，这是由于克特利的演说和‘工人报’的宣传方针有矛盾，‘工人报’坚持认为，在匈牙利没有反革命胜利和白色恐怖的危险。”

克特利·安娜的演讲是很简单的。她在11月1日的文章中写到“反革命”，在维也纳大会上她把当时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与1919年的白色恐怖相比拟——可是以后她只谈什么“纯洁的自由斗争”，企图用另一种欺騙手段来保全她的饭碗，从而博取帝国主义主子的撑腰。

现在她还在西方国家中自吹自擂，自称为纳吉政府中

唯一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她早在1957年就是在斯特拉斯堡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同西方国家一道污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她替联合国五国委员会提供假证人。1957年秋季，克特利当选“匈牙利流亡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这个组织被公认为社会党国际中的极端右翼政党。克特利·安娜又是所谓自由工联报纸“人民报”的总编辑。这个报纸是在英国广播公司匈牙利语职员协助下，在伦敦出版的。克特利在她的文章中恶毒地攻击苏联和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

克特利依靠从她的政治伙伴那里领取的经济援助来进行活动。他们设立了一个“克特利基金”从经济上援助她。甚至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也赠予一千五百镑。

纳吉·伊姆雷在10月31日任命基腊伊·贝洛为少将，委任他为布达佩斯的卫戍司令。他以反革命的“国民警卫队”的领袖身份，带领一支武装队伍逃往西方。他组织了所谓的“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成员有逃往西方的武装恐怖分子。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组织着手建立一个矛头指向匈牙利的间谍网。例如，基腊伊派遣雷纳尔·佩特尔及其同伙到匈牙利执行间谍任务，他还派遣特务去意大利和西班牙受军事破坏训练。在他的建议下其他的人都被编入西德美军的辅助队。这个“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也参加组织一个极端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宣传战。“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的头子们在基腊伊的指使下与克特利·安娜合作，为联合国五国委员会招募和收买假证人。

基腊伊贪污了为救济匈牙利“难民”而捐给“匈牙利自由战士联盟”的款子。

尽管如此，他仍然和五角大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得到美国军方慷慨地援助。他替美军纠集了许多前匈牙利陆军

軍官。他經常為“自由歐洲委員會”的刊物寫關於反革命叛亂的“軍事教訓”文章，而從該委員會領取報酬。

作為新建立的“自由戰士聯盟”領袖的基腊伊·貝洛，在1957年5月1日同集合在蒙特利爾的“匈牙利難民之家”的食堂里的一百五十人發表演說。另一個反革命組織“自由義勇軍”的會員搗亂了會場。主持會議的耶穌會傳教士福得神父無法恢復秩序，只好去叫警備車來加以彈壓。兩小時後，聽眾中的一小撮人，跑到波蘭退伍軍人協會繼續吵鬧。這時，基腊伊表示袒護克特利·安娜，他說：

“克特利·安娜在今天可能是唯一能從各大國獲得有利於匈牙利的有效措施的匈牙利僑民。我只說克特利·安娜是最有力量的反布爾塞維克組織的主席斯巴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秘書長——編者）的朋友就夠了。她和議會聯合會的許多人，在政治上和私人方面都有深厚的友誼。這些人在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的執行上有決定性的影響。”（引自紐約周刊“奧茲·恩貝爾”，1957年5月11日）。

基腊伊·貝洛在另一個場合也明確地表示了他的立場。他說：

“匈牙利革命也說明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他們堅決支持西方爭取自由的方法和形式，以及共同的政治道德。”（“奧茲·恩貝爾”周刊，1957年9月28日）。

匈牙利人民在1956年10月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教訓。他們知道了“西方爭取自由的方法”和“共同的政治道德”，在反革命叛亂中是怎樣被運用的。

凱瓦戈·約瑟夫住在美国。他在資本主義國家發動捐款，以前布達佩斯市長的身份揚言要重建這個都市。他侵吞

了大部分的基金，可是他仍繼續接到“自由歐洲”委員會的資助。他和美國的麥卡加將軍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又積極活動成立了“匈牙利流亡議會”。

他和克特利·安娜合作進行了流亡者的工作。他依照克特利·安娜的指示，在1957年9月拜訪了負責“調查匈牙利事件”的泰國凡·費查加康親王。

不久以前，他寫了一本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充滿了敵意的書。他被選進接受美國統治集團資助的“匈牙利委員會”。“匈牙利委員會”的前身是“匈牙利全國委員會”。凱瓦戈是這個新機構的副主席。

在南斯拉夫大使館中的納吉集團

前面已經談到，在11月4日那天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中間的幾個成員躲到南斯拉夫大使館去。

早在1956年10月以前，納吉·伊姆雷集團中的某些成員和南斯拉夫政府在布達佩斯的一部分大使館人員就建立了秘密聯繫。

在反革命叛亂的前一階段，亞諾希·費倫茨，吉梅什·米克洛什和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就和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一等秘書米蘭·吉爾吉威克保持經常的秘密聯繫。

在這方面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是這樣坦白的：

“……我第一次遇見吉爾吉威克是在1955年春天，在大使館舉行的正式的招待會上。1955年6月吉爾吉威克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去使館辦公室見他，這時候他已知道我已被撤職，離開新聞工作。儘管我已離職，我們仍決定彼此保持聯繫。至於將來的見面，我們決定必須保持秘密。吉爾吉威克同意這樣做，他的理由是：

如果匈牙利当局知道这事一定会給我找麻煩。

“我們約定第一次碰頭由他先給我打電話，再商量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這是1955年9月的事，我們約定在第二區尼爾街拐角的咖啡館會面。

“在一般情況下，我和吉爾吉威克每月見面一次，從1955年9月到1956年8月共約見面九次。

“見面時，我交給吉爾吉威克一些文件，這些是納吉·伊姆雷命令我，由我直接送給南斯拉夫領導人的。

“叫我轉交的有幾份納吉·伊姆雷在黨中央委員會的發言，以及納吉寫的文章，總共約有一百八十至二百頁。在這些文章里，我清楚記得的有一篇題為‘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一篇題為‘一些迫切的問題’還有一篇題為‘道德和倫理’”

吉梅什·米克洛什的供詞如下：

“……我先認識了新聞發布官，其後認識了大使館參贊朱克，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記者招待會上認識了一個使館秘書叫吉爾吉威克的。

“在記者招待會上，吉爾吉威克對我說，他希望再跟我談談。我們約好在这次招待會的两星期後會面。

“每次會面的時間和地點，均在上次見面時約定的。

“我記得在1955年秋季，吉爾吉威克對我說，他想和亞諾希·費倫茨談談。他要我了解一下亞諾希·費倫茨是否願意和他談話。我對亞諾希說了，他表示願意和吉爾吉威克見面。我將亞諾希·費倫茨的回答通知吉爾吉威克，然後我們商定在馬戈什·加博爾家中會面。”

亞諾希·費倫茨供認：

“1956年3月由我把納吉·伊姆雷的一批文件通過南斯拉夫大使館官員吉爾吉威克送往南斯拉夫。”

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是怎样到 南斯拉夫大使館去的

桑托·佐爾坦于1958年6月13日審訊時對這件事是這樣供認的：

“1956年11月4日上午一時，我接到總理辦公室的_{通知}，說南斯拉夫大使索爾達第奇很想跟我談談，叫我立刻給他打電話。我打電話給大使館，大使館工作人員米羅瓦諾夫叫我立即到大使館去，因為索爾達第奇大使要和我個別見面。

“索爾達第奇大使告訴我，他已經把11月1日在總理辦公室與洛松齊和我談話的主要內容報告貝爾格萊德——就是一些婦女和兒童是否可以暫時避入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問題。幾小時前他接到答復。據大使說，答復的內容為：形勢十分嚴重，事態在急劇地變化，蘇軍隨時可能對布達佩斯發動新的進攻。因此，南斯拉夫政府決定給予納吉·伊姆雷及其政府官員以及一切政府認為有必要的人以政治避難權。”

瓦沙爾赫利·米克洛什沒有來得及躲到南斯拉夫大使館，他供認如下：

“我依照給我的地址，走到助理武官維科米諾維奇家裏。空軍司令納多爾·費倫茨上校和他的家眷已經在那裏，埃爾季什·佩特爾也在那裏。維科米諾維奇告訴我南斯拉夫政府已批准給我們政治避難權。”

坦措什·加博尔也被叫到南斯拉夫大使館去。坦措什証明說：

“1956年11月4日上午八时，我接到一个电话。米罗瓦諾夫通知我，他代表南斯拉夫大使館邀請我去大使館，說有好几个匈牙利人已經去了。米罗瓦諾夫說为我着想，他坚决劝我带着妻子也到大使館去。九时左右，我便偕同妻子到了大使館。”

在“政治避难权”的保护下

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內繼續进行反人民民主政权的活动。当匈牙利人民民主政府的軍隊在苏联軍隊的协助下击败了反革命武装匪帮，着手恢复法律秩序的时候，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却商議如何支持反革命叛乱，和如何采取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工农革命政权的立場。

党在反对恐怖和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已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改組，而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在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却自称为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所謂“执行委员会”在11月4日还和索尔达第奇大使进行会談。在这方面烏赫伊·西拉德供称：

“这次会談的經過是这样的：洛松齐·格佐从索尔达第奇的办公室走出来，把在場的‘执行委员会’委員逐一請到索尔达第奇办公室里去开会。委員中有桑托·佐尔坦，卢卡契·季耶尔迪，多納特·費倫茨和哈拉斯提·山多尔。洛松齐对哈拉斯提說，虽然他不是‘执行委员会’委員，根据以往的決議，他可以用党机关报总編輯身分参加‘执行委员会’的會議。这时納吉·

伊姆雷已經在大使办公室里了。我听洛松齐說，开会时沒有记录，只在事后由洛松齐把討論內容記了下来。洛松齐还說，‘执行委员会’曾拟定了一个关于如何解决11月4日以后局面的計劃。”

从洛松齐·格佐和多納特·費倫茨处查获的这个所謂“执行委员会”的筆記已被沒收。

这些筆記清楚地說明了，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用所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拟定了一个反革命政綱。在这个政綱中，他們要求撤退苏軍，废除华沙条約和采取支持中立声明的立場；他們要求多党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大权首先归‘工人委员会’及过去几星期中由农民、知識分子等組織起来的团体。”

他們的意思就是要成立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組織，在这些机构里法西斯分子，反动分子，霍尔蒂分子，富农，资本家这一类的人都是重要角色，許多文件材料已証明了这一点。

在納吉·伊姆雷任总理期間，几千名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被囚禁，几百人遭到杀害，而他連一个字的抗議都沒有提。事实上，他的報紙还要求清算和审讯人民民主秩序的捍卫者，党的干部和共产党的公安人員。而当我們开始采取行动，使反革命和白色恐怖分子不能为非作恶的时候，他却在他的綱領草案中規定“释放一切政治犯”。

为了忠于他們在南斯拉夫大使館中拟定的政綱草案和他們整个的叛逆行为，納吉·伊姆雷及其共同謀者和反动政客建立了联系，叫他們逃往西方，繼續进行叛国活动。

帕尔塔伊·蒂瓦达尔供認說：

“11月4日早晨，我接到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称是

洛松齐。他問科瓦奇·貝洛和薩波·伊斯特万怎样，目前在哪兒。我說不知道。他叫我們不要支持卡达尔政府，暫時到使館避難，以後在維也納跟他再見。”

薩波·伊斯特万 6 月 11 日在法庭供称：

“帕尔塔伊·蒂瓦达尔告訴我，洛松齐从南斯拉夫大使館打電話給他，要我們去奧地利。后来我打算去英國公使館，但未成功。”

納吉·伊姆雷集团通过南斯拉夫記者的帮助与“自由欧洲”电台聯絡，要求广播他們的消息。“自由欧洲”电台当然欣然同意。

新聞記者法澤卡什·季耶尔迪供認說：

“这个集团决定叫我設法把消息发送出去。11 月 8 日我向南斯拉夫記者澤尔曼諾維奇、尤利亚斯·朱卡和蓋伏罗·阿特曼提出这个問題，我說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我們在那里，但却誰也不公开談論这个問題。我要求他們設法以某种形式把这事宣布出去。不久西方就有一个电台宣布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几个部长住在布达佩斯南斯拉夫大使館內。”

桑托·佐尔坦在供詞中对这件事是这样說的：

“我知道納吉·伊姆雷給‘自由欧洲’电台送去一条消息。这是在 11 月 15 日前后。坦措什·加博尔說他刚从‘自由欧洲’电台广播里听到一件有趣的事，納吉·伊姆雷从南斯拉夫大使館送出一条消息，否認他和卡达尔·亞諾什进行談判。坦措什对这事非常得意和高兴，他說，‘太好了，这才是真正效率。’我轉身向納吉·伊姆雷問这是怎么回事。納吉·伊姆雷回答說，他們那天午后把这条消息送给‘自由欧洲’电台，很快就給

广播出来了。我表示很惊讶。这时有一个人说——可能是多纳特——这没有什么值得奇异的，有这么多地下电台在布达佩斯活动，要转播这样一条消息并不难。”

尽管听取了这些证词，纳吉·伊姆雷对一部分事实还是矢口否认，他说：

“我们供给的消息是说明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和我们是不是还活着。但不是给‘自由欧洲’电台的，这点与事实完全不符。说我们供给别的信息，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个消息中我们只列举了每个人的名字。那时我们要求南斯拉夫宣布这条消息，是因为谣传我们被杀了，又说我们在美国大使馆，所以他们应当公布事实，说明我们在南斯拉夫大使馆，是他们让我们来避难的，说明是他们邀请我们来的，我们并没有逃跑。”

1956年11月，纳吉·伊姆雷和他的某些同谋者，通过南斯拉夫大使馆人员与在外面的该集团分子取得联系，并偷偷把文件送给他们。桑托·佐尔坦叙述这一活动时说：

“有人提出来，组织一个运动比组织一个政党也许更为妥当些。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纳吉·伊姆雷拿不定主意，他赞同多纳特和哈拉斯提的意见，和外面的同志商量商量。他们甚至编了一份包括三个问题的征求意见表，并送了出去。”

坦措什·加博尔根据纳吉·伊姆雷的指示，把文件偷运出大使馆。他供认称：

“大约是1956年11月10日（我不记得确切日期了），他们把我叫进大使馆的一间房子里去，纳吉·伊姆雷，洛松齐·格佐，多纳特·费伦茨，卢卡契·季耶尔迪和桑托·佐尔坦都在那里。他们放在我面前一张

包括許多問題的草案，——大約有對開紙那麼大——說爲了了解情況，需要知道外邊的意見。我通過大使館參贊朱克把這份征求意见表送給納吉·巴拉什。答復也是通過朱克帶進來的。其中說，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已威信掃地，現在需要一個更大的羣衆性運動，而不是一個政黨。我把這個答案交給了這些委托我送出去的人。”

於是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外邊的納吉·伊姆雷集團分子便聚會討論如何答復納吉的信件。這封信件是一個起點，根據它，吉梅什·米克洛什，阿達姆·季耶爾迪等人發動成立一個旨在顛覆工農革命政府和人民政權的組織。前副教授波熱爾·伊斯特萬供稱：

“在伯贊·羅伯特家里召開的有吉梅什·米克洛什，赫帕依·山多爾，伯贊·羅伯特，納吉·巴拉什和我參加的第一次會議上，阿達姆·季耶爾迪講到這個組織的任務。他說，我們必須統一領導這個將促進11月4日以前的全國大革命運動，知識分子的團體也不例外。……

“會上，納吉·巴拉什宣讀了他收到的一封來自南斯拉夫大使館的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的信。我們由納吉·巴拉什送去的回信與我們在討論中所得出來的結論和分析完全一致。我們這個組織（即匈牙利民主獨立運動）里的人都是納吉·伊姆雷政治路線的積極擁護者。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謀者在11月4日和以後的態度，對我們和我們的反革命活動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在反革命叛亂時期，任“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主席的

阿达姆·季耶尔迪也是这样供認：

“我主持这个會議。納吉·伊姆雷集团自南斯拉夫大使館送給納吉·巴拉什的那封信是討論的主要題目。在这次會議上，我們決定出版地下報紙‘10月23日’并刊出內容相似的要求。这些要求也构成了我們組織的‘匈牙利民主独立运动’的政治綱領。这个綱領在實質上是和納吉·伊姆雷11月4日以前的观点相同，因此也就是反对工农革命政府的。吉梅什·米克洛什接受了地下報紙‘10月23日’的編輯工作。納吉·伊姆雷及其集团的信件和态度對我們的決定自然是有重大影响的。”

前副教授伯賀·罗伯特也証實了上面的話，他說：

“1956年11月12日以前，前裴多菲俱樂部書記處書記納吉·巴拉什通知我，他接到納吉及其同謀者从南斯拉夫大使館來的一封信。

“11月13日阿达姆·季耶尔迪，吉梅什·米克洛什，波热尔·伊斯特万，納吉·巴拉什和科帕契·山多尔到我家來進行協議。那時我們決定組織‘匈牙利民主独立运动’，起初我們打算叫它‘匈牙利社会主义者聯盟’……討論時吉梅什說他不同意11月4日蘇軍的‘占領’；他說他們的那些活動是革命，并說只有聯合‘民主’黨派才有出路，而納吉·伊姆雷必須承擔政治領導的任務。阿达姆和吉梅什負責草擬一個尋求出路的政綱，并且開列了成立領導機構的名單。

“我相信，如果納吉沒有發出這個號召，如果我們沒有通過納吉·巴拉什接到他的信，我將不會有任何反對人民民主政權的罪行。”

吉梅什·米克洛什，阿达姆·季耶尔迪等人成立的这个組織，在11月4日以后的罢工事件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10月23日”——在这个报纸上，可以看见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制定的这个綱領的中心内容——又开始煽惑罢工和武装反抗。吉梅什及其同謀者所办的这份报纸鼓动繼續进行反革命叛乱。例如，这份报纸写道：

“我們选择这个革命的日子做为我們报纸的名字，因为它代表全国反抗的綱領。以前曾爆发过革命，今天也有实行这个綱領的全国反抗运动，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民主、独立和中立的匈牙利。……”

大家知道，这个反革命口号——所謂一个民主、中立和独立的匈牙利——的意义是說，匈牙利不应当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不应和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而应该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陣营的“自由西方国家”的一个附庸国。这个在反革命叛乱中被法西斯分子赤裸裸地借用过的口号，今天又重新被吉梅什等人的报纸捧了出来。

这个报纸还提出了一个“綱領”，揚言“必須仍由納吉·伊姆雷领导匈牙利。”

这个兵团号召为“民主权利”而斗争，而主要是依靠武装反革命分子，即依靠大部分由法西斯分子和罪犯組織起来的武装匪徒。

“10月23日”报对反革命匪帮发布这一类的指示：

“要开动脑筋寻找反抗的方式。争取增加工資的斗争是一个有效的形式，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就是要为驅逐不得人心的經理，部門领导或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干部而进行斗争。”

这个报纸还散发这样的标语：“从星期二下午十二时起举行全国总罢工！使一切活动陷于瘫痪！使这个国家的心脏停止跳动！”

这个叛国集团与所谓“中央工人委员会”也有联系，并鼓动其反革命头子们去夺取“国家领导权”。

吉梅什·米克洛什和阿达姆·季耶尔迪的这个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孤立的反动知识分子的组织。它得不到支持，也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是这是一种危险，因为它是当全国范围内反革命恐怖最猖獗的时候进行活动和涌现出来的法西斯分子和罪犯，在许多工厂里也是肆意横行。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引起严重后果的骚乱。可是等到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以后，这个组织就完全孤立了。

在结束这一章的时候，为了使读者了解全部情况，应该说明一下，匈牙利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一些随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在11月4日逃入布达佩斯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人，没有提起公诉。卢卡契·季耶尔迪、拉克·拉斯洛夫人、桑托·佐尔坦、乌赫伊·西拉德、瓦什·佐尔坦等人虽然他们的活动也危害了匈牙利人民，但也没有提起公诉。以上提到的人，有的没有参加阴谋活动，他们的危害并不是预谋的，有的人则在认识到他们行为的严重危害性以后，很快地背叛了纳吉及其同谋者的立场。

第八章

1919—1956年

在本書中曾多次提到1956年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亂時期發生的暴行，只有1919年黑暗的白色恐怖時期的慘無人道的事件可以與之相比擬。

1919年，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匈牙利人民首先表示擁護社會主義。他們建立了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為了保衛蘇維埃，保衛祖國，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在匈牙利的走狗。帝國主義者為了扶植霍爾蒂·米克洛什上台，和恢復資本家、大地主的統治，對為爭取獨立和自由而鬥爭的匈牙利人民實行殘酷的血腥鎮壓。霍爾蒂的爪牙以難以形容的殘暴，拷問和殺害的手段來摧殘匈牙利人民最優秀的兒女。但是帝國主義者對這暴行沒有說過一句話，那時並沒有喚起他們的人道主義感情……

1919年恐怖分子衣鉢的繼承者

如果我們把1919年顛復蘇維埃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法西斯反革命時期的恐怖事件，同1956年反革命叛亂時期的瘋狂、野蠻的暴行比較一下，我們立刻會被它們的如出一轍所震驚。

1956年和1919—1920年事件的記錄材料清楚地說明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我們有必要回憶和比較一下這兩個

时期的一些事情和材料。

1919年8月。摘自目击者的一封信。

“我下面给你讲几件事，或者你还没有听到在索莫尔基州的某些地方发生的情况。

“1919年8月警官本奇和他的三个狗腿子埃尔达伊、纳吉和萨克利亚在巴拉顿佛得瓦尔把我们的同志非埃·伊姆雷同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二十四岁的儿子给吊死了。然后这批警官又在克罗茨基吊死了李比什·伊姆雷同志。他们谁也没有犯法；他们被吊死只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此外，这个地方还有八十人被本奇老爷用棍子打过。老百姓害怕得要命，并且一听说他们在他们的村子里就跑到地里去，夜里也不敢回来。……”

1956年10月24、25、26日。在埃格尔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叫“革命调查惩治团”，由前霍尔蒂军队的少校赫尔查·伊达率领。这个团散发的小册子是他们的任务和活动的最好的证明：

“匈牙利同胞们！为适应目前争取自由情况，我们设立一个革命调查团和惩治团的联合机构。调查团的任务是清查拥护占领军的人（包括扯下我们布告的人）。他们的名单，工作地点和住所以后将陆续在本村的墙上公布。革命惩治团的工作是：一经调查证据确凿之后，就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消灭这些人。”

在格多罗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法西斯组织，包括前霍尔蒂军队少校本科·提博尔，霍尔蒂中尉米克洛什·山多尔，前布达佩斯区霍尔蒂驻军的军法官卡沙·达尼尔，和霍尔蒂军队情报官奥托瓦德·提博尔。逮捕并折磨了机器拖

拉机站的职员德罗什·约瑟夫的就是这个组织。

1919年9月20日，一支军官巡逻队，在斯赫米特·雷佐少尉和斯赫米特·兰道尔准尉率领下，出发去奥尔哥瓦尼村搜查共产党人隐藏的武器和弹药。他们到处搜索枪枝弹药，同时按当地富农密告的线索逮捕共产党员。他们抓走了厄伏基·拉约什，萨波·爱·亚诺什，哈伊拉尔·安德拉什，萨克·米哈里和哈迪·亚诺什。巡逻队的报告写道：“上述各犯直认不讳，甚至在被捕时还说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中尉接着命令巡逻队把这五名共产党员在村子外边枪毙了。

1956年11月4日，前霍尔蒂警察米西勒·伊斯特万和兰格·山多尔到匹茨特斯堡的雷柯西街二号搜捕共产党员特勒·卡尔曼（五金工人）。特勒在地下室里，他们冲下面对他叫道：“上来，特勒！上来，傻蛋！米呀，特勒同志，我们是来组织共产党的。”特勒·卡尔曼没上来，他们便下到地下室把他打死。子弹打进他的心脏，当时就死了。

1919年10月9日，左拉州州长给教育—宗教事务部长赫查尔送来一份紧急报告，控告支持苏维埃共和国的教员。

“沙拉吉尔斯格中学和商业学院教员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表现妥协，我请求授权给我和我的部下共同对沙拉吉尔斯格中学和商业学院中同情共产党统治，或有其他越轨行为的教员进行纪律制裁。”

1956年11月2日，瓦斯甫雷姆州索姆格区的前霍尔蒂军官、富农、法西斯分子和警察组成了一个“革命委员

会”。前霍尔蒂陆军参谋部上尉柯哈斯基·貝洛和卡甫特拉法的健康保险医生莫茨莎·約瑟夫在該区的这个“革命委员会”里通过一项决议：

“警察必須立即解除武装，因为他們是靠不住的，应该建立一支由以前宪兵組成的特別警察队。应该把共产党領袖逮捕起来，因为他們是完全不可信賴的。必須把共产党員干掉。”

这个城的“革命委员会”里由于有几个共产党員，所以，照莫茨莎的說法，这个委员会是不可信賴的。应该对这个委员会里的人进行甄別；委员会里一天存在着共产党員，它的任何措施都不应该予以理会。

下边是 1919 年 8 月 4—5 日，摘自普洛諾伊部队在瑪尔加利的暴行录：

“……所有的共产党領袖——連同非党人士——都在 8 月初，4 日、5 日或者 6 日由警察局长萊勒·維尔莫什下令逮捕。起先他們把这些人关在犹太学校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由增援的那个警卫把我們帶到区監獄。被捕的人，連同乡間抓来的共产党員大約有二百人。

“大多数犯人，共产党員和別的人都在監獄的院子里受到普洛諾伊队伍的残酷折磨和屠杀。有的被活活地剝皮，有的被烧死。其他的人遭到毒打，有的当着犯人亲屬的面上刑，侥倖活下来的，經過很长时期才恢复健康。

“只有三、四个人逃跑出来，从瑪尔加利逮捕来的其他犯人都被折磨死了。他們把这些同志的尸体——

他們是分兩批被打死的——埋在伯爵的磚廠對面的玉蜀黍地里。死者柯瓦什·約瑟夫的屍體被狗从地里爬出來了，几天以後才被發覺。發現死屍的好多天以後，地方官還不准埋葬。經過苦苦哀求才批准，可是一家只准一個人到場，坟頭上連一塊小木头牌也不許豎立。”

1956年10月30日，人民警官佐巴齊·約瑟夫敘述被埃普斯特“革命委員會”非刑拷打的經過：

“首先他們把我帶進去審問。他們把我領到一間屋子里，科薩坐在桌子後面，坐在他左邊的是一个高个子，細長身材的三十歲左右的人，有一張窄長的灰白色的面孔，和一撮山羊鬍子。他們命令我坐在一張椅子上。周圍有十五個拿輕機槍的人。……他們有的還用輕機槍敲我的後腦勺和脖子。……這時其中有一個人命令我把靴子脫掉。我照辦了，把靴子脫掉。他們又叫我赤腳着的脚放在桌子上。我也照辦了。然後命令我脫靴子的那个人開始用他的槍探條打我的脚指頭，敲我的脚指蓋，要把它們拔掉。我痛入骨髓，忍不住哭了起來。經過這樣折磨，我的脚麻木了。我一想起這事就要發抖。甚至現在我回想到這些可怖的情景的時候，我還忍不住要哭。接着他們強迫我穿上靴子。我的紅腫的脚根本穿不進去，可是他們非要我穿上不可。我只好忍住痛，把靴子穿上，掙扎着站起來。背後有一个拿輕機槍的人，命令我把身子轉過去，鼻子頂着牆站着。他从後面狠狠地揍我，這時我的鼻子和嘴都流了血，但他們不許我擦掉。

“他們還在地板中央放一個盤子，叫我彎下腰，把食指按住盤子支撐身體，然後這樣繞着它走。我想用左

手的袖口擦擦血，竟因此挨了沉重的一拳。他們逼着我这样繞着盘子走，直到我踣在地上昏了过去。这时那个留山羊鬍的人把冷水浇在我脸上，我苏醒了过来。他們强迫我繼續用手指按着盘子围着它轉。我又失去了知觉。他們再浇凉水，再叫我繼續繞着盘子轉。……

“这个可怕的折磨从晚上九点鐘繼續到十一点。然后他們把我抬到这間房子的地下室里；告訴我說要枪毙我……

“半夜这些人又来了，又开始审讯，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鐘。……他們打我，罪名是因为我每月交的党費多（每月我交五十福林……）。

“五点半鐘左右，他們把我抬到地下室里……各种各样带枪的人都来到地下室，他們命令我用脚跟站着，不停地蹲下站起，站起蹲下。他們还揪着我的头往牆上撞，他們又把我的手拴在牆上，說要用枪把我的手指头一个个地打掉。……

“他們离开我的屋子以后，我看見地板上有一段橡皮管。我用它打了個活結套在我的脖子上将另一端拴在水管子上。可是等把自己吊起来的时候橡皮管断了。……”

苏联軍隊救了佐巴齐·約瑟夫。反革命匪徒沒有来得及把他枪毙。

1919年11月15日。凱什克米特駐軍長官赫牙什·伊万中尉，通令当地居民从11月15日到16日，夜間不得外出。巡邏队接获命令，沒有“匈牙利复兴社”証章者一律格杀勿論。赫牙什讓兵士們喝得醉熏熏地，然后出发把那些被列入黑

名单的共产党员送入“阴曹地府”。在这个圣巴托罗繆大屠杀的当天夜晚，他们打开市监狱，把“囚犯”装上一辆卡车，用东西塞住他们的嘴，把他们弄到城外。在那里他们绞死了几个人，有的被吊死，其余的用各种各样的器械活活打死。赫牙什·伊万，佛郎西亚—基什米哈里及其匪帮在那个血腥的夜晚，野蛮地屠杀了五十名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者。

1956年10月26、27和28日，在纳吉卡德，有一批反革命匪徒闯入合作社农民贝勒·米哈里家里。1945年贝勒曾当过土改委员会委员。他们把他拉出来扔进一口井里淹死了。在基古马沙，他们毒打村委员会的商务干事涅米伊·约瑟夫，把他折磨致死，最后用一根旗杆插进他身体。在卡古什，反革命分子用刀子刺死了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和社务委员会主席巴格罗·约瑟夫。他们枪毙了博伊的新生农业合作社主席涅耶尔·拉斯洛。反革命分子在他们作威作福的短短几天中，在匈牙利全国各乡村和城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以上所举这些例子，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1956年10—11月间的白色恐怖，是以1919—1920年霍尔蒂分子的白色恐怖为蓝本的。霍尔蒂时代的法西斯分子、大官僚、警察和军官与犯罪分子携起手来破坏匈牙利人民的自由生活，屠杀了匈牙利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虽然在1956年过去霍尔蒂政权的追随者觉得仅仅达到初步的成功，他们已经情不自禁了，所以他们以明目张胆的白色恐怖来“仿效1919年。”遗憾的是他们仅仅横行霸道了十三天……

第九章

匈牙利人民捍卫社会主义

匈牙利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千方百计地欺騙群众，企图使人们相信，匈牙利劳动人民反对人民民主政权，而拥护他们。当白色恐怖籠罩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时候，拥护人民民主政权的人的声音被掩沒了，而反动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却浮到表面上来。

可是当 11 月 4 日社会主义力量开始反攻的时候，反革命在劳动人民中間的基础的脆弱便馬上暴露出来了。反革命武装匪徒实际上在一夜之間已陷于孤立和瓦解了。

这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头子們只得乞灵于恐怖政策和欺騙手段，企图再糾集一些人破坏人民民主秩序，企图通过罢工的浪潮，使这个国家瀕于破产和飢饉。但是他們的阴谋被粉碎了，虽然他們給人民造成了相当的損失，但他們却不能阻止这个国家恢复正常生活。事实証明，他們預計匈牙利会发生严重失业、通货膨胀和飢荒的一切推測都是錯誤的。恰恰相反，甚至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在反革命叛乱爆发的几个月之后，也在写“匈牙利的奇迹”，他們不得不承認在难以置信的短促時間內，一切情况已經恢复正常，国内的生活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对匈牙利提供的援助是这次迅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单单憑这个援助是不能够使国家巩固起来的。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能够很快巩固起来的主要因

素是劳动人民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武装反革命进攻时期，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人民中间产生了混乱和解体现象。由于纳吉·伊姆雷及其集团所奉行的虚伪和背信弃义的政策，使人民一时难以了解事情的真象。许多人还在期待着这位“共产党”总理采取行动来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过激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使事态更加复杂化。可是，尽管如此，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和政府还是接到几乎从每个工厂、城乡来的大批信件，要求成立武装工人队伍来镇压反革命。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力量虽然远远超过反革命势力，但是由于内部的分裂和叛变，这支人民民主力量没有组织起来。

11月4日，发出了匈牙利的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自10月23日以来就等待着的号召：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发表了广播演说。第一批新的特别治安军和新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匈牙利工人阶级的骨干和工会运动的老战士组成的。为了完成匈牙利的伟大任务，人民民主政府在有了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和坚定的劳动农民以及匈牙利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建立了坚固的基础。

匈牙利人民就这样给了国内外反动派一个响亮的回答，因为他们曾经怀疑，工农革命政府对群众究竟有多大影响，作为一个领导，能不能得到全国的信任。

反革命分子的野心，他们的残暴和勾结外国的事实不断地被揭露出来，这也是国家迅速复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人过去曾一度受了虚伪和恶意宣传的欺骗，可是当真象大白以后，他们认识到谁是1956年秋季匈牙利人民的真正敌人。由于揭穿了反革命的本来面目，由于工农革命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许多过去抱着消极和漠不关心态度的

人轉而傾向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了。匈牙利人民是在这个基础上團結起来的。因此，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的政权，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

政府对人民福利的进一步关心，甚至使得劳动人民中比較落后的分子也相信，人民民主制度是屬於劳动人民的，这个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反革命叛乱被扑灭几个月以后，政府向国民議會——1958年以六百三十七万零五百十九票当选——提出一份关于它的工作和建議的报告。国民議會一致投票对政府表示信任，并批准它的一切措施和計劃。在人民的国家里占显著地位的人民团体都活跃起来，特别是地方議會，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代表包括匈牙利爱国民主力量在內的群众运动的“爱国人民陣綫”。

敌人在国际范围內也遭到了失敗。他們企图扼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从而扼杀匈牙利国家的一切阴谋都落空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仍然与四十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1967年，杰出的政治家、世界知名人士，包括国家領袖、总理和議會代表团从世界各处，从日本到巴西，来匈牙利訪問。匈牙利和五十八个国家签订了貿易协定和支付协定，还与其他許多国家进行貿易，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貿易关系。匈牙利接待了无数的文化代表团，同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們也参加所有在其他国家召开的重要的文化、科学和体育集会与活动。

許多盛大的群众政治示威运动的开展，表明了他們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政策越来越关心和拥护。党和政府的領導人以及兄弟国家来进行訪問的政治領袖們都在这些集会上講了話。1967年4月4日，全国各

地广大群众游行，表示支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5月1日布达佩斯二十五万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证明了反革命希望匈牙利劳动人民会背弃人民民主制度的想法是十分愚蠢的。8月20日，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庆祝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1958年4月4日布达佩斯的群众集会比过去任何一次集会都更隆重，有五十万人参加庆祝匈牙利解放周年紀念，并欢迎来匈牙利参加庆祝会的苏联部长會議主席尼·謝·赫魯曉夫。苏联党和政府的代表团在匈牙利各地，無論城市和乡村，都受到匈牙利人民誠摯热烈的欢迎。

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参加集会的人数和他們的情緒上。全国人民对国民議會議員和人民委員的报告都很关心，他們对全国和地方事务提出了許多建議。在爭取裁軍和国际合作的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和集会在紧张地进行着，到处在开会——从首都到最小的村落，从科学研究所到住宅。

匈牙利人民的希望就是在他們独立、自由的国家里，为他們自己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幸福而和平地工作着。我国人民完全信賴他們的朋友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們信賴自己的政府，相信自己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美好的将来。

附录：照象和文件



帝国主义者印刷了纳吉偷运出国的叛国的政治文件。把这些文件装上各种各样的假书皮以后，又送进匈牙利。图片下边是夹在书内的解说，是用拙劣的匈牙利文写成的。

Después de esto, John Lee, amigo -
a futuro presidente de la Unión.

Hicimos un pacto de independencia.
Punto número 1: El programa de la nueva
acción económica.

艾尔德加·伊斯特万曾把他和纳吉·伊姆雷的谈话记录下来，这是其中的一段。

我警告纳吉·伊姆雷不要采取折衷政策。

他很了解我的意思，立刻就对我说他决不采取折衷政策。

El fin de la independencia política - la realidad,
analiza programari de la Unión de la Unión
de la Unión. Si el programa de la Unión - la Unión
de la Unión es la Unión de la Unión.

October 23 - es un día de fiesta en Hungría. Día de San Mateo, día de San Andrés, día de San Juan, día de San Pedro y día de San Pablo. Hoy es un día de fiesta en Hungría. Hoy es un día de fiesta en Hungría.

El 11 de octubre se celebró el día de la Unión.

El programa de la Unión de la Unión, la Unión de la Unión
de la Unión es la Unión de la Unión. La Unión de la Unión
de la Unión es la Unión de la Unión.

洛松齐·格佐日记的一部分

“斐多菲俱乐部执行委员会在星期一晚间召开了全议，通过一项包括许多重要问题的纲领性的决议。第二天‘劳动青年联盟机关报’和其他几家报纸都刊载了这个决议。”

“10月23日晨，我打电话给哈拉斯提·山多尔，多纳特·费伦茨，乌赫伊·西拉德，纳吉·伊姆雷和亚诺希·费伦茨，请他们到我家里来谈谈当前的情况。”

“10点20分左右，他们都来了。”

“我们一致认为，在国内按照我们的计划实行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应当实行根本的改革。”

David vira mel amit, hogy Nagy János miniszterelnöknek
kezes-e képe vagy a partját tölthetőnek. Nagyak a volt a
világra, hogy az tölthetőnek egy nagy miniszterelnök. Nag
gyakoriak a nagy partok, hogy az tölthetőnek nagy.
Ez az amit a tölthető is tölthetőnek.

Az az amit, hogy az a nagy partoktól az tölthetőnek.
Az az amit tölthetőnek tölthetőnek nagyok. Az az amit nagy.
Tölthető nagyok tölthetőnek. Tölthető az tölthető, nagyok
nagyok tölthetőnek.

¶ Kedden délután irántuk a farsadalmi
ügyek a Nagy-csoport köré. A Nagy-
csoport elnöke az az volt, hogy legyen tölthető.

Lővelek a miniszterelnöknek akort bevitel, de a nagy
szóval fogadni, így került hozzá.

Az az amit, hogy nagyok nagyok. az tölthető nagy
ben' irántuk: az az amit a nagyok nagyok tölthetőnek.

洛松齐·格佐日記的一部分

“对于納吉·伊姆雷应出任总理还是党委第一書記的問題，曾小有爭論。納吉的意見是，他應該作总理，而不是第一書記，因为人民怀念着他，并且强意他再作总理。別人也都贊同这个意見。”

“以后，我們決定我們全体都應該受这个決議的約束。我們都應該遵照这个決議辦事。由于情勢迫切，我們每天都要开会碰头。”

“革命青年和納吉·伊姆雷集团在星期二早晨举行會議。納吉集团的意見是：应举行示威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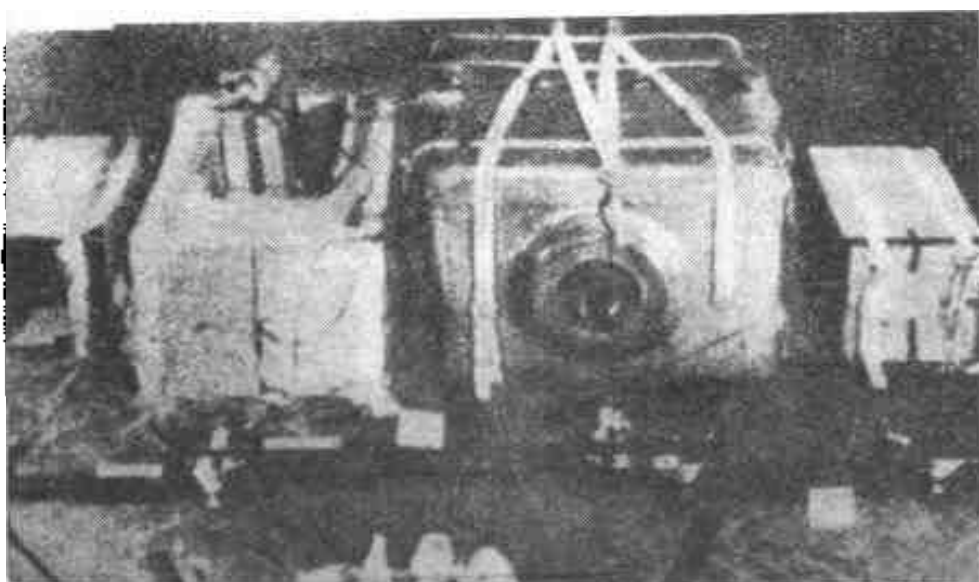
“勒文斯坦希望見到总理，可是总理不能見他，所以他只好找我了。他一开头就以‘非正式’的方式問我匈牙利政府态度如何，就是关于……”



“自由欧洲”电台及其他宣传和间谍机关，对匈牙利人民民主政府进行颠覆活动，以配合反革命叛乱。象片中是配备有摄影机的气球。



空投的小册子中，有的說：“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成就是不够的……”。另一本小册子指出消灭农业合作社是“唯一的道路”。



放入匈牙利上空的气球所携带的装备。

1956. X. 28.

Kedves Főtitkár!

Márham bejelentett hitvallásodat, amit azonban a sov-
dintó titkár nem annyira "lehetővé" tettél. Ugy akárcsak én
is elvárhatóan elvárhatóan hiszem azt, amivel a korszak után
valószínűleg nem válnak.

Most meg kellene nézni az új programot, a korszak és a hit-
vallásról: az én és a lelkész és a rajta. És az Fő-
titkár amilyen akkor is hittem, amikor még egy helyen dolgo-
tam is az az, amiket úgy néztem, lelkészemmel, négy felki-
műltésemmel egyaránt tudtam látni.

Van-e elintézés a korszak, és az a gondolat, hogy az az
is elintézt és mindenki oly körülményben van, amitől kéne kimenni.

- vajon az én a lelkészem, hogy elintézt és
mindenki körülvevő. És rajta a korszak feljára a korszak
lelkészemmel, egyéniemmel, azaz korszak és korszakomat.
Korszakom, korszak, hogy korszak, azaz korszakom korszakom
és az én korszak, azaz korszakom korszakom.

Itt gondolom, hogy a Hill. Korszakom korszakom korszakom
korszakom

Kedves Főtitkár!
Király Ádám

基腊伊·貝洛写信給亚諾希·費倫茨，要求讓他參加他“朝夕盼君”的反革命
工作。下面是这封信的摘要：

亲爱的費利：

我們迫切需要在这次聚會中——它並沒有實現——談談我們在參加葬禮后只談
了一兩句的那個問題。

当我听到納吉·伊姆雷的政綱，以及政府和党的決議，我真高兴极了。我的亲愛
的朋友費利，这就是甚至当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就確信的，为了这个事业，我願意献
出我的一切力量、热誠和我微薄的能力。

……我一想到現在我还不能投入这个我所朝夕盼望的工作时，我就感到十分悲
哀。

……难道說我不适于参加这个建設事业嗎？通过你，我向納吉·伊姆雷和他的
政府表示同情，并献出我的工作和我热誠。

……我想我的位置应在国防部參謀總部里。

謹致謝意

你的朋友

基腊伊·貝洛

1956年10月28日

1 9 5 6 . 1 1 . 3 . 1 5 2 2 2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Minisztertanácsa határozata.

A Hátérőrségnek a Belügyminisztérium hatásköréből a Honvédelmi Miniszter hatáskörébe való átállításával kapcsolatos a további következő határozatot javasolom elfogad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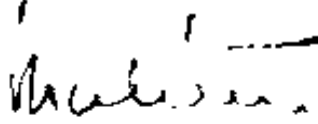
Határozati javaslat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Minisztertanácsa a következő határozata: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Minisztertanácsa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Hátérőrségét 1956. november 3-tól a Honvédelmi Miniszternek rendeli alá.

A Honvédelmi Miniszter a Hátérőrség szervezetét vizsgálja felül és a szükséges változtatásokat saját hatáskörében elvégzi.

Budapest, 1956. november 3.


Honvédelmi Miniszter

納吉·伊姆雷簽字批准馬勒特的建議，將邊防部隊交由馬勒特率領，并授權他審核邊防部隊組織，和在他權限以內進行必要的改革。

建 議

致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國部長會議

我建議通過下列決議將國境警察隊的統轄權由內政部移交國防部

決議草案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第……項決議: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自 1956 年 11 月 3 日起，將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邊防部隊置于國防部統轄之下。

*國防部長將審核邊防部隊的組織，并在他權限範圍內實行他認為有必要的改革。"

國防部長 馬勒特·帕爾

布達佩斯

1956 年 11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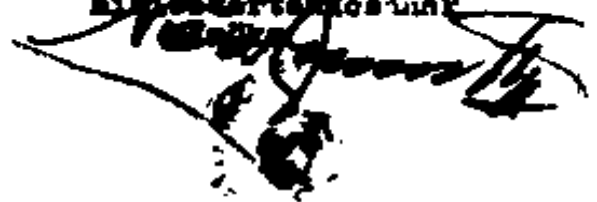
批閱人：納吉·伊姆雷

Budapest Népe!

Üzenet, hogy mindazok, akik a to. lobi vérontás megszüntetésé-
értékében ma délig, 1 óráig beszüntetik a harcot és letessék
fegyvereiket, mentesülnek a statáriális eljárás alól.

Bpest, 1956. okt. 24.

Hogy I. re
s ügyer népköztársaság
biztonsági biztosa



这是纳吉·伊姆雷签署的一张公告,宣布凡放下武器的人可免受戒严令的惩处。

“給布达佩斯的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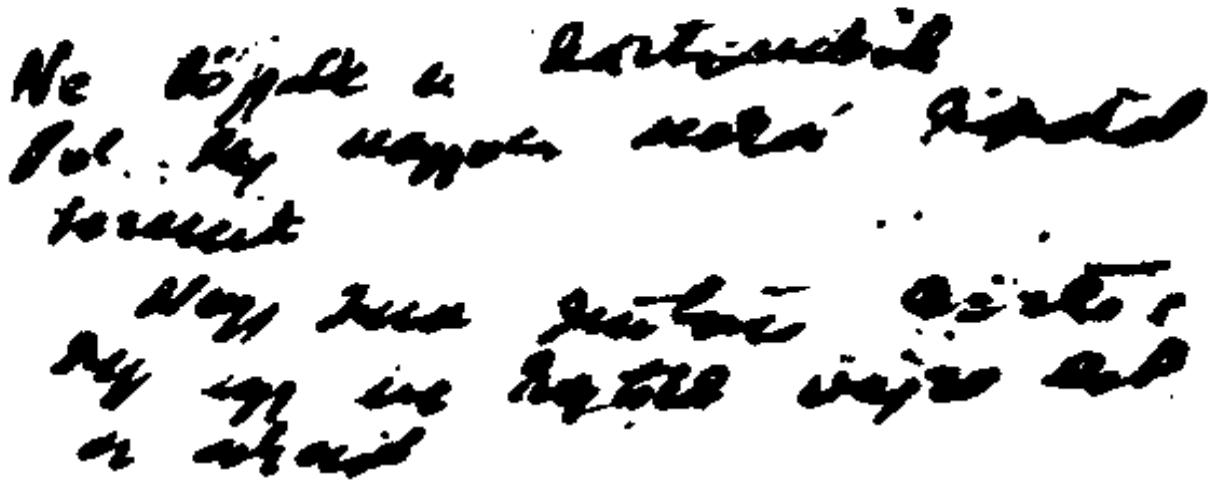
“通知你们,对一切为防止更多的流血而在一点鐘以前停止战斗和放下武器的人
們,将不实施戒严令。”

布达佩斯

1956年10月24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纳吉·伊姆雷



軍事委员会原定10月28日清晨开始行动,扫蕩科尔文街的反革命分子。可是
纳吉·伊姆雷阻止执行此項计划。下面是科瓦奇·伊斯特万少将所写的通知。

不要轟击这一片房屋。这样会在政治上造成尷尬局面。纳吉·伊姆雷特別強調
不要采取那样的軍事行动。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50.....
 40.....
 30.....
 20.....
 1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Handwritten signature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70.....
 60.....
 50.....
 40.....
 30.....
 20.....
 1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Radio.....
 (Orvosi.....
 P.S.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Buros for pk a
 10

Reports of the armed counter-revolutionary gangs on their strength and weapons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Kézelt....
 Szék....
 Alulírottak a
 megnevezés.....
 megjelölés.....
 Alulírottak elismert hogy 10
 Polgármester. Kézelt. Kézelt és
 2.8 db fegyver átadta.
 Távir: A (4542.)
 Ny. távir: 956.6

武装反革命匪帮关于他们人力和武器的报告。



武装暴徒。



这个持枪女人的旁边树根下有一具死尸。

杀人成性的反革命分子
在列宁大街的暴行之一。受
害者叫托特·费伦茨。



受害者托特·费伦茨的家屬。





在袭击共和国广场
市委大厦事件中受害的
卡拉伊·埃瓦的两个孤
儿。

这是貝勒·米哈里
妻子和她的孩子。老貝
勒·米哈里是曾特爾頓
加德的老共產黨員，當
地農業合作社社員。在
反革命叛亂中被反革命
分子扔在井中淹死。





在 1919 年……

这是索莫吉伊·费伦茨，太柏区的一个负责人，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反革命分子把他吊死在村子的大道上。



……和在 1956 年

斯特佛柯·约瑟夫是边防军中尉。反革命分子把他从医院里的病床上揪出来，在街上活活打死，最后拴住他的脚倒悬起来。

这些关于反革命分子进行血腥屠杀的照片，曾在世界各报纸上登载过。可是“南奥匈牙利报”及其他某些报刊却颠倒黑白，把反革命分子的暴行说成是苏联军队所为。

译成中文就是：

俄国人屠杀匈牙利人的真象

“在苏联共产党政府看来，象片甲的这些人罪过是他们要做真正独立和自由的匈牙利的公民。他们举着手，站在一队苏联刽子手的面前。

“轻机枪开始射击了。

“……立在前排的人倒了下去，现在立在他们背后的人暴露在枪口下了。里面还有一个包着白头巾的女人。

“他们都英勇地牺牲了。只有一个人奄奄一息挣扎着抬起头来。

“这是在匈牙利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一切‘人民民主’政府当权的国家里都可能发生，如果他们想摆脱共产党枷锁的话——里约热内卢最大的报纸‘晨报’的评论。这家报纸将图片寄给‘南奥匈牙利报’。象片是‘巴黎三月’的摄影记者，丕尔·让·皮达西尼拍摄的。他在当地受伤身死。”



...széjjel... kommunisták... kérmánya...
 ...bírák... egy...
 ...Vallartott... egy...
 ...



A gyilkolások...
 ...



...széjje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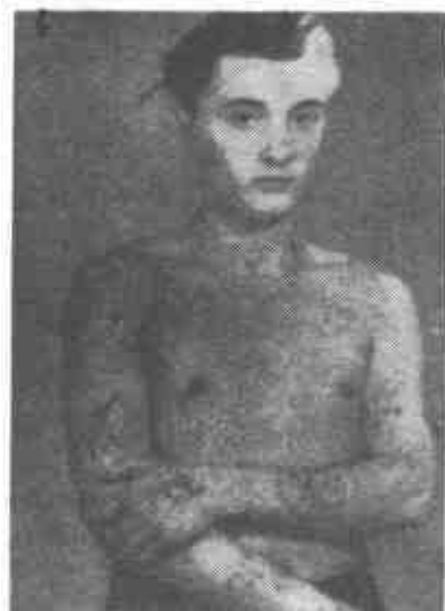


Mindnyájan...
 ...

这是共和国广场上的杀人犯，在西方他们被称为“自由战士”。



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这个人叫纳吉·约瑟夫，曾因一般刑事罪被判处八次徒刑。



瓦什·拉约什因盗窃罪被判处徒刑三次。右臂的扎青写着“报仇雪恨”。



加尔戈奇·佐尔坦，共和国广场凶手之一。手上的扎青写着“美国之子”。腹部刺的是英美国旗。



反革命叛乱时期，被拘留和囚禁在馬罗什街的一批爱国者。



反革命叛乱时期被逮捕的一批进步人士。

Budapest 107. VIII. 16. Tel. Am 1234 Cigarettes Székhely Jánosok	MAGYAR HESZESZETI BANK Általános K-25 KSH Titkárság, Árványi Mihály tisztiher Sz.	TART. Kiszáradt párt és Petőfi párt kőszepés forgalma 76.000.- 23.800.- 152.800.- Dátum Hely
---	--	--

Készpénz felvétel: 1986. nov. 2.
 Kiszáradt párt részére Ft. 800.000.-
 Petőfi párt részére Ft. 300.000.-

Magyar Heszeti Bank
 Budapest, V. ö. 107. VIII. 16. 1234
 Készpénz felvétel
 1986. november 2.

Handwritten:
 a főtörzs részére
 18. főtörzs részére

Handwritten:
 K-25
 Tisztiher Kiszáradt Párt.
 R. J.

Handwritten:
 Kiszáradt párt
 Petőfi párt
 1986. 11. 02.

Magyar Heszeti Bank
 Budapest, V. ö. 107. VIII. 16. 1234
 Készpénz felvétel
 1986. november 2.

反革命領袖們領取了几十万福林。

A magyar Nemzeti Kormány megállapítja, hogy Mindszenty összes hibás hercegprímás ellen 1949-ben indított eljárás minden törvényes alapot nélkülözött, az akkori rendszer által ellene szentelt vádak alaptalanok voltak. Mindazok alapján a Magyar Nemzeti Kormány kijelenti, hogy Mindszenty hercegprímás ellen elrendelt jogfosztó intézkedések érvénytelenek, ennek következtében a hercegprímás minden állampolgári és egyházi jogát korlátozás nélkül gyakorolhatja.



Nagy Imre
miniszterelnök.

納吉·伊姆雷非法为明曾蒂“恢复名誉”。

“匈牙利国民政府宣布前对红衣主教兼总主教明曾蒂·约瑟夫提出的控诉并无合法根据，前政权对他的控告也并无理由。根据上述理由，匈牙利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剥夺明曾蒂红衣主教权利的法令。因而红衣主教可以享有公民权和圣职权，而不受任何限制。

总理 納吉·伊姆雷

外交部的不署名备忘录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謹通知閣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可靠消息，获悉近有新的苏联军队开入匈牙利。总理兼外交部长召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罗波夫先生，对苏联新的军队进入匈牙利一事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要求苏联军队立刻撤退。通知苏联大使，匈牙利政府已宣布华沙条约无效，并宣布匈牙利中立。政府已向联合国呼吁，并请求四大国协助维护匈牙利的中立。

苏联大使已接受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抗议与通知，并表示立即请示他的政府。

請 閣下接受我最高敬意

布达佩斯

1956年11月1日

批閱人：納吉·伊姆雷

*Azok a dolgok
szobeli beszámoló.*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Minisztertanácsának elnöke,
mint megbízott külügyminiszter és alábbiakat hozzá Ex-
cellenciád tudomására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kormányához hiteles értesülések
érkeztek újabb szovjet katonai alakulatoknak Magyarorszá-
ra való bevonásáról. A Minisztertanács elnöke, mint meg-
bízott külügyminiszter magához kérte Andropov urat, a
Szovjetunió magyarországi rendkívüli és meghatalmasott nagykö-
vetét és a legerélyesebben tiltakozott az ellen, hogy
újabb szovjet katonai alakulatok vonulnak be Magyarországra.
Követelte ezeknek a szovjet alakulatoknak haladéktalan,
azonnali visszavonását. Közölte a szovjet nagykövettel,
hogy a magyar kormány a varsói szerződést/felmondja, egy-
idejűleg kinyilatkoztatja Magyarországi szuverenitását, és
Egyesült Nemzetek Szervezetéhez fordul és az ország szu-
verenitásának védelmére a nagy hatalom segítségét kéri.

A szovjet nagykövet tudomásul vette a Minisztertanács
elnökének és megbízott külügyminiszterének tiltakozását és
közlést, és megígérte, hogy haladéktalan választ kér kor-
mányától.

Fogadja Excellenciád esettel is őszinte nagyrebecsülé-
sem kifejezését.

Budapest, 1956. november 1.

納吉·伊姆雷的不署名备忘录的原文，上面有他的缩写署名。这份备忘录曾送
致布达佩斯各国的外交使节。

Kedves Bajtárs!

Ezúttal csak nyugtázní tudom leveledet és egyszermindenkorra ki akarom fejezni örökömet, hogy a forradalomban felmutatott buzgalmad és önzetlenséged csorbítatlanul megvan még ma is. Az, amire törekkel, hogy tovább tanulj, rendkívül dicső és ez az, amiben mi is segíteni szeretnénk a fiatal magyarokat, hogy tovább képezésük magukat és lényegesen képzettség embereként kerüljenek majd vissza hazánkba. E téren mindent megteszünk, ami tőlünk telik, úgy látom azonban, hogy hónapok fogtak eltelni, míg törekvéseink reális eredménnyel mutatkozni kezdenek majd. Ha ez megtörténik, feltétlenül igyekszem Rajtad is segíteni. Tekintettel azonban arra, hogy ez nem gyors dolog, azt tudom javasolni, amit magam is csinállok, hogy kenyérkereseti forrás után nézek, hogy így biztosítva megélhetésemet, szabad időben foglalkozhassak hazánk felszabadításának kérdésével. Ezzelőre tehát mindenkinek önmagának kell fenntartania magát, hogy ezután fokozatosan biztosíthassuk a tanulás lehetőségét azoknak, akik tovább kívánnak tanulni.

Kérlek, tartsd fenn velem továbbra is a kapcsolatot és légy szives, írd meg nekem azoknak a személyeknek cíveit, akikről tudod, hogy a forradalmi harcokban tényleg részt vettek, elsősorban olyanokat, akik harci csoportok vezetői voltak és külföldön elérhetők. Nagyon érdekelnék olyan személyek, akik szovjet gaztettek, brutálítások, rablások, erőszakoskodások, tiltott fegyverek használata, deportálások, vagy bármi olyan tettekre vonatkozóan tudnának tanuvallozást tenni, amelyek a U.N. előtt az orosz agresszió törvénytelenységét igazolni képesek lennének.

Szeretettel köszöntelek;

Benjamin A. J. J.

基腊伊·貝洛写給他的代理人, 斯特納尔·拉約什的信, 請他收集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和住址, 以便他們在联合国五国委员会上“証实俄国侵略的非法行动……”。

亲爱的朋友

紐約 1957 年 2 月 1 日

我接到了你的信, 我願意最后一次向你表示, 我对你在革命中所表現的、一直到今天毫无逊色的高度热情和大公无私的精神, 感到十分高兴。你想繼續学习的志願, 使人非常滿意, 在这方面, 我們是很願意帮助匈牙利青年的, 因为这样, 他們可以繼續受到訓練, 以便将来作为具有高度修养的人, 回到我們祖國。在这方面, 我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 我認为要获得成效还需要几个月的時間。縱然这样, 我也絕對願意帮助你。由于这件事不能很快地解决, 我只能告訴你, 我自己为了获得生活来源, 正在作些什么, 生活有了保障, 我才能专心致志于解放我們的国家事业。因此, 現在每一个人都應該先能維持自己的生活, 以便后来有可能学习和繼續受教育。

希望和我保持联系, 并請你把你所知道的, 确实参加过革命战斗, 特别是曾指揮作战的而在國外可以找得到的, 那些人的名字和住址寄給我。

我对这些人很感兴趣, 因为他們可以提供关于苏联暴行的証据, 象野蛮、搶劫、混乱、使用被禁用的武器、放逐犯人或任何其他类似罪行等等, 以便在联合国証明苏联的非法侵略。

我衷心对你致謝! 基腊伊·貝洛

許多証据表明西方
帝国主义者直接支持反
革命武装力量并煽动叛
乱,这仅仅是其中之一。

Felismerési jegyzék

Budapesti
Hatalom

- 1. Koltár János
- 2. Gárdai 1949. június 11
- 3. Pintér
- 4. Székely
- 5. Nagy
- 6. Nagy
- 7. Nagy
- 8. Nagy
- 9. Nagy
- 10. Nagy
- 11. Nagy
- 12. Nagy
- 13. Nagy
- 14. Nagy
- 15. Nagy



Felismerési jegyzék az 1956. évi forradalomról
A Magyar Népköztársaság Kormányán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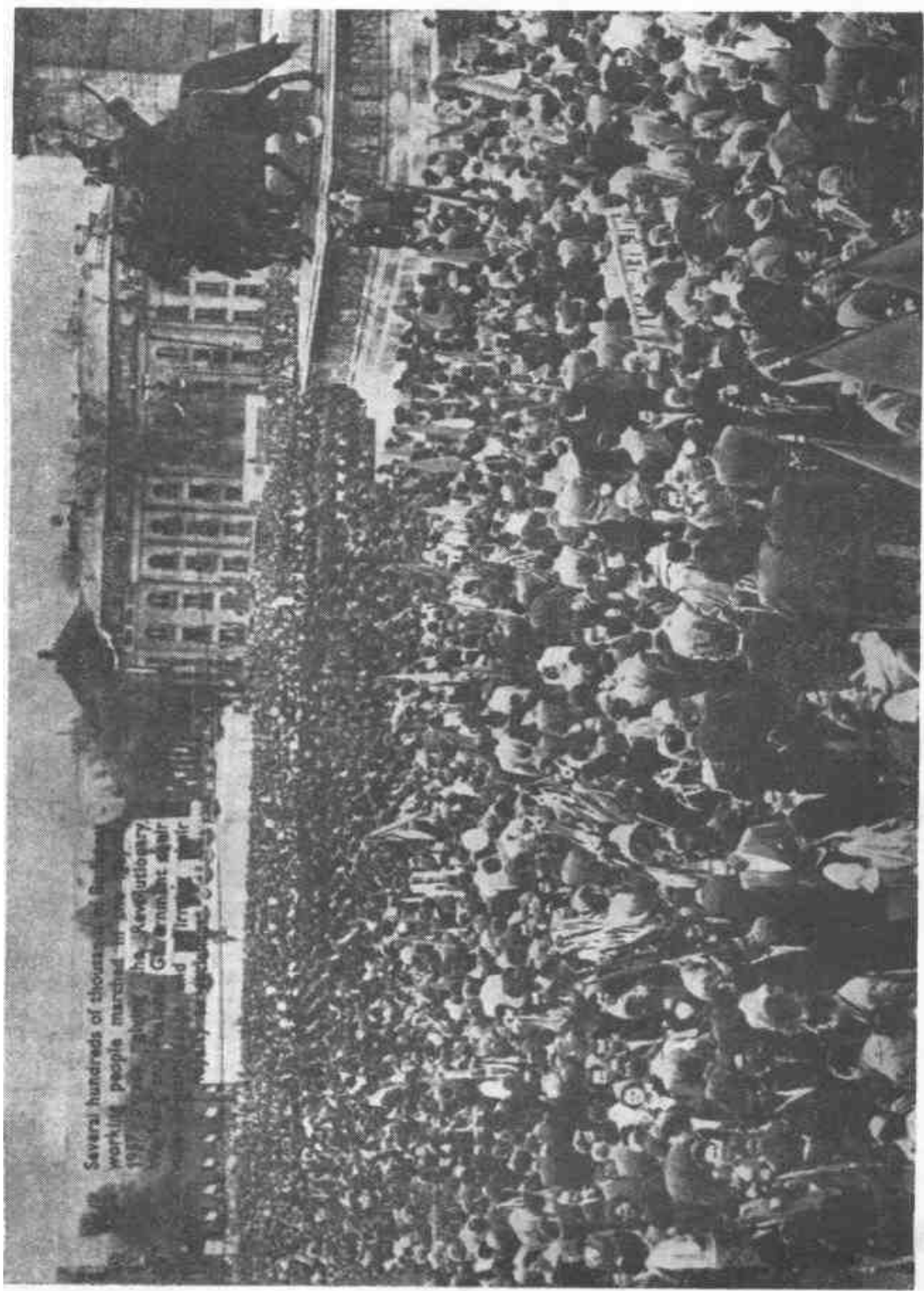
摘自对証材料

“我認出象片中第二个人,于1956年10月27日晚間在維也納匈牙利俱樂部对匈牙利流亡分子講話。他囑感他們成群結队地回匈牙利去和共产党人与苏联軍隊作战。我知道他曾僞越边境,潜入匈牙利进行布置,准备把上述一伙人运回匈牙利。”



Over 50,000 people took part in the mass meeting held on March 29, 1957, in front of the Party Headquarters in Republic Squ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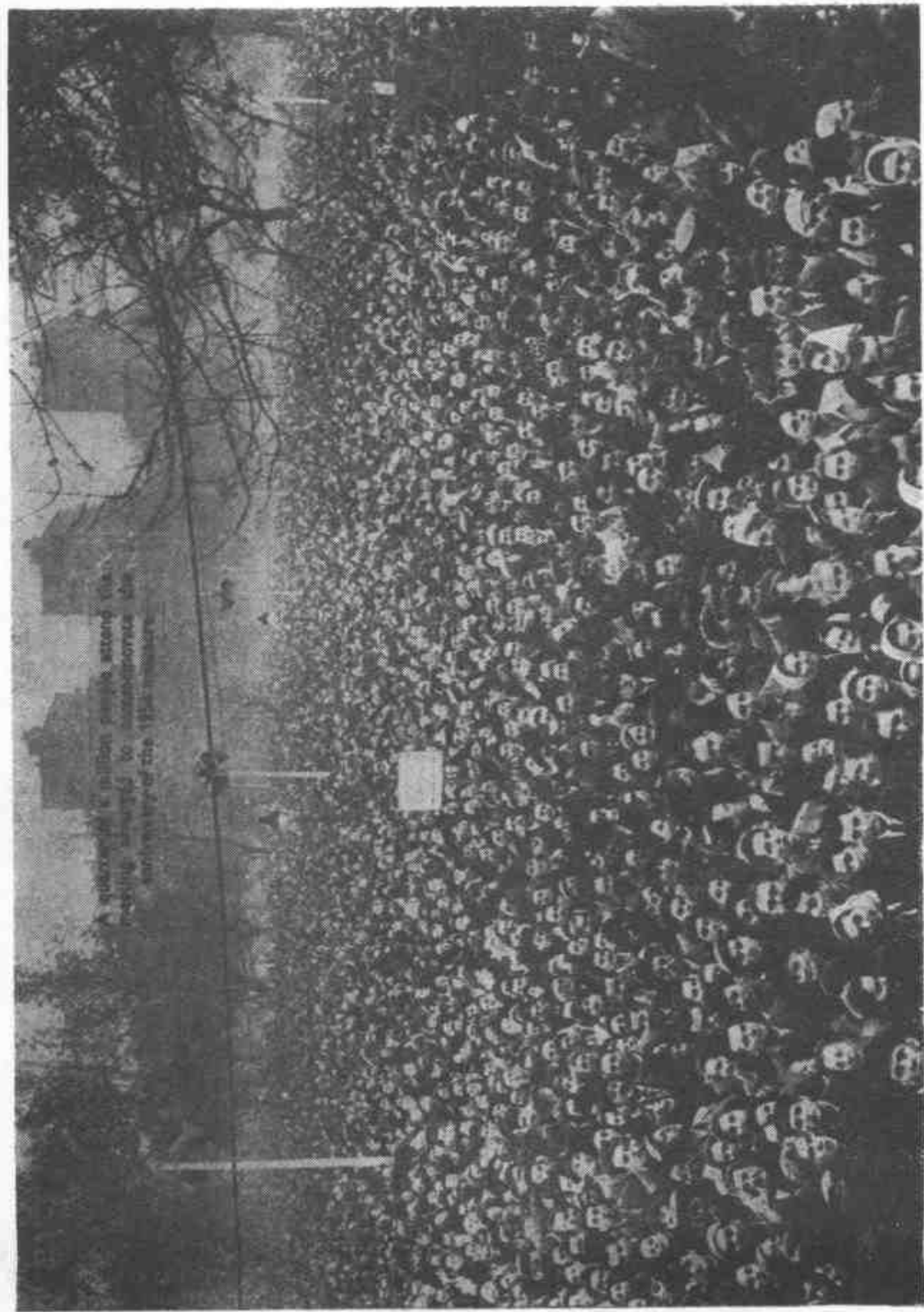
这是1957年3月29日，在共和国广场市委大厦前面举行的有五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1957年5月1日，在布达佩斯有几十万劳动人民参加游行。他们表示支持工农革命政府，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1957年5月，国民議会在反革命叛乱后第一次举行會議。人民代表对工农革命政府所采取的鎮压反革命和恢复秩序的措施一致表示贊同。



A thousand Italian people attend the
massing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of the
anniversary of the 1941 massacre.

二十五万人参加1956年大屠杀的周年纪念会。



1957年8月20日，几十万人民在基苏姆拉什集会，庆祝立宪日。会后，卡达尔·亚诺什和一些参加者发表演讲。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在尼勒
塞格同农民在一起。



部长會議主席明尼赫·費倫茨在塞雷格尼斯国营农場。



国务部部长馬罗山·捷尔吉，于1958年5月1日，在人民公园与人民欢度节日。



在反革命叛乱以后在企业中組織起来的工人糾察队。